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看見兒少——台灣棒球紀錄片研究

Regard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aiwan Baseball Documentary

楊尚謙

Shang-Chien Yang

指導教授：張俐璇 博士

Advisor: Li-Hsuan Chang, Ph.D.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July 2020



## 謝誌

首先要感謝的是張俐璇老師，回想當時，老師一口答應擔任我的指導。現在想來真的非常佩服老師當時的勇氣，若沒有老師的鼓勵與支持，我想自己也沒辦法順利的完成學業。此外，也非常感謝口試委員，謝欣苓老師、王萬睿老師口試時提供我許多寶貴的意見與勉勵，以及公共電視台陳淑媛小姐的協助，讓我在修改論文時，讓這篇論文變得更為完備。

在台大臺文所的這四年，是我求學階段裡最快樂的一段時光。謝謝智帆這些年的照顧與鼓勵，讓我能順利度過每一次的低潮，以及同為研一夥伴的彥仁、勘遠，豐富了我的住宿生活，也感謝臺文所的帝國夥伴平軒、鈺凱、詠雯，同門的思博、佳鑫、亦佳，昌神咖啡館的旻軒、純昌，還有所辦的詠萱、秋蘭、打過工的宇晨。因為有你們的陪伴，讓我每逢人生的失意、困頓與挫折時，都能在你們的鼓勵下順利地振作起來，並變得更加茁壯。

休學期間，因緣際會回到花蓮實習，也因此讓我結識許多溫暖的人。當我決定留在花蓮完成論文時，其實內心也充斥逃避與不安的情緒，而由於他們的陪伴，讓我在撰寫論文的閉關期間，仍能享有他們的照顧與溫暖，不至於感受到寂寞和孤單，謝謝浩瑋、姿儀、安誼、洛甄、文凱、姿瀧、宜蓁，讓我在最後的碩士階段，還能擁有寶貴的回憶。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母親妍濤，願意包容我的任性，妳是我所遇過意志最堅強的人，也謝謝妳帶給我兩個寶貴的弟弟秉澤和承濬。

能堅持到最後，真的是太好了。

## 摘要



棒球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運動，向來也有國球的美譽。過往對棒球的相關研究，也多指出其象徵的民族主義意涵。本文以三部棒球紀錄片為研究對象，從紀錄片再現兒童、青少年球員成長與追求夢想的同時，進而介入對國家體制的反思與批判。

首先是《冠軍之後》，導演從三名卑南族少年對學制的選擇，分為兩條敘事路線，指出少年球員在升學與訓練之間的失衡情形，以及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控制。其次是《揮棒》，導演從卑南族少年追逐職棒夢想的過程，指出原住民球員在培訓體制面對的族群文化與教育問題，以及身體的傷害。另外從球員為進入職棒樂於接受國手徵召的情形，也揭示國家體制與職棒制度的共構關係，合理化球員為國爭光的目的。最後是《野球孩子》，作為台灣首部以少棒生活為題材，進入院線的紀錄片，《野球孩子》將球場內外劃分為兩個空間，表現球員兒童／大人的形象，象徵兒童成長的過渡階段。導演為避免鏡頭對兒童世界的干預與詮釋，讓電影抽離棒球運動強調的冠軍思維，反思運動帶給兒童的成長意義與精神意涵。

透過棒球紀錄片由升學、族群與成長的面向，分析兒童及青少年運動參與的過程，提供一條反思台灣棒球文化的途徑。

關鍵字：棒球、紀錄片、《冠軍之後》、《揮棒》、《野球孩子》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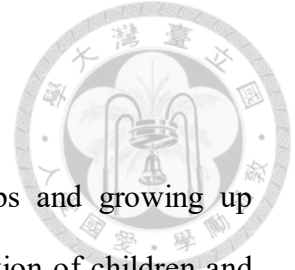
Baseball is Taiwan's most representative sport and has always enjoyed the reputation of national sport. Past research on baseball has shown the nationalist implications symbolized by it. This thesis focuses on how three baseball documentaries represent young baseball players as they grow up and chase their dreams. Through this, it interposes a reflection on and critique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s involved.

The first documentary is *After Championship*, in which the director distinguishes two narratives based on the choices of education of three Puyuma tribe youths, to point out the imbalance between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to show the control n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over the bodies of baseball players. The second is *Swing*, where the director draws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digenous baseball players face during training and their physical injuries, as three Puyuma youths chase their dream of playing professional baseball. The documentary also reveals, through the players' willingness to be drafted for the national team in order to make their way into professional baseball, how the co-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rationalizes the goal of players fighting for the nation's honor. The final documentary is *Baseball Boys*, Taiwan's first documentary centered on the lives of young baseball players that has had a theatrical release. *Baseball Boys* divides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of the baseball stadium into two spaces to show an image of baseball players as children/adults, symbolizing the transitional phase of children growing up. In order to avoid having the camera interfere with and interpret the children's world, the directors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champion mindset emphasized by baseball, to ponder the significance of sports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and its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By looking at the pursuit of higher education, ethnic groups and growing up portrayed in these documentaries,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sports, offering a way of thinking about Taiwan's baseball culture.

Keywords: baseball, documentary, *After Championship*, *Swing*, *Baseball Boys*



# 目次



謝誌.....	i
摘要.....	ii
Abstract .....	iii
圖目次.....	v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4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11
第四節 章節架構.....	19
第二章 從球員到學生：《冠軍之後》的卑南三少年.....	23
第一節 卑南國中的陸氏兄弟.....	25
第二節 台東體中的蔡志偉 .....	36
第三章 從台東到新北：《揮棒》的部落少年與平地少年 .....	48
第一節 在部落祭典與棒球培訓之間 .....	50
第二節 身體的鍛鍊與傷害 .....	65
第四章 從電視到院線：《野球孩子》的花蓮富源棒球童年 .....	76
第一節 從性教育開始的小學生活 .....	79
第二節 在教室之外的集訓與競賽 .....	88
第五章 結論：升學、族群、成長.....	99
參考文獻.....	105

## 圖目次



圖 2-1-1 陸俊瑋述說打球契機.....	25
圖 2-1-2 訓練過程的身體規訓.....	28
圖 2-2-1 蔡志偉肩膀疼痛.....	41
圖 2-2-2 中華隊管理、志偉祖父、學校教師的三方會談 .....	43
圖 3-1-1 彥儒在溪邊練習揮棒.....	52
圖 3-1-2 彥儒在部落與棒球的取捨.....	62
圖 3-1-3 彥儒父親的想法 .....	62
圖 3-2-1 冠軍的重要性 .....	67
圖 3-2-2 教練理念的呈現 .....	68
圖 3-2-3 球員對學習的想法.....	73
圖 4-1-1 健康教育的課堂 .....	80
圖 4-1-2 馬志恩的母親.....	83
圖 4-2-1 教練理念的呈現 .....	96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2016 年，《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出版。邱貴芬在《後殖民及其外》(2003)、《臺灣小說史論》(2007) 等專論之後，轉向新紀錄片研究。新紀錄片研究的書名，承接《天下雜誌》在 1991 年《發現台灣》的探問，同時挪用齊柏林院線片《看見台灣》(2013) 的思索。邱貴芬認為，「發現台灣」不意味就可以「看見台灣」，而「看見台灣」也不意味著就有台灣觀點的「論述台灣」<sup>1</sup>。因此，台灣新紀錄片研究提供了「看見台灣」與「論述台灣」的可能。

台灣新紀錄片如何「論述台灣」，關鍵在於是否具有「台灣觀點」。邱貴芬認為新紀錄片的出現，與 1980 年代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有關。新紀錄片的出產，最大的意義在於表達民間的聲音和觀點，進而打破過往戒嚴時期政府對媒體的壟斷。因此，新紀錄片強調的是與官方不同的視角，展現底層人民的視角與聲音，也因此帶有強烈的草根性。<sup>2</sup>


台灣新紀錄片除了反映人民的聲音，更企圖貼近社會的脈動，透過民間力量挑戰主流價值，成為一股為弱勢發聲與爭取權利的力量。對此，台灣新紀錄片便具有關懷弱勢、人民權利的特色，也成為台灣新紀錄片的傳統。然而，紀錄片並不只是客觀的記錄，而是透過影像和聲音架構而成的論述，含有攝製者的觀點。因此，著眼於民間觀點與社會關懷的台灣新紀錄片，如何避免鏡頭成為權力壓迫或剝削的工具，更是無法迴避紀錄倫理的問題。<sup>3</sup>

<sup>1</sup> 邱貴芬，〈序〉，《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 V。

<sup>2</sup> 邱貴芬，〈第一章：導論〉，《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 2、10-11。

<sup>3</sup> 邱貴芬，〈第一章：導論〉，《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 21、24-25。





這種重新探討「台灣」問題的努力，在 2017 年，另有謝仕淵更新再版的《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他從台灣棒球歷史出發，目的是為確立台灣棒球史的主體性。此次的更新，仍保留「臺灣棒球一百年」<sup>4</sup>的標題。然而，就其再版的時機點而言，台灣棒球的歷史，早已超過了一百年。因此，也令人好奇新舊版本的差異。謝仕淵認為，這是一個屬於台灣的棒球故事，因此從資料到詮釋觀點，都需要重新反省。<sup>5</sup>因此，新舊版本的差異，在於史料詮釋是否具有「台灣觀點」。新版棒球史，對臺灣棒球的起源有更進一步的追問，「誰才是第一個打棒球的台灣人」，若將台灣人開始接觸棒球的一九二〇年代視為起點，也讓過往從日治時期引入棒球運動的解釋，更具有台灣意識的思考。謝仕淵強調台灣觀點詮釋的棒球史，指出棒球對台灣而言的特殊性，並試圖建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棒球故事。謝仕淵以台灣為主體性，對台灣棒球史重新閱讀的努力，在全書的最後，他以〈逆轉勝：尋找台灣棒球精神〉為題，並舉嘉農、紅葉少棒與兄弟象為例，視為台灣棒球史上三件最具代表性的「逆轉勝」精神。<sup>6</sup>嘉農的成功，讓台灣人相信能透過體育運動的公平競爭，改變社會與經濟條件的不平等；紅葉的成就，代表台灣人在風雨飄搖的困境中，奮發向上的精神；兄弟象則代表著台灣，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下，仍奮鬥不懈的努力。<sup>7</sup>

謝仕淵寫的是一部關於台灣人的棒球史，不同於其它棒球史的書寫，有別於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sup>8</sup>在詮釋棒球發展時，掩蓋日治時期的發展；或是 2006 年《旋動歲月：台灣棒球百年史》，<sup>9</sup>雖然以「台灣」為主體介紹台灣棒球的發展，卻未有謝仕淵凸顯的「台灣觀點」。另外，謝仕淵追問「第一個打

---

<sup>4</sup> 謝仕淵與謝佳芬出版的《台灣棒球一百年》，是 2003 年 8 月份出版的作品，是 2017 年的再版的依據。

<sup>5</sup> 謝仕淵，〈序：十五年淬鍊更完整的棒球史〉，《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台北：玉山社，2017.11），頁 7。

<sup>6</sup> 徐錦成，〈庶民的台灣棒球史：讀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台灣時報》，2018 年 2 月 28 日。師大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轉載，

<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37040>。2020 年 5 月 1 日檢索。

<sup>7</sup> 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台北：玉山社，2017.11），頁 325、326。

<sup>8</sup>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北：民生報出版，1994.06）。

<sup>9</sup> 孟峻璋，《旋動歲月：台灣棒球百年史》（台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07）。

棒球的台灣人」的用意，也提供另一種關於七〇年代台灣棒球崛起的官方敘事。<sup>10</sup> 謝仕淵認為棒球運動能夠走向國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民間社會長期的支持與努力。因此，他在詮釋台灣棒球史時，也對棒球運動有貼近「庶民」觀點的關懷。

循此，台灣新紀錄片研究與新版臺灣棒球史，兩者都強調了「台灣觀點」的詮釋，指出有別於官方敘事下「論述台灣」的可能。如何以「台灣觀點」進行文本的詮釋，根據新紀錄片的特色，大多採用社會底層人民訪談和口述歷史，透過底層人民的視角切入議題，藉由對庶民記憶的挖掘，也有助於台灣社會與文化的歷史重建，提供不同於官方的詮釋脈絡。<sup>11</sup>

隨著台灣紀錄片的發展，運動類型的紀錄片也開始蓬勃，也多有人選電影節或院線上映的呈現。<sup>12</sup>這樣的現象，或許與運動競賽帶來的刺激性與戲劇性張力有關，容易引領觀眾進入情境，無論競賽輸贏的結果如何，都吸引著觀眾的目光。然而運動紀錄片的重要性，並不只是運動競賽所帶來的戲劇性，而是能讓觀眾看見勝負背後，運動員努力的過程和心境轉折，也能更進一步開啟運動議題的討論。

因此我從棒球紀錄片中發現，除了棒球運動競技的面向外，球員訓練的過程，也體現國家體制介入運動的發展，所以從棒球紀錄片提供的議題，扣緊我對棒球的興趣與關心，我要提出的問題是，以「新紀錄片」作為方法，看「台灣棒球」，會看見什麼？以及紀錄片又是如何「論述台灣棒球」，進而介入國家體制的反思與批判。

---

<sup>10</sup> 如〈十年青少棒發展贏得十九個世界冠軍歸功先總統蔣公德政〉裡，便將當時青、少棒在國際賽事上的成就與表現，歸功於先總統蔣公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認為義務教育的推動，增進國民知識水準的同時，還讓國小學童的身高體重大為增加。姚立業編，〈十年青少棒發展贏得十九個世界冠軍歸功先總統蔣公德政〉，《中華青、少棒世界揚名記》（台北：健行文化，1978.12），頁11。

<sup>11</sup> 邱貴芬，〈文學影像與歷史——從作家紀錄片談新世紀史學方法研究空間的開展〉，《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10），頁151-153。

<sup>12</sup> 如2005年《翻滾吧！男孩》、2006年《奇蹟的夏天》和2008年《野球孩子》，都以院線片的模式放映，2018年《後勁：王建民》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棒球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運動之一，更有「國球」的美譽。<sup>13</sup>然而背後的原因，與政府、媒體的介入操作有關。棒球運動在政府體育外交的策略下，朝競技與功利主義的方向發展，而為了追逐國際賽的冠軍榮譽，更有「未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價值觀，充斥在體育教育中。<sup>14</sup>這種現象無疑扭曲了運動的本質，長期追求冠軍與國家榮譽的觀念，更成為台灣棒球發展至今仍無法擺脫的特殊文化。<sup>15</sup>

棒球運動在九〇年代職業化以後，也代表台灣成棒逐漸從體育外交走向自主化發展。結合 1992 年巴塞隆納奧運，棒球賽事奪銀的契機，人們也開始挖掘棒球過去被埋沒的歷史。當時的《中國論壇》，便以「國家文化台灣棒球文化巡禮」為題，<sup>16</sup>邀請翁嘉銘、晏山農、楊照、段嘉蓀等人，分別從文化與歷史面向，討論台灣棒球的發展與意義，<sup>17</sup>四人皆指出台灣棒球歷史的去脈絡化與政治操弄，是定位台灣棒球價值的最大阻礙。翁嘉銘認為，台灣棒球的成就，並不是運動史上的奇蹟，若沒有日本殖民的歷史，就沒有台灣棒球的紮根發芽。<sup>18</sup>楊照認為改造過的棒球史，斬斷了源自日本「野球」時代的記憶。

除社會輿論興起對棒球運動過去歷史記憶的追尋，紀錄片也有作品對過去的歷史提出探問，特別在「紅葉少棒」的事件上，有蕭菊貞導演的《紅葉傳奇》。《紅葉傳奇》對「紅葉少棒」議題的關懷，抽離官方論述的棒球脈絡，導演透過和球員

<sup>13</sup> 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台北：玉山社 2017.11），頁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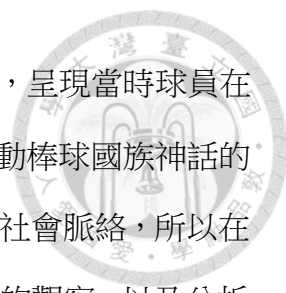
<sup>14</sup> 張威克，〈台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運動文化研究》第 10 期（2009.09），頁 118。

<sup>15</sup>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2007.04），頁 137。

<sup>16</sup> 在總編輯蔡詩萍的〈編輯室手記〉一文，說明這期製作「國家運動——臺灣棒球文化巡禮」的原因，相當程度上代表的是民間社會力的蓬勃面貌。這一次專題，為台灣棒球運動的歷史發展、社會基礎、與國家歷史處境的關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蔡詩萍，〈編輯室手記〉，《中國論壇》第 23 期（1992.09），頁 1。

<sup>17</sup> 謝仕淵，《「國球」的誕生：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12），頁 3。

<sup>18</sup> 翁嘉銘，〈棒球的美麗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臺灣棒球史〉，《中國論壇》第 23 期（1992.09），頁 27。



親友的訪談，也間接還原「冒名事件」<sup>19</sup>的真相。紀錄片的拍攝，呈現當時球員在國家與媒體操作下的犧牲。紀錄片對棒球運動的關懷，也體現鬆動棒球國族神話的可能。因此，我認為關於棒球的影像作品，多有貼近台灣棒球的社會脈絡，所以在文獻回顧上，我以棒球相關的影像作品與研究，作為對台灣棒球的觀察，以及分析的基礎。

台灣最早關於棒球的記錄影像，是 1969 年周旭江導演的《廿三屆世界少年棒球賽》，曾獲第八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sup>20</sup>拍攝內容是關於 1969 年金龍少棒隊遠征美國威廉波特的奪冠始末。按當時紀錄片的製作觀念，仍沿襲日治時期和中國官方新聞紀錄片的製作模式，較少有形式上的突破。<sup>21</sup>同樣形式的棒球紀錄片，還有 1979 年莊芷江導演拍攝的《少年·棒球·冠軍》，以台灣少棒、青少棒、及青棒在美國威廉波特比賽奪冠軍為主題，並記錄 1968 年紅葉少棒擊敗關西少棒聯隊後，台灣棒球的發展，記錄學生球員接受訓練的景象。<sup>22</sup>這兩部紀錄片拍攝的目的，主要是記錄台灣基層棒球的發展盛況。

台灣從七〇年代開始，便將三級棒球在國際賽的亮眼表現，視為體育外交策略的活棋，為有效延續「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空間，政府更推動棒球運動在校園的發展，並視為國府拓展外交的途徑之一。<sup>23</sup>棒球運動會開始朝向國際發展，與 1968 年的紅葉少棒有關。當時紅葉少棒對日本關西少棒聯隊的友誼賽取得勝利後，也被視為台灣少棒具有實力向國外挑戰的起點，成為台灣棒球邁向國際的契機。<sup>24</sup>因此《少年·棒球·冠軍》將紅葉少棒融入其中，也是為了強調棒球運動在國家主導下

---

<sup>19</sup> 當時的紅葉少棒與關西少棒聯隊，進行的是一場非正式的友誼賽，兩隊雙方都有國小與國中學生混齡出賽的比賽。但是在友誼賽的勝利後，卻被媒體塑造是擊敗日本的世界少棒冠軍，因此在發現紅葉少棒球員身分資格有異時，由媒體塑造的民族英雄，瞬間成為棒球界的醜聞。徵引自吳柏緯，〈背負 50 年罪與罰——為台灣棒球點火的紅葉少棒〉，《報導者》，2018 年 8 月 24 日。  
<https://www.twreporter.org/a/student-baseball-red-leaf-legend-half-a-century>。2020 年 8 月 4 日檢索。

<sup>20</sup> 徵引自台灣紀錄片資料庫，<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4120>。2020 年 8 月 5 日檢索。

<sup>21</sup> 王慰慈，〈1960~2000 年臺灣紀錄片的發展與變遷〉，收錄於王慰慈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熹文化，2006.12），頁 10。

<sup>22</sup> 陸銘澤，《棒球樂事》（台北：台灣書房，2011.09），頁 129。

<sup>23</sup> 張威克，〈台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運動文化研究》第 10 期（2009.09），頁 102。

<sup>24</sup> 謝仕淵，《新版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玉山社，2017.11），頁 199。



的成就，紅葉少棒的故事也成為劇情片拍攝的主題。

台灣首部棒球題材的劇情片，是 1988 年張志超導演的《紅葉小巨人》，<sup>25</sup>這部電影改編林清介<sup>26</sup>《吹向平地的強風》(1977)，描寫邱慶成教練帶領紅葉少棒隊，擊敗關西少棒聯隊的故事。同樣以棒球為題材的劇情片，還有 1989 年何平導演的《感恩歲月》，這是一部關於王貞治棒球生涯的自傳式電影，改編王登美撰寫的《感恩的歲月》，主要描寫王貞治少年時期的成長與親情。電影拍攝的契機，與王貞治的出生背景，以及在日本職棒的顯赫表現有關。王貞治出生日本，其父王仕福原籍中華民國浙江省青田縣，是二〇年代移居日本的華僑。因為父親的背景，王貞治保有中華民國國籍。因此，王貞治在日本職棒的代表性與意義，也成為政治上可利用的籌碼，成為台日本關係接壤的橋樑。由此可見，台灣早期關於棒球的紀錄片，具有新聞紀錄片的性質；劇情片則強調紅葉少棒事件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拍攝的目的上，也多有貼近政治宣傳棒球運動的功能。

然而 1999 年蕭菊貞導演的《紅葉傳奇》，提供與上述棒球紀錄片不同的詮釋角度。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是追尋當時「紅葉傳奇」的成員，而這群成員有一半以上因為疾病或意外早逝。紅葉少棒的成員，雖然為當時處於政治困境的台灣找到民族信心，但寫下傳奇的成員們，卻因困境而命運多舛。<sup>27</sup>因為「冒名事件」造成的傷害，讓他們從原先戰勝日本少棒聯隊的民族英雄，淪為過街老鼠。導演透過和親屬的訪談，傾訴著榮光背後的辛酸過往與不為人知的真相。如江萬行的遺孀，認為政府在事件過後，沒有好好對待過他們；余宏開選擇繼續推廣棒球運動，甚至自費到台東的學校免費教導棒球，不幸遇到車禍壯志未酬；邱德聖則是生前極力反對兒子打棒球，希望他好好念書，不要走棒球這條路。昔日的傳奇，如今卻帶著悲劇的

<sup>25</sup> 陸銘澤，《棒球樂事》(台北：台灣書房，2011.09)，頁 135。

<sup>26</sup> 1944 年出生，宜蘭人，國立師範藝術大學畢業後，擔任中學美術教師，因為熱衷電影工作，於 1967 年起改任電影及電視編劇，先後擔任過江浪、陳洪民、李行、陳耀圻等人的副導演。1976 年曾以《汪洋中的一條船》獲新聞局電影事業基金會甄選劇本首獎，有學生電影教父之稱。曾芷筠，〈敬！奇幻青春：專訪「學生電影教父」林清介〉，《放映週報》第 549 期 2016 年 3 月，[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08](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08)。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sup>27</sup> 陸銘澤，《棒球樂事》(台北：台灣書房，2011.09)，頁 130。



色彩，留下抑鬱、失落的情緒。

蕭菊貞導演在追尋球員現況的同時，透過訪談也為當時的冒名事件還原真相。從被拍攝者的訪談內容，提到當時雙方當時是在進行非正式的友誼賽，雙方球隊都有超齡球員的問題。但是這場勝利，卻在政府與媒體的渲染和操控下，將球員們視為民族英雄。在冒名事件的爆發後，政府也沒有妥善的照顧與栽培這群「英雄」，讓球員成為國家與媒體為塑造民族意識，宣洩民族情緒的犧牲品。《紅葉傳奇》為冒名事件的平反，體現出台灣新紀錄片的性質，透過受訪者的聲音，為當時的冒名事件提出看法，呈現與官方的不同的見解。這不同的觀點與立場，也展現紀錄片的「介入」的特質，指出棒球運動在社會、文化或生活經驗的政治面向。因此，從導演的拍攝與敘事的方式，也讓紀錄片具有鬆動官方詮釋棒球運動的可能。

另外在劇情片的拍攝上，則運用紅葉少棒突破逆境的棒球精神，結合職棒經歷的簽賭事件，融入劇情敘事推動情節發展。如 2002 年鍾炳煌導演的《校園大作戰》，描寫一支面臨經費短缺即將解散的少棒隊，與兩名因為職棒簽賭被黑道追殺，且具有棒球專業的人相遇後，改邪歸正的故事。這部電影結合職棒簽賭事件，把重挫職棒的弊案融入情節，象徵人生的起落。劇情片結合棒球的社會事件融入劇情敘事的做法，在 2008 年林書宇導演的《九降風》上也是如此。《九降風》將簽賭事件的新聞報導穿插在故事情節裡，象徵男性團體感情的變化。在《九降風》之後，其它關於棒球的電影裡，也有類似的表現手法。如 2010 年陳佳鍵導演的《再見全壘打》，和 2012 年尹祺導演的《球來就打》。這兩部電影都將主角設定為因為職棒簽賭事件，被職棒封殺的球員為主角，分別探討親子關係，以及拒絕重蹈覆轍的救贖過程。

從上述所提的劇情片，看見台灣棒球融入電影裡，作為情節推展的助力。台灣棒球相關的影像生產，反映出社會大眾對棒球運動的認同與喜愛。《九降風》上映的時機，正好是台灣國片發展的熱潮，宋育成在〈全球化潮流與異質化策略：論《海角七號》與台灣電影史的「台灣性」在地想像〉裡，<sup>28</sup>指出電影裡大量運用當代台

---

<sup>28</sup> 宋育成，〈全球化潮流與異質化策略：論《海角七號》與台灣電影史的「台灣性」在地想像〉

灣歷史意識與本土元素，是獲得觀眾共鳴和成功的關鍵，認為專注於本土文化的再現與發展，是台灣電影面對外國及跨國製作電影的競爭時，可以發展的方向。

棒球題材融入劇情片的創作，似乎也能夠作為本土文化再現形式的探討，最鮮明的例子是 2013 年林立書導演的《天后之戰》，這部電影改編東石高中棒球隊的故事，描寫東石高中棒球隊的球員，在資金缺乏下，替廟宇跳八家將，或龍舟競賽來籌措比賽的經費。在一場和北港農工青棒隊的比賽時，雙方的後盾分別是北港朝天宮與朴子配天宮的媽祖信仰，比賽過程如同雙方信徒之間的較量，結合棒球運動與民間信仰，反映有趣的大眾文化。<sup>29</sup>

2014 年馬志翔導演的《KANO》，是一部關於台灣日治時期嘉義農林棒球隊的電影，嘉農棒球隊是一支由漢人、原住民、日本人組成的隊伍，藉由團隊的奮鬥與努力激發彼此的潛能，亦展現跨族群文化的融合和民族意識。張永祥在〈運動電影《KANO》之台灣社會文化意涵探析〉裡<sup>30</sup>，提到台灣棒球運動的文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並且在技術、觀念上，也承襲日本棒球嚴謹又細膩的風格，還強調態度、精神、身體上的淬鍊。即便到現在，台灣棒球的運動文化，仍然深受日本野球風格的影響，台灣基層棒球的訓練環境裡，不論是戰術的制定、訓練的模式，或教練對球員精神、品行的要求都是如此。

另外，關於棒球紀錄片的研究，截至目前都沒有單以「棒球紀錄片」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因此我在文獻回顧上，擴及運動紀錄片的相關研究，選入討論到棒球紀錄片的論文進行討論，作為研究取徑的參照。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sup>31</sup>綜合 Bill Nichols 紀錄片美學再現的六種紀錄片模式，分析台灣七〇年代以

---

(台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sup>29</sup> 王欣瑜，〈《天后之戰》(電影)導讀〉，台灣文化工具箱，2015 年 7 月 28 日。

[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46.html?themeId=16](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46.html?themeId=16)。2020 年 8 月 5 日檢索。

<sup>30</sup> 張永祥，〈運動電影《KANO》之台灣社會文化意涵探析〉(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16)。

<sup>31</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 2003.01，頁 1-33。



來台灣紀錄片的類型，以詩意的模式、解說的模式、觀察的模式、參與的模式、反身自省的模式、表現的模式等六種，並透過紀錄片不同類型間的侷限與可能性，提供我在研究棒球紀錄片時，的切入方法與詮釋基礎。

陳中淋〈紀錄原鄉：台灣運動紀錄片的再現模式分析〉，<sup>32</sup>他探究紀錄片的拍攝者，如何再現原住民青少年運動員的生活，進而詮釋運動對他們的價值與意義。他選擇《奇蹟的夏天》、《野球孩子》、《山上的小女子舉重隊》三部紀錄片，分析導演如何帶領觀眾看見原住民青少年的生活情境，看見運動對他們而言，不只是升學的管道，和階級流動的捷徑，強調的是運動如何帶給他們快樂、正向與自我超越的價值。

許家綾〈台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球孩子》、《翻滾吧！男孩》、《拔一條河》〉，<sup>33</sup>分析紀錄片如何呈現偏鄉兒童，以及如何再現兒童形象，探討台灣紀錄片中兒童形象的呈現與兒童在運動過程中社會化的議題。

王思閔〈台灣運動紀錄長片之研究—以《翻滾吧！男孩》及《態度》為例〉<sup>34</sup>，他認為這兩部運動紀錄片，都有勵志性、勝利主義的內容，以及戲劇化的傾向。另外，還注意到運動員逐漸藝人化、商品化的現象。雖然在文本的選擇上，棒球運動沒有關聯。但是對運動商品化現象的觀察與發現，能夠和台灣棒球職業化以後的發展相互參照。球員為了實現職棒的夢想，接受訓練打造身體的過程，便是球員身體商品化的實踐。

許貞雯〈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教育意涵〉，<sup>35</sup>同樣指出運動商業化發展的隱憂，她從男童的個體意識、組訓教育與運動商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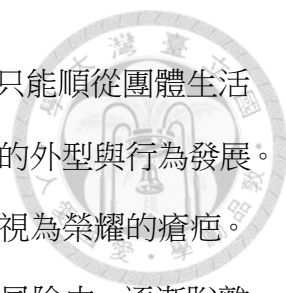
<sup>32</sup> 陳中淋，〈紀錄原鄉：台灣運動紀錄片的再現模式分析〉（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sup>33</sup> 許家綾，〈台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球孩子》、《翻滾吧！男孩》、《拔一條河》〉（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sup>34</sup> 王思閔，〈台灣運動紀錄長片之研究—以《翻滾吧！男孩》及《態度》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sup>35</sup> 許貞雯，〈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教育意涵〉（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三個層面論述，反思運動的教育意涵，揭示男童在組訓制度內，只能順從團體生活中營造的男性氣質，順應父權社會的刻板印象，朝具有男子氣概的外型與行為發展。男性氣質強調的陽剛與勇猛，也合理化訓練過程對身體的傷害，視為榮耀的瘡疤。另外，運動商業化的發展，也讓運動陷入商業利益糾葛的曖昧與風險中，逐漸脫離運動的本質。雖然該研究是以足球運動為主題，但是從運動的競技層面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與運動商業化的觀察上，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因為棒球是台灣少數職業化的運動項目，因此商業化的發展，連帶也會對基層棒球的培訓制度產生影響。

謝世宗〈男性氣質：逆讀《翻滾吧！男孩》〉一文，<sup>36</sup>從性別研究的方法切入，以男性身體為中心，強調男孩在訓練與成長過程中，對男性長者認同的渴望。男孩在訓練過程受到的暴力，也迫使他們克服軟弱的特質，指出男孩在性別刻板印象下，逐漸社會化的過程，揭示運動文化裡，性別分化與社會化的現象。這與許貞雯對運動文化中，強調的男性氣質的現象可相互參照，成為我在棒球紀錄片研究上的借鏡。

魏均在〈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裡提到<sup>37</sup>，不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運動競賽一直以來，都是創作者熱愛的題材。因為競賽的本身就已經充滿戲劇性張力，如果能讓觀眾順利認同主角，那麼競賽的輸贏無疑更能牢牢吸引住觀眾目光。但是，若只停留在運動競賽的青春活力，也會忽視了兒童／青少年參與運動背後的社會階級問題。因此，紀錄片是否能穿透台灣體育背後的政治結構，與運動文化的現實層面，也是運動紀錄片值得深入關注的地方。<sup>3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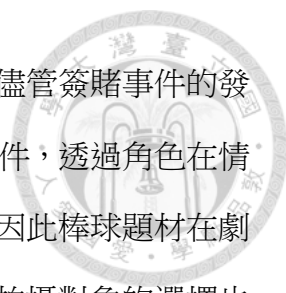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我發現棒球相關的影像創作，劇情片多以「學生」的身分，表現青春的熱血和跨越困境的成長，並結合社會中棒球事件的社會脈絡，作為劇情推動的轉折。像是《校園大作戰》、《天后之戰》與《KANO》，是關於學生棒球隊的故事；

---

<sup>36</sup> 謝世宗，〈男性氣質：逆讀《翻滾吧！男孩》〉，《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台北：五南，2015.02），頁 220-237。

<sup>37</sup> 魏均〈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 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5-157。

<sup>38</sup> 魏均〈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 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6。



《九降風》更將職棒簽賭事件融入劇情，作為情節轉折的註記。儘管簽賭事件的發生，重創了職業棒球的聲譽，但是在劇情片裡，反而運用簽賭事件，透過角色在情節中洗心革面、浪子回頭的過程，將劇情推往溫馨的快樂結局。因此棒球題材在劇情片裡，也多具有勵志和勸世的正面印象。而運動紀錄片方面，拍攝對象的選擇也多以兒童、青少年為主，記錄他們訓練過程的同時，也記錄他們的成長歷程，透過導演觀點與詮釋，也讓我們看見運動內部的複雜議題。

本文選擇棒球紀錄片作為分析對象的原因，是因為棒球運動過去在國家介入的發展背景下，使我好奇透過新紀錄片作為方法，看棒球紀錄片會如何藉由兒童、青少年在培訓體制的成長過程，論述台灣棒球發展的面貌，進而對紀錄片所再現的培訓體制進行批判與反思。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 一、研究範圍

本文分析三部紀錄片作品：分別是 2000 年曾文珍導演的《冠軍之後》、2010 年李秀美導演的《揮棒》，與 2008 年沈可尚、廖敬堯導演的《野球孩子》。這三部紀錄片，都是以基層棒球的兒童及青少年為主要拍攝對象。所以，從台灣新紀錄片研究，探討紀錄片如何「論述台灣棒球」的同時，主要關懷的對象就是在培訓體制內的兒童與青少年球員。從他們成長的軌跡，也有助於理解台灣基層棒球的生態，以及台灣棒球特殊的文化現象。我之所以選擇《冠軍之後》、《揮棒》，與《野球孩子》的原因，與紀錄片的主題有關。

首先是《冠軍之後》，導演曾文珍畢業於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學生時期就以紀錄片為畢業作品。1997 年進入南藝大音像所，在學期間拍攝的《我的回家作業》獲得廣大的討論，獲得 1998 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的台灣獎以及 1999 年金穗獎特

別獎。<sup>39</sup>導演關懷的議題橫跨家庭、運動、政治、歷史、族群等，延續導演關懷的議題，《冠軍之後》是導演以南王少棒隊中，三名卑南族少年為拍攝對象，記錄他們奪得小馬聯盟世界冠軍後，進入國中青少棒的成長故事。導演的目的，是拍攝一部關於童年、棒球、教育與價值觀的紀錄片。<sup>40</sup>《冠軍之後》片名所標示的「冠軍」，其重要性在於，這是台灣自 1997 年退出世界少棒聯盟以後，重回世界舞台的第一座冠軍。<sup>41</sup>然而，台灣退出世界少棒聯盟的原因，是因為台灣常以學校掛名或轉學的方式，組成菁英球隊參賽，與世界少棒聯盟推行棒球運動的理念不符。

因此，《冠軍之後》並不是要述說台灣棒球的豐功偉業，而是要呈現球員沒有選擇的權利，被教練掌控、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所綁架的生命狀態。<sup>42</sup>另外，《冠軍之後》也是台灣第一部探討少年棒球的紀錄片，揭示國家的榮耀，其實是建立在這些兒童、青少年球員犧牲所換來的成就，以及成人價值觀的侵入下，被剝奪的童年。

其次是《揮棒》，導演李秀美，自 1988 年起，便從事與兒童媒體相關的工作，也曾擔任公視特約兒童節目的研究員。<sup>43</sup>並於 2004 年，成立「囡仔影音公社」的個人工作室，獨立製作兒童與青少年的紀錄片。<sup>44</sup>李秀美導演的首部作品《十六·轉大人》，<sup>45</sup>該作品分為《十六轉大人—女孩們》和《十六轉大人—男孩們》兩部分。《女孩們》是以漢人少女吳俐欣為對象，從台灣禮俗「做十六」看見青少年透過儀式的洗禮，成為大人以後的心境轉變；《男孩們》則以卑南族少年陳彥翰為對象，拍攝他如何通過部落成年儀式的考驗。此外，導演更結合跨國的拍攝，透過不

---

<sup>39</sup> 引述自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影人目錄，<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711>。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sup>40</sup> 林木材，〈自由的姿態——曾文珍〉，《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台北：遠流，2012.10），頁 169。

<sup>41</sup> 美國小馬聯盟主辦的賽事，允許聯軍組隊的方式參加。台灣少棒隊連續兩年稱霸，也讓南王少棒隊有紅葉第二的美譽。2000 年發行的新台幣伍佰元鈔上，也為南王少棒隊的光榮歷史留下見證。

<sup>42</sup> 林木材，〈自由的姿態——曾文珍〉，《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台北：遠流，2012.10），頁 169。

<sup>43</sup> 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https://viewpoint.pts.org.tw/>。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sup>44</sup> 囡仔影音公社，<http://www.cm-workshop.com/whatsnew.php>。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sup>45</sup> 播放日期為 2006 年 3 月 23 日。公視紀錄片平台，<http://viewpoint.pts.org.tw/>。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呈現青少年成長過程的心境變化。<sup>46</sup>第二部作品《我會演布袋戲》，<sup>47</sup>導演拍攝一位祖籍西藏拉薩的女孩土登悅生，學習布袋戲的過程，她經歷了文化適應的挫折與憤怒，但也充滿成就與快樂，交織成豐富、充實的童年時光。

李秀美導演對兒童及青少年議題的關注，在《十六·轉大人》裡，從文化儀式切入青少年逐漸成熟的過程，結合社會文化的蛻變儀式，探究被攝者的心境轉變。從被拍攝者對未來的期許、困惑與迷茫，展現青少年階段，介於成熟與未成熟之間的曖昧狀態。《我會演布袋戲》以小學生為對象，拍攝她學習布袋戲的過程。主角歷經挫折，一步步克服語言和技術的挑戰，成為難得一見的女頭手<sup>48</sup>。這兩部紀錄片都扣合導演對兒童、青少年議題的關注，深入呈現他們的處境、夢想與成長議題。兒童與青少年的「夢想」，和追尋夢想的「堅持」，也成為導演關懷的母題。

《揮棒》承襲導演關懷的母題，導演以卑南少年陳彥儒為主角，記錄他追尋職棒夢想的成長過程，追逐夢想的背後原因，也是彥儒企圖爭取一個階層流動的機會，長達七年的拍攝，也記錄了彥儒從少棒到成棒階段中，面對的競爭壓力與文化適應問題。另外，導演在拍攝《揮棒》的同時，也正在進行《我會演布袋戲的》的拍攝。<sup>49</sup>因此，李秀美導演的紀錄片，在觀點的詮釋上皆有類似的關懷，探討兒童、青少年的成長、傳統文化的儀式與追逐夢想的過程。另外，陳彥儒，與《冠軍之後》的三位主角同樣都來自南王少棒隊。因此，《冠軍之後》作為棒球少年是否繼續棒球升學思考與選擇的分歧；《揮棒》則是球員選擇繼續棒球之路後，看見棒球培訓環境內的高度競爭與殘酷現實，是一條必須拿下無數個「冠軍」，才有可能成功的

<sup>46</sup> 《十六轉大人》除了以台灣漢人與卑南族人為拍攝對象外，也以中國、烏茲別克的青少年為對象，從家庭及學校生活，關心他／她們在成年儀式後的成長與變化。

<sup>47</sup> 囡仔影音公社製作，自 2003 年 5 月起，以 3 年 9 個月時間完成的《我會演布袋戲》，播放日期為 2007 年 2 月 16 日。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https://viewpoint.pts.org.tw/>。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sup>48</sup> 戲班的主演者，負責大部分戲偶演出與全場的口白，是布袋戲中的靈魂人物。

<sup>49</sup> 由囡仔影音公社的佈告欄訊息得知《我會演布袋戲》是從 2003 年 5 月起開始拍攝，經過 3 年 9 個月完成。並從《揮棒》紀錄片中，可看見導演與陳彥儒相遇的時間也是 2003 年的 5 月份。而《十六轉大人—男孩們》的陳彥翰，也出現在《揮棒》的拍攝中，是影響陳彥儒接觸棒球的重要他人。



道路。

考量本論文研究主題的承接關係，沒有依照紀錄片的發行時間作為論文的結構規劃，而是將《揮棒》追逐職棒夢想的過程，視為《冠軍之後》球員繼續棒球之路的延伸。因此，將 2010 年的《揮棒》，置於 2008 年的《野球孩子》之前，接續在第二章《冠軍之後》的分析之後。


最後，是沈可尚、廖敬堯共同拍攝的《野球孩子》。沈可尚導演，作品橫跨劇情、紀錄、實驗電影及商業廣告。<sup>50</sup>廖敬堯導演，從學生時代便開始參與電影、電視戲劇，及紀錄片製作，主要擔任導演、攝影、剪接等相關職務。

《野球孩子》是台灣第一部，以少棒生活為主題，登上首輪院線放映的紀錄片。電影的拍攝對象是花蓮富源少棒隊的成員，記錄這群即將告別童年的男孩們成長的故事。導演運用直接電影的概念，以旁觀者的身分，聚焦棒球少年生活的童趣與天真。然而，導演再現童年的方式，選擇淡化紀錄片的議題性，因此不同於其他報導式紀錄片，《野球孩子》裡沒有旁白，也缺乏人物訪談和背景的說明，希望以這種形式呈現童年時光的純粹。導演的動機，或許和「院線片」的模式有關，為了讓紀錄片「好看」而有去政治性的疑慮。但是《野球孩子》透過最後和教練的正面訪談，從教練執教的理念上，展現與其他教練不同的理想追求。相較於《冠軍之後》與《揮棒》中，教練與球員對「冠軍」的執著；《野球孩子》的教練，卻強調球員學業與訓練的平衡，「沒有讀書，就不能打球」的理念，讓我們看見棒球作為教育的方式，以及兒童、青少年在運動中體驗成長與樂趣的可能。

綜上所述，本文選擇這三部紀錄片的原因，在於《冠軍之後》是第一部探討少年棒球的紀錄片，曾文珍導演從球員學制的選擇，指出教育與訓練的失衡，以及球員如何在培訓體制內，受到教練與國家體制的控制，揭示國家對球員身體的束縛與消耗。《揮棒》則可視為《冠軍之後》，球員選擇棒球升學之路的延伸，也是第一部長時間拍攝球員，李秀美導演記錄主角從少棒到成棒追求夢想的過程，指出台灣棒

---

<sup>50</sup>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makers/1919>。2020 年 4 月 17 日檢索。



球環境的高度競爭，同時也延續《冠軍之後》探討的教育議題，並更進一步揭示國家體制與職棒選秀制度的共構關係。《野球孩子》則作為第一部棒球主題的院線紀錄片，沈可尚、廖敬堯導演讓我們看見棒球運動陪伴兒童成長的快樂。不同於前述兩部紀錄片所揭示的體制束縛，以及追求冠軍的現實，而是將棒球作為童年記憶的召喚，藉由教練與球員之間相處的互動與教練執教的理念差異，也提供另一個棒球紀錄片的拍攝形式，反思台灣棒球過於追求冠軍的思維，以及思考兒童及青少年球員如何在訓練與教育上取得平衡，建構棒球少年完整的童年。

## 二、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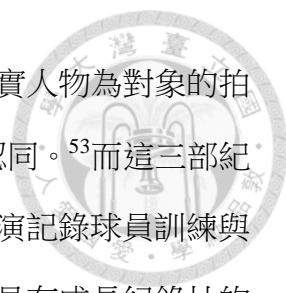
李道明在《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修訂二版)》中，提到紀錄片的定義，大多圍繞在格里爾生於 1930 年代給紀錄片的定義：「對真實事物的創意性處理」。而所謂創意性的處理，是指紀錄片不只是事實的「純粹記錄」而是對事實進行的詮釋。<sup>51</sup>邱貴芬統整目前紀錄片研究者對紀錄片的共識是：紀錄片是導演以現實世界作為材料，把素材加以篩選組織，表達某種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再現。因此紀錄片不只是純粹的影像記錄，而是具有詮釋觀點的文本。邱貴芬從台灣新紀錄片產生的脈絡，指出的新紀錄片的「新」，具有幾種特質：強調紀錄觀點，紀錄片是導演與被拍攝的歷史人物、事件的協商結果；紀錄片拍攝過程必須審慎面對倫理問題；紀錄片關照弱勢，對被拍攝者有其責任與承諾。然而晚近台灣紀錄片的發展，也產生個人化、藝術化、商業化趨勢，也帶來不一樣的觀看重點與研究課題。<sup>52</sup>

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是三部以棒球為主題的運動紀錄片：《冠軍之後》、《揮棒》與《野球孩子》。運動題材向來是紀錄片與劇情片熱愛的拍攝主題，因為運動

---

<sup>51</sup> 李道明，〈第二章：什麼是紀錄片〉，《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台北：三民出版社，2015.05），頁 107、109。

<sup>52</sup> 邱貴芬，〈第一章：導論〉，《「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 25、35、44。



競賽的性質，在競賽過程會展現戲劇性的張力，結合紀錄片以真實人物為對象的拍攝，透過人物努力的過程與故事，也吸引觀眾對主角的關心與認同。<sup>53</sup>而這三部紀錄片主要的拍攝對象，都是兒童、青少年階段的棒球員，因此導演記錄球員訓練與競賽過程的同時，也記錄他們成長的歷程。所以這三部紀錄片也具有成長紀錄片的性質，藉由小孩轉變為大人階段的曖昧、迷惘，或對夢想的追求，表現他們經由運動而逐漸社會化的成長歷程。

這三部紀錄片的導演，在記錄兒童、青少年成長的同時，也從影像中再現台灣棒球培訓體制的政經結構與文化。參與棒球運動的少年球員，多有家庭結構與社經條件不足的背景，因此出生於弱勢階級的球員們，打球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興趣，更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經濟環境，與尋求階級翻轉的可能。結合紀錄片採用訪談的形式，透過球員或親屬的現身說法，分別從學制、族群及成長等面向，探討球員在培訓體制所遭遇的問題，同時也指出國家體制與職業棒球制度的共構關係，對球員身體的控制與束縛。如同邱貴芬提到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動機，是一種「為弱勢發聲」的倫理行動，展現出紀錄片社會關懷的功能。<sup>54</sup>Bill Nichols 提到紀錄片如何透過訪談處理社會和政治問題，藉由訪談的形式記錄被拍攝者講述的聲音，提供不同的觀點，也有鬆動過往社會主流價值觀下，被忽略或壓抑的文化和歷史，幫助我們重新審視世界的其他面向。<sup>55</sup>

這三部棒球紀錄片再現兒童、青少年球員的成長過程，也體現球員在培訓體制遭遇的困境，指出台灣基層棒球的培訓體制，仍延續體育外交時代的訓練風氣，教練軍事化風格的訓練，強調競技技術與冠軍利益的發展，球員也受到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的束縛，使棒球運動脫離不了為國爭光的工具性質。<sup>56</sup>因此棒球紀錄片，也

---

<sup>53</sup> 魏玟，〈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6。

<sup>54</sup> 邱貴芬，〈第一章：導論〉，《「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2016年1月），頁 44、45。

<sup>55</sup> Bill Nichols 著，井迎兆譯，〈第 8 章：紀錄片如何處理社會和政治問題〉，《紀錄片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20 年 2 月），頁 237、259。

<sup>56</sup> 張威克，〈台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運動文化研究》第 10 期（2009.09），頁 108、

提供了不同的觀點，思索台灣棒球的「國球」意涵。國家榮譽其實是建立在兒童、青少年球員的犧牲所換得的成就。因此，透過紀錄片的觀點與詮釋，也讓我們看見運動的複雜議題，具有鬆動台灣「國球神話」的可能性。

本文以新紀錄片研究為方法，分析棒球紀錄片如何「論述台灣棒球」，分析的基礎是使用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中，對 Bill Nichols 六種紀錄片模式的引進，探討紀錄片不同類型之間的可能性與侷限性。<sup>57</sup>六種紀錄片模式分別為詩意的模式、解說的模式、觀察的模式、參與的模式、反身自省的模式、表現的模式等六種。本文對棒球紀錄片的分析，便以紀錄片模式的類型為基礎，鎖定紀錄片再現兒童、青少年球員在培訓體制的成長過程，以及遭遇的問題，指出球員參與運動背後的階級處境現實，揭示台灣棒球的國家體制及運動文化。

《冠軍之後》是一部具有解說模式性質的紀錄片，解說模式的紀錄片再現特徵是大量使用旁白，當作全知觀點，將所知的事實現象與脈絡，加以解說並下判斷。因此解說模式的紀錄片具有較為強烈的主導性，營造客觀性的感覺，透過足夠的辯論和解析能力讓觀眾感受到被說服的力量。<sup>58</sup>在剪接影像的呈現上，比較會維持口頭辯論或觀點的連續性，展現連續的證據邏輯。<sup>59</sup>《冠軍之後》的導演曾文珍，先從球員參與棒球的原因，帶出球員的家庭結構和經濟困境。從球員不同的升學選擇，看見台灣基層棒球培訓環境的差異，以及球員在教育與訓練上的失衡情形。從球員訓練的過程中，也逐漸培訓體制中內化「冠軍至上」的價值觀。球員在教練、國家體制的控制下，脫離原先對運動的樂趣，成為追求冠軍的工具，更從球員無法拒絕國手徵召的事件上，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束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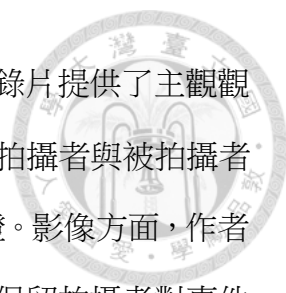
118。

<sup>57</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2003.01），頁 1-33。

<sup>58</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2003.01），頁 7。

<sup>59</sup> Bill Nichols 著、井迎兆譯，〈第 6 章：我們如何分辨紀錄片的類型和模式？什麼是詩意模式、解說模式和反思模式〉，《紀錄片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20.02），頁 168。





《揮棒》是一部具有參與模式性質的紀錄片，參與模式的紀錄片提供了主觀觀點可以被認可的合法性，其再現真實的方式在聲音方面，運用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互動的敘述，這兩種聲音在影片中可以交替出現或互相辯證。影像方面，作者經常現身在影片中，直接與被攝者討論事件，或進行意見交換。保留拍攝者對事件的介入，讓拍攝者和被攝者能一同參與製作的過程，呈現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互信共享的合作關係。<sup>60</sup>李秀美導演在《揮棒》中，拍攝球員追逐職棒夢想的過程，並沒有現身在影片當中，而是透過導演與被拍攝者的訪談和互動所體現的信任關係，看見被拍攝者在青棒階段高度競爭的訓練環境裡，探討延伸《冠軍之後》對教育與國家體制的議題，並更進一步點出原住民球員在培訓體制內族群文化適應的問題。李秀美導演透過拍攝陳彥儒在青棒階段的學習情形與受傷的遭遇，再現被拍攝者的實際生活處境，並進一步指出教育與訓練失衡下，球員單一專業化導致生涯發展受限的問題，以及國家藉由體制與職棒制度的共構關係，合理化球員為國犧牲與奉獻的目的，達成對球員身體的控制。


《野球孩子》是一部具有觀察模式特質的紀錄片，觀察模式的紀錄片特質在於拍攝者隱藏在攝影機之後，自然地、安靜地去經歷現實所發生的事。如同牆壁上的蒼蠅，不動聲色的隱藏在鏡頭之後，不被發現、也不干預現實。這樣的拍攝理念下的拍攝行為，如何尊重被攝者，避免偷窺的道德考量是觀察模式的一大挑戰。<sup>61</sup>由於《野球孩子》是以「院線片」的模式製作，也夠從邱貴芬所提及晚近紀錄片發展傾向個人化、藝術化、商業化的面相作為思考，<sup>62</sup>從紀錄片是否會為了迎合主流，在內容上有去政治化的方向思考。然而，導演為再現棒球少年童年時光生活的美好，對棒球運動中可探討的議題，僅再現了部分的事實，沒有像前述兩部紀錄片般的深

---

<sup>60</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2003.01），頁 12、13。

<sup>61</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2003.01），頁 9。

<sup>62</sup> 邱貴芬，〈第一章：導論〉，《「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2016 年 1 月），頁 46、47。



入議題核心。但是導演從「快樂的童年」思考棒球少年的成長，更結合教練執教理念的呈現，再現出不同前述兩片裡教練與球員的緊張關係，反而是有如父愛對球員的呵護與關愛。教練要球員在學業與訓練間，維持平衡的發展，對過往台灣強調競技與功利導向的棒球文化，提供了另一種培訓制度的思考，思考如何不再讓兒童、青少棒球員束縛成人的價值觀下，能夠享有快樂的童年。

## 第四節 章節架構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章說明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的形成、文獻回顧、研究範圍與方法，及章節架構。台灣新紀錄片的研究提供了，論述台灣的可能。連結新版棒球史同樣對台灣議題的關心，讓我好奇以新紀錄片作為方法，看台灣棒球會看見什麼？以及紀錄片又是如何論述台灣棒球，進而介入國家體制的反省與批判。文獻回顧，我從的棒球相關影像作品，分成紀錄片與劇情片兩部分。因為棒球相關的影像作品，多有貼近台灣棒球運動的社會發展脈絡，以及反映台灣棒球運動的文化現象。研究方法方面，我以新紀錄片研究方法與紀錄片模式分析為基礎，看棒球紀錄片體現的關懷社會與弱勢的特質，從參與棒球運動的兒童及青少年球員，於培訓體制面對的問題，進而介入國家體制與培訓制度的反思。從本文選擇的研究對象：《冠軍之後》、《揮棒》、《野球孩子》三部棒球紀錄片，看見兒童、青少年球員的成長，以及球員和運動文化交織的複雜圖像。最後由章節架構簡介各章的主要內容。



## 第二章 從球員到學生：《冠軍之後》的卑南三少年

### 第一節 卑南國中的陸氏兄弟

### 第二節 台東體中的蔡志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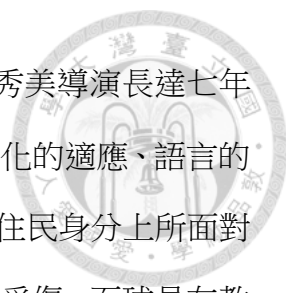
第二章以從學生到球員為題，分析《冠軍之後》的三個卑南族少年，在他們奪得世界冠軍後，升上國中青少棒階段時，所面對的升學問題。先從球員參與棒球的原因開始，少年們起初的動機，是因為運動帶來的樂趣，而教練卻是希望球員透過運動升學的道路，減輕未來升學的負擔，紀錄片指出原住民球員參與棒球背後，有其家庭結構與社會經濟弱勢的問題。曾文珍導演從陸氏兄弟與蔡志偉就讀不同學校的選擇，開展出紀錄片敘事的兩條路線，除了對比學校硬體設施與教師的差異外，也指出他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是在長時間訓練和比賽下導致的學習落後。球員因為長期無法在學習過程取得成就，也容易傾向放棄學業，專注球技的培養，但是單一專業的養成，也造成球員未來出路的限縮。另外，球員若是拒絕國手的徵召，還會被棒球協會阻斷未來的棒球路。《冠軍之後》揭示少年球員在教育與訓練間，導致的學生／球員身分的失衡，也揭示球員在國家體制下身不由己的處境。

## 第三章 從台東到新北：《揮棒》的部落少年與平地少年

### 第一節 在部落祭典與棒球培訓之間

### 第二節 身體的鍛鍊與傷害

第三章以台東到台北為題，主要是標示少年陳彥儒為追求職棒夢想，到外地求學的成長過程。《揮棒》延續《冠軍之後》關於原住民棒球運動參與的議題，李秀美導演以「原住民夢想的典型」，指稱原住民對職業棒球的追求。然而原住民對職棒的嚮往，其與媒體、國家、教育政策有關，而過於強調原住民的運動表現，也掩



蓋了原住民在教育制度的弱勢處境及教育資源不足的現實。李秀美導演長達七年的拍攝，見證彥儒從國小到大學的成長，彥儒除了要面對不同文化的適應、語言的隔閡，還有長時間訓練下和原鄉文化的脫節，看見他在球員／原住民身分上所面對的焦慮。由於青棒階段的高度競爭，球員難免會在訓練與競賽中受傷，而球員在教練的教導下，不計個人的犧牲，多抱持著「為了勝利，不擇手段」信念，也提高球員受傷的風險。另外，球員為擠進職棒的窄門，球員也樂於接受國手徵召，因為國手的資格，讓球員能享有代訓的優勢，也能增加球探的關注，提升進入職棒或旅外的機會。於此，自《冠軍之後》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的束縛後，《揮棒》更進一步指出國家體制與職棒選秀制度的共構關係，合理化國家對球員的徵召，以及為國爭光的正當性。

#### 第四章 從電視到院線：《野球孩子》的花蓮富源棒球童年

##### 第一節 從性教育開始的小學生活

##### 第二節 在教室之外的集訓與競賽

第四章從電視到院線為題，主要是強調《野球孩子》的院線紀錄片性質，反映在紀錄片的敘事結構上，沈可尚導演沒有對深入「棒球議題」的探討，選擇再現棒球少年的快樂童年。導演主要拍攝的對象是少棒隊六年級的球員，記錄他們在兒童與青少年之間的轉換，與青春期的曖昧，看見棒球少年的日常生活。《野球孩子》從一堂性教育的課堂開始，象徵球員們正處在兒童與青少年的過渡階段，也預示童年的結束。他們最後的目標就是參加全國少棒大賽，球員為備戰而集訓時，球場上的內外，分別呈現球員不同的面相。因此，我將球場的內外，劃分為兩個空間，分別指出球員兒童／大人形象。球員在球場內，接受嚴格的訓練，遵守教練的命令，與團體規範，如同從小孩轉變為大人的儀式。當球員離開球場以後，不論是在學校的課堂、日常的生活，或與家人的相處上，又恢復為兒童天真的模樣，反映他們逐

漸脫離「兒童」，朝向「大人」的成長過程。另外，從教練的理念上，比起球隊的勝負，教練更重視球員學習與運動的均衡發展，抽離冠軍至上的思維，反思台灣棒球培訓體制，應該為球員帶來的理念與價值。



## 第五章 結論：升學、族群、成長

本章結論，將綜合三部紀錄片《冠軍之後》、《揮棒》與《野球孩子》，指出紀錄片如何論述台灣棒球，並從學制、族群與成長三個面向，總結三部棒球紀錄片。

《冠軍之後》藉由球員學制的選擇，探討台灣棒球培訓體制對學生／球員身分的影響，同時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束縛與暴力。《揮棒》則從原住民少年，追求職棒夢想的過程，探討原住民運動參與的原因，以及文化適應的問題。同時，指出國家體制與職棒選秀的共構關係下，合理化球員為國爭光與犧牲，以及球員在培訓體制中耗損的身體／學識造成的發展限制。《野球孩子》作為培訓制度的另一種思考，結合球員在運動中感受的快樂，與教練執教理念差異，反思運動應帶給球員的成長意義與精神意涵，最後指出本文的研究價值與研究限制。

## 第二章 從球員到學生：《冠軍之後》的卑南三少年



1+1+363=365

1=球賽終了，觀眾歡聲雷動，球員綻開笑容興奮吶喊。

1=機場出口大批媒體，眾人夾道歡迎，驕傲返鄉遊街。

363=無止盡的訓練，這是棒球隊的生活，是冠軍之後。<sup>63</sup>


——《冠軍之後》

在運動競賽的世界裡，每一場賽事只會有一座冠軍。我們通常只會看見競賽的過程與結果，卻鮮少看見運動員背後的努力。但紀錄片卻能讓我們貼近運動員的訓練過程，看見他們的努力，即便獲得世界冠軍的榮譽，運動訓練仍未完結，將無止盡的持續下去。

《冠軍之後》，曾文珍導演以三位卑南族少年為拍攝對象，記錄他們在小馬聯盟少棒賽奪得世界冠軍後，脫離少棒進入青少棒階段的成長故事。電影開場的字卡，說明了紀錄片的主題：「本片是三位卑南族的中華少棒隊球員，回到台東進入國中後的一段成長記事（1998.8—1999.9）」。三位少年，分別是蔡志偉、陸俊宇與陸俊瑋雙胞胎兄弟，他們都來自台東縣南王國小少棒隊。南王國小是一所師生僅百餘人的小學校，這所人數不多的小學，能夠成立棒球隊的原因，是來自卑南族社區長老們的推動與支持。長老們認為卑南族的年輕人，逐漸遺忘了卑南文化中敬老尊賢的道理。因此，希望藉由棒球運動，讓他們學習服從命令、團隊合作的拼鬥精神，引導社區內的卑南孩子們回歸卑南文化。<sup>64</sup>但是學校並不支持成立球隊，擔心學生加

<sup>63</sup> 徵引自《冠軍之後》電影介紹，Taiwan Docs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4132>。3月15檢索。

<sup>64</sup> 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台東：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頁86。



入球隊後，反而會耽誤課業。直到球隊成立後，老師發現對付棒球隊裡調皮又不愛唸書的學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告訴教練」，也讓老師們對棒球隊的看法逐漸改觀。南王少棒隊在陸永茂教練的帶領下，當時的比賽成績相當亮眼，也令人聯想到叱吒一時的紅葉少棒，有紅葉第二的美名。南王少棒隊在 1998、1999 這兩年囊括全國十八座賽事冠軍，以及兩座世界冠軍，這三位卑南少年就是當時球隊的核心成員。

本章以《冠軍之後》為分析對象，分析導演如何再現這三位少年球員，晉身青少棒後的成長，以及球員在不同學習環境下所遇到的問題。曾文珍導演從球員升學選擇的不同所體驗到棒球經驗差異，成為紀錄片敘事的兩個面向，分為陸氏兄弟，與蔡志偉兩條敘事路線。導演選擇拍攝陸氏兄弟與蔡志偉的原因，是因為陸氏兄弟是陸永茂教練的姪子，從陸永茂兼具叔叔與教練的身分上，指出球員因家庭結構與教練控制的升學過程。蔡志偉的重要性則在於，教練認為他具有優異的棒球才能，但是在家人與個人的意願上，還是希望能夠兼顧學生與球員的身分。因此從導演選擇拍攝對象的觀點來看，其實是聚焦於青少年球員如何面對教育制度與訓練體制的選擇。從導演的視角觀察球員在球場上沒有選擇，被教練掌控，被國家榮譽與世界冠軍期待綁架，不能反抗的生命狀態。<sup>65</sup>從他們接觸棒球的動機、家庭成員對孩子打球的看法，以及學校教育與棒球訓練上，導致的學生／球員身分的衝突，看見少年球員在台灣基層棒球體制下所面臨的問題與考驗。

因為球員們接受長時間的訓練，導致他們無法兼顧學生的身分，紀錄片分別從教師、教練的立場，反映學校教育與棒球訓練的拉扯和矛盾，再現夾雜其中的少年球員，不知如何回應大人的期待。這份期待的背後，其實也潛藏著國家對優秀球員的需要，期待他們為國爭光。球員若是拒絕接受國家的徵召，拒絕的後果，可能就從此被斷絕未來的棒球路。因此，棒球紀錄片不僅記錄了少年球員的成長過程，也

---

<sup>65</sup> 林木材，〈自由的姿態——曾文珍〉，《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10），頁 169。



體現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控制的事實。

然而，棒球對於這些剛脫離兒童時期，進入青少年階段的球員而言，又具有什麼結構的原因，以及學校教師和教練等幾個面向，指出球員升學後面對的學制問題，以及在培訓制度內逐漸成為奪冠工具的過程，揭示教練、國家對球員身體的束縛與控制。

## 第一節 卑南國中的陸氏兄弟

### 一、從興趣變訓練：教練要我們打棒球

紀錄片的前段，導演以訪談的形式，訪問球員接觸棒球的契機，首先是陸俊瑋與陸俊宇這對雙胞胎兄弟。

陸俊瑋：二年級開始打棒球，被逼的，被陸永茂打。

陸俊宇：二年級開始打棒球，剛開始覺得很好玩，後來覺得不好玩，被陸永茂打。(3:45—3:53)



圖 2-1-1 陸俊瑋述說打球契機<sup>66</sup>

<sup>66</sup> 本章分析《冠軍之後》的影像截圖，於 2020 年 7 月 30 日學位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謝欣苓與王萬睿老師，皆提醒影像授權取得的問題；經過老師們的建議後，我在 2020 年 8 月 3 日與公共電視新媒體部媒體資材組的陳淑媛小姐以 Email 取得聯繫，請益影像授權許可的可能性。由於公共電視沒有《冠軍之後》的重製權，因此無法獲得影像截圖的授權。在陳淑媛小姐的協助與建議





兄弟兩人都提到，開始接觸棒球是因為陸永茂的要求（見圖片 2-1-1），陸永茂是他們的叔叔，也是南王國小少棒隊的教練。他們剛開始打棒球的時候，是因為享受到棒球帶來的樂趣，但是在接受正式的訓練後，漸漸覺得棒球沒那麼有趣了。從少年球員的視角來看，運動好不好玩、有不有趣，才是吸引他們的重點。曾文珍導演對陸氏兄弟的訪談畫面，可以看見球員是以側身而非正面面對鏡頭，這在後續訪談中，球員前述說自身棒球的經驗與生活時，也多採取側身的姿態。這種形式再現出球員缺乏自信肢體，也從訪談的內容感受到球員對棒球訓練的無可奈何與對教練的恐懼。

因為就教練的立場而言，他要求陸氏兄弟加入球隊的原因，並不是要他們將棒球作為興趣的培養，而是要靠棒球謀求將來的出路。陸永茂教練會這麼做的原因，其實與球員的家庭結構有關。陸俊宇和陸俊瑋兩兄弟，因為家中經濟條件不是很好，若是將來選擇一般升學的方式，家裡可能也無法負擔經濟的壓力。因此，陸永茂根據自身運動相關知識與升學經驗，希望他們能透過運動升學的管道，減輕經濟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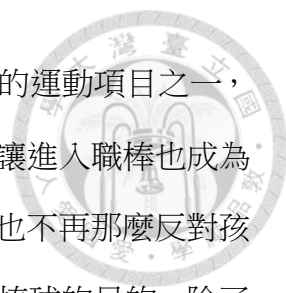
另外，由於偏鄉地區的工作機會較少，球員的父母有很高的機率離開部落，前往都市或其他縣市發展。這也造成偏鄉地區的家庭結構不完整，隔代教養或單親家庭情況普遍，加上經濟條件的相對弱勢，確實要讓孩子們依循一般的升學管道，在經濟面的壓力也較為沉重。因此，陸永茂要他們打棒球的目的，是希望球員能夠減輕家庭經濟的負擔，並藉由球隊為球員提供的家庭缺乏的照顧功能。

球員選擇棒球作為升學的管道，是以運動績優為前提的保障制度。這個制度的出現，最早是教育部於 1965 年所訂定的「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sup>67</sup>主要以甄試或甄審的方式，讓運動績優的高中運動員，能夠升學到公私立

---

下，引用著作權法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作為本章影像截圖的合法使用申明。徵引自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70017>。2020 年 8 月 3 日檢索。

<sup>67</sup> 徵引自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2020 年 4 月 18 日檢索。



大學的體育系或是一般科系。另外，棒球運動是台灣少數職業化的運動項目之一，因此選擇棒球除了有助升學，更提供了未來就業的發展機會，也讓進入職棒也成為多數少年球員的夢想。原先認為孩子打棒球會沒有前途的家長，也不再那麼反對孩子加入棒球隊，甚至也有家長鼓勵孩子投身棒球運動。<sup>68</sup>球員打棒球的目的，除了運動的升學管道能減輕家庭的教育開銷，還有進入職棒的美好前景。<sup>69</sup>

選擇棒球對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家庭來說，也能確保孩子在課後有人能幫忙照顧，替代一定程度的家庭功能。林文蘭指出，投身棒球的運動員，大多來自經濟弱勢的家庭，加上家長外出就業，也讓棒球運動和隊友之間相處，成為原住民孩童成長的夥伴。<sup>70</sup>所以加入棒球隊，儼然是另一種較低成本球員安親班。

從紀錄片看見學生球員選擇棒球的動機，主要是能夠和同儕相處享受運動的樂趣，反映的是球員們青澀、純真的想法。但是教練的目的，卻是期望球員，透過運動升學管道，扭轉自己的未來。因此，教練也會以更為嚴肅的態度，訓練球員。如陸俊宇訪談中所言：「我以為打棒球很快樂啊，我就跟著打，打到一半的時候就不快樂了。開始被教練打，打到都不想練了（7:-36—8:01）。」由於教練對他們嚴格訓練的過程，也與原先運動帶來的樂趣相左。教練要他們接受專業訓練，培養球員服從的態度，與競爭求存的決心，目的是為了打造一個，能夠面對未來任何挑戰的身體。

這其實也顛覆了一般我們對於棒球青春、熱血的想像，球員在訓練的過程中，體驗到的並不是全然是運動的樂趣，而是長時間的訓練與教練的訓斥。陸氏兄弟覺得打球不快樂的原因，與教練的體罰有關。紀錄片拍攝的時間點，是在禁止「體罰」之前，而台灣棒球的訓練模式，也多採用軍事化的風格，因此體罰也普遍出現在教練對球員的指導上。

---

<sup>68</sup>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9期（2009.06），頁85。

<sup>69</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72。

<sup>70</sup> 林文蘭，〈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體育學報》第48卷第3期（2015.09），頁297。



圖 2-1-2 訓練過程的身體規訓


從畫面上（見圖片 2-1-2），看到的是教練對球員在身體規訓時展現的肢體暴力。導演透過鏡頭運用全景將教練與球隊成員呈現在畫面內，看見教練對球員展現肢體的暴力與體罰，球員們只能尊重與忍受教練的訓斥與指導。這個畫面透過全景所刻劃的整體感，指出教練與球員間權力位階的不同，與權力行使的關係，表示教練擁有對球員身體合理折磨與控制的權力。這些折磨與控制，一方面傳達出某種訓練過程的身體規訓，另一方面也是對球員陽剛氣質的打造方式。<sup>71</sup>

教練領導權力的建立，是以體罰與責備的方式，讓球員服從指導，並透過訓練對球員身體規律性的操作，灌輸球員服從的信念。<sup>72</sup>藉由這種從身體的壓制，內化到心理的服從，讓球員自動規訓身體的過程，往往能幫助教練在日常訓練與比賽時，能夠掌控整個球隊，進而獲致團體的成功。<sup>73</sup>另外，教練的訓練方式與帶隊風格，對球員人格及價值觀的養成，也會有直接性的影響。教練主要帶給球員的觀念，就是強固他們對「冠軍」的追求，以及球隊大於個人的犧牲奉獻精神。這也指出，台灣棒球的榮耀，其實是建立在強調競技性的長時間訓練模式，藉由少年球員的犧牲所換來的成就。

<sup>71</sup> 魏玠，〈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 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40。

<sup>72</sup> 高三福、李伯倫、謝明輝〈教練的領導威權、體罰、管教與責備：零體罰的思考〉，《中華體育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2016.09），頁 229。

<sup>73</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84。



面對嚴苛的訓練，陸俊宇也曾有過放棄的念頭，但他剛好受到國家的徵召成為國手，便決定好好的拼一次，最後也順利在小馬聯盟奪下冠軍的獎盃。這一次的成功經驗，也成為他往後繼續堅持下去的動力。另外，這次國手的經驗，在曾文珍導演訪問他關於中華隊與國中青少棒的訓練感受時，陸俊宇認為在中華隊的時候，大家比較有鬥志和競爭力；但是去卑南國中後，反而有身手退步的感覺。


從導演訪問陸俊宇球隊訓練感受差異的目的，似乎也指出了國家培訓體制的競爭性與目的性，這也指出陸俊宇在陸永茂教練的訓練與指導下，似乎成為完美服膺於國家的需要，每當有國際賽事的需求時，教練便能向國家提供最優秀的球員，競逐冠軍榮耀為國爭光。因此，台灣棒球的培訓制度，也如同生產球員的工廠，球員也如同工具一般，培訓球員的最大目的，就是提供符合國家需要的球員。

教練對學生球員的影響，不只是人格與價值觀的養成，也展現在升學的選擇上。陸俊宇、陸俊瑋兩兄弟升學的學校，是陸永茂決定的。陸永茂要他們選擇卑南國中的理由，是因為他希望能繼續培養自己的子弟兵。因為他沒有國中教練的資格，因此沒辦法去設備新穎的台東體中執教，因此要陸氏兄弟留在卑南國中就近管理。如陸俊宇所說：「他沒有教練證，又沒有考試，就不能當體中的教練」。<sup>74</sup>這指出教練對學生升學建議的影響，會根據自身的經驗，與熟悉的管道給予建議。但是像陸永茂在沒有取得正式教練資格的情況下，反倒限制了陸俊宇、陸俊瑋選擇體中的自由。因此，教練能力的差異與經驗，也可能會影響到球員未來的發展。

球員選擇學校的依據，是以球隊的教練，是否有帶隊奪冠的實績作為考量。按照陸俊宇的說法，沒有選擇體中的理由，是因為那裡沒有好的教練，他們的球隊沒有拿過冠軍。就他所知，這是全台東、全國教練的共識，認為球員去到那邊就會拿不到冠軍。於此，我們看見球員對於教練好壞的認知，是根據能不能拿到「冠軍」做衡量的標準，此種冠軍至上的功利主義，其實也間接合理化教練對球員的體罰與肢體暴力，或不當的訓練手段。因為，只要能讓球隊奪冠的就是好教練。

---

<sup>74</sup> 改寫自《冠軍之後》影片中，26:58—27:42 處。



然而，台灣基層棒球會如此重視冠軍的實績，並作為教練好壞的評斷標準，可以從當時教練的聘任方式得知。根據當時專任教練的聘任方法，參照〈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以及〈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量組織及審議規則〉<sup>75</sup>中，對教練考核績效的評量類別配分比率是，訓練指導佔百分之八十；年度成績考核佔百分之二十，而且這樣的標準在國小、國中或高中教練的績效評定都是如此。根據訓練指導績效的評定方式，就是依據就是球隊參賽的成績，作為評斷的標準。反而對學生球員而言，更為重要的運動精神、品德教育、選手心理、選手課業、選手生活及運動傷害防護等，皆不在評定項目內，而是作為績效範圍內額外加分的參考項目。

因此，從教練聘任的績效考核標準，也能看見學校聘任教練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優秀的運動員。教練實績的有無，會影響到自身的出路，因此，在球隊中，基本上都扮演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與自主性的角色，而學校考量教練帶隊的成績壓力，對於教練的管教方式也不會干涉太多。<sup>76</sup>因此，國內的基層棒球中，普遍存在高度權威化與軍事化訓練的風格，因應教練績效評定的內容，訓練選手就是為了取得冠軍實績。同時，為提高球隊的競爭力，訓練模式也會逐漸朝向競技目的發展，進而忽略運動員的身心狀況，以及功利觀念造成的價值觀偏差。

陸氏兄弟從冠軍之前到冠軍之後，他們打球的動機，經由教練的教導後，逐漸脫離當初在運動中感受到的樂趣，變成更有目的性的投身棒球運動，為了獲得冠軍，他們也更樂於擁抱艱辛的訓練，只要最後能夠拿到「冠軍」，就能合理化訓練過程的艱辛與不快，這些球員也逐漸受到教練的制約，球員的身體也逐漸從屬於國家，成為為國爭光的工具。<sup>77</sup>由於強調競技性訓練與追求冠軍的目的，教練往往對這些選手，施以過長與超負荷量的訓練。除了提升球員受傷機率，也可能導致球員提早

---

<sup>75</sup> 參考自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edu.law.moe.gov.tw>。2020年4月23日檢索。

<sup>76</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81。

<sup>77</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88。

告別運動的生涯，而且長時間的訓練，也有球員脫離正常教育體系的疑慮，成為台灣基層棒球值得被重視的問題。<sup>78</sup>



## 二、教育失衡：學校教育與棒球訓練的衝突


由於台灣棒球的培訓過程，過於強調對「冠軍」的追求，因此球員也可能提早接觸到專業化的訓練模式。就台灣棒球的培訓體制而言，球隊的單日訓練時數和訓練天數都很長，加上長期集中住宿的管理，也進而壓縮球員接觸其他生活面向的機會。邱韋誠對於台灣基層棒球發展的現象，指出對學生球員而言，這不僅陷入學生與運動員雙重身分的緊張，也影響球員學業知識的培養。因為集中住宿的管理，也缺乏成長階段需要的多元文化刺激，影響球員人格和生活態度的形塑。<sup>79</sup>

由於長時期的訓練壓縮了學校課業的學習，球員在學科上較難取得優異的表現，這也讓他們容易將學習的失敗經驗，歸因於自身沒有讀書的天分，進而造成球員自我認同的衝突與自我標籤化。但是在棒球運動卻在長時間的訓練下，相較學業成績講求「個人」的努力，棒球運動重視「團隊」的參與，因此也讓球員更傾向透過團隊取得歸屬與成就感。但是長時間的訓練造成的時間排他性，反而是加深球員學習低成就的主要原因。因為訓練造成體力的透支，導致球員上課時精神不濟，也沒有多餘的時間能夠復習落後的課業。當遇上大型賽事時的密集訓練，又壓縮學生的上課時間，這也球員處在學習與訓練時間相互矛盾的惡性循環。長期惡性循環的結果，壓縮球員其他領域獲得成就與正向刺激的機會。從客觀條件而言，訓練佔據的時間，便很難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在其他領域獲得成功的經驗。

曾文珍導演對陸俊宇訪問時，提到關於球隊的練習時程表，從陸俊宇細數訓練

<sup>78</sup>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2007.04），頁 139。

<sup>79</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85。



時間的過程：「早上五點起來，練到十點或十點半，下午又馬上練球，晚上要練球，都沒有休息時間。」(28:19—29:24) 看見球員們每天有將近一半的時間，要接受棒球的訓練。長時間的訓練，也確實影響到球員的課堂表現，讓他們沒有額外的體力去學習課程的內容。如陸俊宇說：「早上上課又會打瞌睡，又累，又想睡覺，當然不想上課。」(29:50—30:06)，由於學習進度的落後，即使他們有心想要認真上課，可能也無法跟上課程的進度。藉由導演的訪問，也指出少年球員在變形的學習與訓練體制內，無法在學業與球技間取得均衡的發展的現象。這也導致許多優秀的選手，在進入高等教育後，無法繼續打球的情況下，因為學業成績或是輟學的影響，錯過取得高學歷的機會，阻斷生涯規劃。<sup>80</sup>

然而，少年球員普遍學習低成就的表現，根據林伯修、朱自敏對花東地區原住民學生參與棒球的研究發現，少棒層級的球員在學科成績表現上，也多有優異的表現，反而是隨著層級的提升後，學業表現才逐漸走下坡。<sup>81</sup>這從導演拍攝內容提到陸俊宇班級排名的變化上，或許就能夠印證該研究的看法。他的成績從班排 19 名，退步到 29 名。從原先的排名看來，或許陸俊宇並非不適合讀書，反而可能是因為升上國中後，青少棒訓練相較少棒時期的繁重，讓他沒有額外的體力應付課業，才讓他和同學的成績差距逐漸擴大。對青少棒階段的球員而言，若只專注在運動技術的訓練上，而輕忽課業的學習，朝向單一運動專業的發展，也可能會讓這些球員在國中階段，便提早放棄其他職業發展的可能，也更加深運動員普遍缺乏學科能力的刻板印象。<sup>82</sup>因此，少年球員對升學的考量，也更容易迴避學業的學習，往運動升學的管道思考。在沒有其他退路的情況下，球員為了有更好的條件，也就更認真的投入訓練，也更執著自己比賽中的表現，追求冠軍與奪冠的渴望，也逐漸成為他們練習棒球的主要目的，因為奪冠的實績，就是球員最好的實力保證。因此，棒球不

---

<sup>80</sup> 林文蘭，〈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2007 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頁 3-18。

<sup>81</sup>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 9 期（2009.06），頁 89。

<sup>82</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85-86。



再是單純的運動，也牽涉自身未來的發展。

由於運動升學制度的保護，他們只需要在運動上有所表現，就能透過體育專長申請學校。因此，球員也更不在乎課堂上的學習表現。從紀錄片對陸氏兄弟的訪談裡，談及他們面對學校所抱持的態度與想法，或許就反映保護制度下，對球員偏差價值觀的影響。對他們而言，讀書不是重點，曠課也是家常便飯，陸俊宇：「高興就上課，不想上課就曠課。」(36:44—36:50)他翹課的原因，是因為對課堂內容沒有興趣，比起上課他更想翹課去宿舍補眠，或是去棒球場看比賽。學校的老師對他們翹課的行為，也採取放任的處理。陸俊瑋說：「老師不管我們，就算老師會來找，我們不讓他找到就好。」(37:00—37:12)，他們不在乎學校的課程內容，完全以棒球的訓練為重。但這些行為並不表示他們是真的對成績表現毫不在乎，因為他們還是會為應付考試而選擇作弊。

陸俊宇在訪談中坦率的表示，他在考試的時候，會抄同學的答案。因為沒有上到課，即便上課也會因為太累而睡著，老師也不太會管他們。長時間低成就的表現，也加深他的自我應驗，逐漸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既然在學業上沒有努力的必要與動力，學習態度也就表現得更不在乎。因此，俊宇在鏡頭前坦承作弊的行為，其實也感受的到球員內心，其實還是會在意自己在學校的表現，也會在意同儕的目光。但是學習程度的差距，對球員而言似乎又是難以彌補的距離，才會透過作弊的方式，保護低成就的自卑心理。

然而球員的低成就表現，也是棒球的訓練所造成的。這也指出棒球的培訓制度，雖然是建立在教育的目的下，但是在施行的過程，卻無法取得平衡，導致學生／球員雙重身分的衝突。因此，棒球培訓制度的理念，基本上也逐漸遠離教育和運動的精神。儘管如此，球員還是能在升學制度的保護下，依循運動績優的管道升學。從紀錄片的訪談裡，球員也明白，即便成績不佳，只要沒有被記大過、小過，還是能順利畢業和升學。升學管道的保護，也助長球員輕忽學業的消極態度，與依賴棒球為生的想法。因此，球員低成就的表現，對他們而言只是即早認清自己不適合讀書





的現實，反而成為推動他們選擇棒球的助力。

如導演和陸俊宇、陸俊偉的一段對話，導演問：「你們都不想念書？」，陸俊宇：「就靠棒球阿。」他們表示自己是以職棒為目標，打棒球並不是打好看，而是為了以後靠打球賺錢。但是，導演又繼續追問：「沒辦法繼續打球的話，該怎麼辦？」他們則樂觀的回應，那就去當教練或跟著家人去當板模工人。

導演提問的目的，其實也體現球員在進入棒球訊以後，對未來生涯規畫的限制。球員對未來的想像，若沒辦法順利用棒球專業謀生的話，可能的選擇就是複製家人或親戚的職業。這也指出球員家庭長期處於社經結構不利的社會事實，缺乏孩童的認同楷模。因此，球員選擇運動升學時，若只是作為學習低成就的替代出路，其實也侷限了他們在其他領域的表現機會。球員在沒有其他退路的情況下，運動升學也成為他們爭取社會流動的少數手段，這讓參與其中的球員，也必須用更嚴肅的態度，面對自身的運動參與。尤其反映在國手資格的爭取上，只要擁有國手的資歷，就是對他們實力最好的認證。紀錄片中，陸俊瑋和陸俊宇在青少棒階段，再次入選國手參與了中華隊的集訓。

球員被選入中華隊前，他們在各自的球隊中，都接受過相同的訓練與價值觀的培養，比賽的目的就是奪得冠軍。在他們受到徵召成為國手後，更將冠軍信念延續到國家榮譽裡，成為為國爭光最重要的信念。但是這也表示球員必須肩負國家榮譽與奪得冠軍的壓力。如果沒有辦法順利奪冠，球員也會認為自己很丟臉並辜負了國人的期待。

中華隊徵召球員的習慣，都會希望組成菁英球隊出賽。因此，能夠代表台灣出賽的球員，基本上都是經歷各大賽事的洗禮，所培養出來的棒球菁英。他們通過層層的篩選，努力訓練的目的，是為了爭取更好的棒球出路。這也讓台灣棒球的培訓制度，更像是替國家篩選國際賽人才的過程。將每一位球員都打造成奪冠工具，基層棒球如同奪冠工具的生產工廠。如導演向陸俊宇的提問：「是誰要你們拿冠軍的？」陸俊宇：「教練阿，還有主督，科長那一些，還有學長。(57:58-58:10)」導



演對球員的提問，也指出少年球員的奪冠目標，並非都出自於自身對勝利的渴望，反而從球員的回答中，看見球員奪冠動機的背後，是為了滿足他人的期待。教練有如工廠的監督，在訓練的過程中，灌輸球員「追求冠軍」的思維，以及為國家出賽的榮譽和使命。

少年球員犧牲大量的時間，投入訓練打造強韌的身體與專業的技術，也是為了透過國際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能。若能在國際賽上留下優異的表現，也能增加未來打進職棒的機會。如果能順利進入職棒，將棒球專業轉變為養家活口的事業，或許就是從事運動最好的結果。<sup>83</sup>因此，「打棒球、拿金牌、順利升學、進入職棒」，也成為一套球員心目中的成功公式，成為球員的圓夢捷徑。林文蘭認為，這樣的現象並不是成熟的體育文化，更非原住民集體發展之福。<sup>84</sup>反而會因為原住民球員在運動場域的過度再現，忽略他們在其他領域的發展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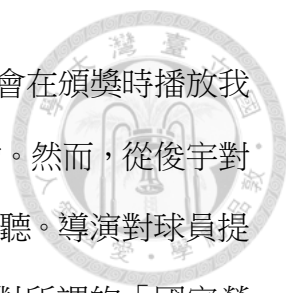
然而，從棒球培訓體制，反思學生球員參與棒球的動機，他們爭取階級流動與改善經濟地位的機會，其實也是建立在國家需求上。因此，球員也只能接受國家對他們身體的控制，迎合國家的需要，將自身打造成一具奪冠的機器，藉此得到翻身的機會。無論嚴格的訓練會帶給他們的身體什麼樣的影響，身體的工具化顯而易見。

如同紀錄片中定格在地面上的國旗，與旗桿上飄揚的國旗不同。這象徵著球員背負國家榮耀與冠軍期待的努力，其實就為了讓國旗能夠在國際場合中冉冉飄揚。但是這一次的青少棒國際賽，俊宇和俊瑋沒有順利拿下冠軍。畫面上掉落地面的國旗，猶如少年球員辜負的國人期待而落空的結局，球員在國家體制強加的使命與責任下，為國家的犧牲與付出，究竟是否值得也無從得知。

當導演問陸俊宇，當初在小馬聯盟奪冠時，聽到國歌的感受時，陸俊宇回說：  
「台灣的國歌那麼難聽，美國的還比較好聽。每次要放台灣國歌的時候，我們全部

<sup>83</sup> 魏玟，〈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137。

<sup>84</sup> 林文蘭，〈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2007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頁3-24。



都低頭，都不想唱。(8:33—9:05)。因為國際賽上優異的表現，會在頒獎時播放我們的國歌、升起我們的國旗，象徵國家榮耀與肯定運動員的努力。然而，從俊宇對國歌的反應看來，他直接批評就國歌的旋律批評，認為國歌很難聽。導演對球員提出關於國歌感受的提問，其表達的目的或許是為了表現，球員對所謂的「國家榮耀」，並沒有特殊的情感。導演藉由球員對國歌感受的再現，指出少年球員與國家榮譽的距離，表現國家期待下，對球員身體的束縛與控制。這似乎也諷刺台灣一直以來，追求國家榮譽的冠軍文化。

## 第二節 台東體中的蔡志偉

### 一、從興趣變訓練：家人不要我打棒球

《冠軍之後》的第三位主角蔡志偉，他打棒球的契機，是受到同儕的吸引，看到陸俊宇他們打球的時候覺得很有趣，他的父親也支持他去學習正確的姿勢練習。蔡志偉會正式加入球隊，是因為陸永茂教練多次和家長斡旋的結果。蔡志偉是單親家庭的小孩主要由祖父母來扶養，而老人家的觀念並不是很支持他打球，可是陸永茂教練認為蔡志偉的身材、爆發力，都很適合朝棒球發展。但是，不同於陸氏兄弟的家庭情況，蔡志偉的祖父母還是抱持著相對傳統的觀念，認為小孩讀書將來才会有出息，擔心會因為打球而耽誤課業，或因為訓練而受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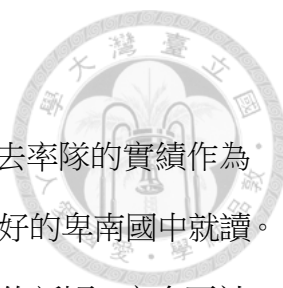
志偉的祖父母擔憂的事情，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因為訓練受傷；二是因為訓練造成課業落後。在陸氏兄弟身上，確實應驗了學習與訓練兼顧的困難。若真的選擇透過棒球升學，也會擔心在訓練和比賽中，因為運動傷害而斷送運動員的生涯。因此，志偉的祖父母所抱持傳統思維，也能夠從如何讓球員兼顧學習與訓練的方向思考。志偉選擇就讀培育運動員所創立的台東體中，因為他就讀的學校與陸氏兄弟不同，導演在紀錄片的敘事結構上，藉由他們就讀不同的國中，分



成兩條路線作為青少棒階段的對比。

有關棒球訓練而衍生的教育議題，導演透過和志偉學校教師的訪談，鄭清芬老師也從自身的教學經驗裡，分析球員學習動機低靡的原因。鄭清芬老師提到，學生在剛升上國中時，每個人的目標都千篇一律要「好好打球、好好寫字、好好讀書」，可是這些人當中，能夠持之以恆的卻沒有幾個。她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學生們設定的目標，都不是根據對自我的期許，許多目標的設定，其實都來自於家長的期待，甚至連自己為什麼要打棒球的動機都不太清楚。但是會堅持打棒球的原因，鄭清芬老師認為「可能是因為長期沒有在學科方面得到成就感，所以他完全沒有熱忱在裡面，就像他如果打棒球，被肯定他會有成就感，他會想要再打。」(32:00—32:35)因此，沒辦法在學科表現上受到肯定的球員，便會藉由棒球運動的表現，填補成就感的匱乏，透過棒球的訓練以及賽事的表現，取得成就感。

但是學習低成就的表現，卻也影響球員們獎學金與其他補助的申請資格。這樣的結果，讓最投入練習，或體育表現優異的學生沒有辦法達到獎學金補助的門檻，無法獲得學校的獎學金。反而運動表現中上，學科又不至於落後的學生，成為體制內最大的獲益者。這對球場上最為賣力的球員而言，無疑也是一種否定，即使球員的內心會在乎，但也不太會說出來，因為在準備下一次的比賽練習時，他們還是一樣地去努力。對於球員的付出，不見得能得到回報的現象，鄭清芬認為：「我比較難過的是，他們那麼賣力，會不會過度的消耗他們的體力、精力。甚至是把他的棒球生命磨損掉。」(35:17—36:14)志偉，曾在小馬聯盟的全壘打大賽中獲得第三名，擁有優秀的棒球才華與過人的實力。當台東體中在全國青少棒聯賽中獲得第三名的佳績，志偉卻因為學科成績未達標準，無法得到獎學金的補助，成為制度下的遺珠。由於棒球是團隊運動，獲得的榮譽也是集體努力獲得，雖然有個人獎項的設立，但也難以將球隊的勝利歸功於個人身上，而且學校的獎學金制度，普遍還是會參照學科成績發放，也造成不少球技優秀而學科表現不佳的球員被排除在外。但儘管如此，球員還是會認真投入棒球的訓練，因為球員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能夠透過棒



球繼續升學取得學歷，或是增加進入職棒的機會。

在前面的論述中提到，球員升學的選擇，會依據該校教練過去率隊的實績作為考量。陸氏兄弟便是在陸永茂的建議下，選擇實績與教練口碑較好的卑南國中就讀。但是在紀錄片中，卻看見卑南國中環境的簡陋，不同於台東體中的新穎，宿舍更被陸俊宇形容像是豬圈。當台東體中和卑南國中在青少棒賽事首次交手時，卑南國中僅以一分險勝台東體中，這也讓陸俊宇質疑當初陸永茂的建議，如果體中真的那麼差，為什麼還差點輸給體中的球員們。

從紀錄片提到的台東體中，思考體育中學設立的原因，也更進一步思考原住民與棒球運動的關聯。為了指出原住民選擇運動升學的結構性成因，可以先從棒球重點學校的設置緣由談起。台灣棒球重點學校的設置，是教育部體育司，為發揚原住民的運動才能，從 1989 年起，陸續實施棒球重點學校，成立體育中學等制度上的政策，培育棒球人才。<sup>85</sup>

如陸氏兄弟就讀的卑南國中，本身便是擁有悠久棒球隊歷史的老學校，<sup>86</sup>而台東體育實驗中學，則是 1995 年教育部在台東縣設立了第一個「體育中學」，另外，在花蓮也同樣設立了體育實驗學校。我們可以從這兩所學校設立的地點與目的，尤其是將體育重點學校設立在台灣東部，原住民人口稠密的地方，看見政府鼓勵原住民朝向運動發展的企圖。政府認為體育中學的設置，能提供具有運動天賦的原住民更好的出路，有利原住民優秀運動人的升學及發展。<sup>87</sup>另外，教育部在「原住民教育及特殊教育實施報告」中，特別名列的「培育原住民學生田徑人才計畫」，也能夠看出運動和原住民的緊密連結。<sup>88</sup>但是過於強調原住民與運動之間的連結，背後

<sup>85</sup>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 9 期（2009.06），頁 81。

<sup>86</sup> 卑南國中在 1967 年由傅清順校長大力推展棒球運動，同時接收了 1968 年紅葉國小畢業的球員，甚至在台灣日報邀請下舉辦的全省巡迴比賽中留下了不敗紀錄，也因此打響了卑南國中的名號。徵引自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台東：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55-56。

<sup>87</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5。

<sup>88</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5。



往往也容易隱藏族群與階級的權力關係。這種族群預設的建制化政策，也是對原住民族群實質上的內部殖民主義。<sup>89</sup>

教育部在 1996 年擬定的「教育優先區計畫」<sup>90</sup>，也對花東地區學生棒球隊的組訓產生重大影響。教育優先區的劃定，是基於以下幾個條件判定：「原住民、低收入戶、新移民、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學生比率過高」、「學齡人口外移嚴重」、「教師流動率及代課比率偏高」、「地理條件不利」、「教學基本設備不足」，只要符合上述條件的中小學地區，便符合「教育優先區」的資格，能夠向教育部申請相關補助經費。

其中與棒球隊組訓最相關的補助項目，是第三項「輔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與第八項「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根據林伯修、朱自敏的研究指出，花東地區，除了少數市區的國中小，因為地點在市中心原住民比率過低，不符合教育優先區的標準。其他花東地區有組織棒球隊的學校，基本上都有透過教育優先區的計畫，取得經費補助。<sup>91</sup>從前面提到的棒球重點學校設置，和教育優先區的推行，再結合運動績優的升學制度，可以看見台灣教育制度，對棒球員運作的支持網絡。

除了國家政策與教育制度的支持，邱韋誠另外從族群文化，和社會結構性脈絡，分析原住民從事棒球運動的原因。他認為部落的族群文化背景，常常會和社區活動結合，舉辦類似運動會的社區活動。這個方式也間接影響了原住民對運動參與的態度和興趣，尤其是運動本身具有戲劇性，往往能在比賽的過程中凝聚群體認同，塑造共同意識。<sup>92</sup>林文蘭也認為，原住民選擇打棒球的原因，與運動和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親近性有關，更從血緣、地緣的關聯性，結合部落社區的領導人推動，塑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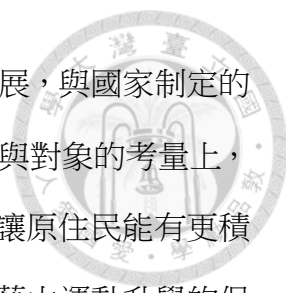
---

<sup>89</sup>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89。

<sup>90</sup> 引用自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8516>。2020 年 4 月 25 日檢索。

<sup>91</sup>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 9 期（2009.06），頁 81-82。

<sup>92</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0



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sup>93</sup>由此可知台灣棒球運動的推展，與國家制定的教育政策相關，為促進花東地區的棒球運動蓬勃發展，在區域性與對象的考量上，結合學校鄰近原住民社群網絡，藉由部落文化與運動的親近性，讓原住民能有更積極的運動參與。但是這並沒有根治原住民社經弱勢的問題，不過藉由運動升學的保障，也確實讓許多原住民減輕經濟的負擔。另外，選擇投入棒球運動，還有機會成為優秀的球員拿獎金、或打進職棒的誘因，也讓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時，期許自己能成為解救家中經濟的救援者。

雖然台灣教育制度讓他們擁有升學的保障，但這對原住民球員而言，不見得就能改善家庭社經地位的處境。因為相較一般學生的標準而言，教師對球員的學業要求標準較低，這也表示他們對球員的學業表現，抱持略低的期待。棒球運動的選擇也成為原住民學業成績不佳的替代出路，反倒再製了運動員不會讀書的刻板印象。長時間的棒球訓練，讓球員無力應付課堂上的學習，但社會普遍還是對原住民運動員抱持著優異表現的形象，忽略他們在學習過程遭受的困難與挫折，以及他們選擇棒球維生的背後原因。因此，當他們選擇運動升學的同時，也等同限制了他們未來發展的可能見，狹隘成一條對棒球夢想的追求與孤注一擲。

從志偉的祖父母對他學業要求的期待，也指出原住民家庭並非不重視學童的課業學習，而是因為工作性質和教育程度的弱勢，常使得原住民家長在關注子女課業時，基於自身能力的限制，無力指導子女的學習。這也間接造成球員在運動領域獲得成就感，多於在課業上獲得的肯定。<sup>94</sup>從棒球運動獲得的成就感，也讓身處弱勢環境的原住民，將棒球作為生涯發展的主要選項。<sup>95</sup>另外，就學生的角度而言，打棒球的動機，除了運動本身的樂趣外，不適合念書的自我應驗，也是讓學生參與棒球運動的推力之一。

---

<sup>93</sup> 林文蘭，〈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2007 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論文》（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7），頁 3-13。

<sup>94</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2。

<sup>95</sup>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棒球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 9 期 2009 年 6 月，頁 105。

在上一節的內容，看見少年球員，打棒球的動機，從原先的樂趣，經過競技性的訓練後，逐漸轉變為追求勝利的功利思維。這一節則先從體育學校的設立，與相關教育政策的制定，指出原住民選擇棒球運動的結構性成因。由於他們在學生／球員雙重身分下，無法保持平衡的發展。在失衡的狀況下，球員因為學業表現不佳，反而讓他們更專注在棒球的訓練，堅定走向棒球升學的道路。因此，對選擇棒球升學的人來說，首要的目標就是成為優秀的球員，而優秀的球員，也勢必會受到國際賽事的徵召。下一段的內容，就是從青少棒球員在面對國際賽徵召的狀況下，無法拒絕的困境，指出球員被國家制度束縛的處境。

## 二、阿偉事件：國家制度對球員的限制與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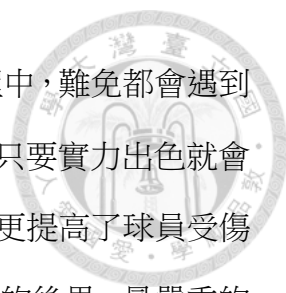


圖 2-2-1 蔡志偉肩膀疼痛

阿偉事件是因為志偉以傷勢為由，拒絕國家的徵召，事後缺席中華隊集訓所引發的事件。志偉拒絕參與中華隊集訓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因為傷勢尚未恢復；二是因為之前縣代表隊學期中集訓對學業的影響。

志偉受傷的原因，從導演拍攝比賽的過程，透過鏡頭特寫蔡志偉因為肩膀疼痛而痛苦扭曲的表情（見圖片 2-2-1）。導演的用意是要指出球員在競賽過程對身體的消耗，志偉受傷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在比賽裡，投滿七局的過度使用造成的肩關節不適。志偉在賽後冰敷時，一旁觀賽的祖母也過來關心他的傷勢，祖母擔心志偉的傷勢時，臉上也充滿著不如該如何是好的無助和無奈。





由於棒球運動高度競技化的性質，球員在比賽或訓練的過程中，難免都會遇到傷害的發生。教練為了球隊的勝利，即便是未發育完全的選手，只要實力出色就會反覆被教練指派上場，再加上學生對運動傷害防護觀念的淡薄，更提高了球員受傷的風險。球員運動傷害的累積，日後也可能對球員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導致球員運動生涯的夭折。這樣的情形，也讓許多具有潛力的少年球員，因為傷勢只能提早離開球場，無法繼續在球場上兌現原本具有的天賦。

優秀的少年球員若是被徵召為縣代表隊或是國手的話，還要參加額外的臨時組訓。像是在志偉入選台東縣代表隊後，為了配合集訓的要求，必須在學期中離開自己的學校，到集訓的國中臨時插班上課。這種臨時集訓的模式，也對球員的學習造成的影響，導演便透過鄭清芬老師的觀點，由她轉述志偉參與集訓時所遇到的問題。在志偉到集訓學校後，完全跟不上課程的進度，雖然課堂上使用的教材一樣，但是各個學校的教學進度有所不同，再加上授課老師對插班學生的學習情形不夠了解，對棒球隊的學生也多採取放任的態度，不太在乎他們課堂上的學習表現，因此學習的表現也每況愈下。另外，集訓疲勞的累積，也讓球員即使到課堂上也多半在睡覺。球員在老師放任的管教下，鄭清芬老師說：「他回來之後，胖得離譜，整個人都腫起來，胖的很誇張。我發覺他這個月回來後瘦下來了。所以飲食的不正常，再加上沒有人管，壓力又大。」(47:34—48:12) 當鄭清芬老師轉述志偉集訓所發生的事情時，導演將畫面切換到志偉在電動遊樂中心玩樂的模樣，加強了對觀眾對臨時集訓制度的疑慮。

基本上，能夠參與縣代表或國手集訓的球員，都是國內同齡階段裡，最優秀的運動員。但是臨時集訓的模式，只是為了集中棒球菁英，為了短期目標所建立的制度，專注在球技的訓練。並沒有妥善顧及到球員學期中插班上課，對課業的影響，加上教師疏於管理，採取放任的態度。如此看來，臨時集訓的模式，也變相成為迫害學生球員的方式，反而讓最優秀的菁英球員，沒辦法接受適當的教育，還加深球員學習低成就的表現。因此，臨時集訓的目的，只是方面管理階層為全國或國際賽

事做準備，球員卻得犧牲個人的權益。這也將優秀的球員推向單一運動專業的養成，只能依賴棒球升學的道路。

對於這次長達一個月的集訓過程，志偉的祖母很後悔讓他參加。如果可以，她也希望志偉不要再去集訓了。這次的縣代表隊集訓，是為爭取小馬聯盟國際賽的出賽資格。最後，也順利由台東縣青少棒隊取得代表權，作為這次國際賽的參賽隊伍。因此也能夠發現，縣代表隊球員的選拔，同時就是讓球員競爭國際賽的出場資格，縣代表隊的臨時組訓目的，也只是為了替國家篩選出最為優秀的選手，確保國際賽上能夠順利奪冠。


志偉是台東縣代表隊的成員，球隊順利爭取到國際賽的出賽資格，理所當然的也入選這次的中華代表隊，因此需要為日後國際賽的集訓做準備。但是志偉的祖母，基於志偉個人的意願，希望可以讓他退出這次的國際賽集訓，一方面是因為志偉的傷勢仍未痊癒，希望以養傷為由，拒絕這次的徵召。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學期間集訓造成的課業落後，希望能在暑假期間彌補回來。



圖 2-2-2 中華隊管理、志偉祖父、學校教師的三方會談

但是在志偉拒絕徵召以後，所需承擔的後果，導演記錄了志偉在缺席集訓後，所發生的事件，指出國家體制對球員的限制與壓迫。蔡志偉拒絕徵召以後，沒有出席中華隊的集訓，這次的缺席，引發中華青少棒管理人員的關切，導演將這段由志偉的祖父母、鄭清芬老師和中華青少棒管理張廷榮的三方對話記錄了下來。

從上圖（見圖片 2-2-2），可以看見導演在拍攝三方會談時，由鏡頭由左向右的



人物分別是中華隊管理張廷榮、蔡志偉祖父、體中老師鄭清芬。蔡志偉的祖父在畫面的中央，象徵著蔡志偉的未來正夾雜在國家榮譽與暑期輔導的選擇中，然而蔡志偉在畫面中的缺席，似乎也指出少年球員的選擇與未來，都掌握在這三個大人的手裡，無論最後的決定為何，都沒有看見球員自身對訓練或教育的想法。導演藉由蔡志偉的缺席，指出了少年球員在國家榮譽與教育制度下的處境，只能接受被決定的命運。

志偉的祖母向張廷榮反應，上一次台東代表隊的集訓過程，都沒有辦法讓志偉好好讀書，嚴重影響到他的課業。但張廷榮表示，球員在學校裡，一樣會按照課表上課，可能是因為學校教材的不同所造成的誤會。但是根據先前鄭清芬老師的轉述，可以確定學校教材是一樣的，但即便是相同的教材，每一間學校的教學進度和學生程度不盡相同，因此也沒辦法照顧學生程度上的落差。這也指出中華青少棒隊的管理人，未必對球員的學習情況或困難有所了解，在面對志偉祖母的質疑時，張廷榮則回應：「我們現在是代表台灣，代表國家出去，是國家阿。」當比賽目的，抬升到國家層次攸關國家榮譽時，似乎就能合理化球員的犧牲與付出。但是對志偉的祖母而言，更重要的是志偉的權益和意願，從祖母的口中也能夠得知他還是會在意學業的表現，只是沒辦法坦率的表達內心的感受。當導演問志偉參加臨時集訓，有沒有好好上課時，蔡志偉便回說：「能上什麼課？」這也揭示青少棒階段的球員，除了要應付長時間的訓練，與繁瑣的賽事，若被徵召為國手，還得額外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參與臨時的集訓，並犧牲個人的權益。

鄭清芳老師和志偉的祖母，抱持相同的立場，希望志偉不要因為棒球的訓練而荒廢了課業，犧牲掉自己的權益。鄭清芬老師從學校的教育立場，指出暑假對這群球員而言，是打穩學業基礎的關鍵，若能在這段期間將過去的空白填補起來，並和其他同學一起參與暑期輔導課程，也能夠幫助球員建立學習方面的成就和學習人際關係的相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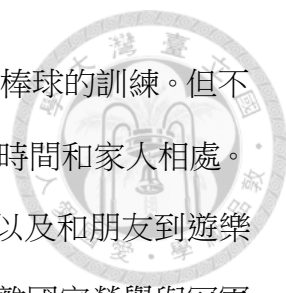
但是拒絕徵召的後果，是志偉得接受棒球協會的懲處，這對志偉未來的棒球路，



會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首先是會被取消過往的國手資格，讓志偉在未來服兵役時，沒辦法加入國軍的棒球培訓隊，未來也不會再受到國家的徵召。棒球協會對志偉的懲處，很可能就此終結他的棒球人生。

對於志偉退出國際賽的選擇，導演也訪問了志偉過去隊友俊宇和俊瑋，和陸永茂教練，對這件次懲處的看法。俊宇提到，因為棒球協會的規定，只要是代表中華隊的球員，就一定要參加，不參加的話，未來也只能朝海外發展，沒辦法留在台灣打球。陸永茂對志偉即將面臨的懲處，他表示「我想救他，我也試著去棒協說禁賽他這一屆，不要禁賽他往後的國手資格。因為報紙上說，將來陸光也不能進去。我是怕影響這孩子太大，這也是我們選手將來要警惕的地方。」(52:20—53:04) 陸永茂的立場是希望盡力保護球員的權益，他在協會面前盡力的維護志偉。因為在青少棒階段就被國家給終生禁用的話，面對未來升學或兵役問題時，也不能以棒球專長的身分進入高中或大學；當兵也沒辦法進陸光棒球隊（現稱國家儲訓棒球隊），這樣的懲處，等同阻斷了他日後的棒球生涯，以及一直以來在棒球上的投入與付出。關於國家的徵召，陸永茂也流露些許的無奈，他認為能夠受到國家的徵召，選手就是要盡量去配合國家，因為這對球員來說，也是無法取代的榮譽。因此，從「阿偉事件」看見球員在面對國家徵召時，沒有拒絕的空間，只要拒絕就會受到棒球協會的制裁，也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控制。


然而，球員受到國家的徵召，也確實是一種榮譽與肯定。但對青少棒階段的球員來說，臨時集訓讓他們得承受更多的負擔，並且在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的壓力下，也迫使他們在身體發育未完全的情況下，接受競技性的專業訓練。球員因為訓練所犧牲的學習時間，也限縮了他們未來其他領域的發展可能，變得更加依賴棒球運動的表現，像是俊瑋認為志偉拒絕中華隊的徵召，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因為他認為志偉和自己，都不是讀書的料，選擇打球將來才会有出息。從他的看法，也指出教育／訓練失衡的情形，反而讓優秀的棒球員，沒辦法享有更全面的教育，變得只能依賴棒球的專業，受限於體制中。



然而，沒有代表中華隊參賽的志偉，雖然在暑假一樣接受著棒球的訓練。但不一樣的是，他不用再為國際賽而準備，讓他在暑假期間有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曾文珍導演也運用鏡頭記錄志偉和表妹在暑假期間一起郊遊，以及和朋友到遊樂園遊玩的畫面。雖然最後棒球協會的懲處結果不得而知，但是禿離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壓力下的志偉，反而享受了到一段愉快的假期，導演藉由蔡志偉的暑假時光，也指出了少年球員在訓練之外的其他生活，棒球訓練並不是球員人生的全部，反而是為了訓練棒球而犧牲了個人的時間。反而代表中華隊出賽的陸氏兄弟，暑假期間接受著國家隊的集訓，並肩負為國爭光的重任遠征美國。但是在影片片尾的字卡上，看見「1999年8月中華青少棒隊，在小馬聯盟的世界青少棒賽中，以1:9敗給美西隊，獲得亞軍。」(59:51) 這次國際賽事，他們沒有順利的奪冠而獲得亞軍。球員因為沒有順利奪冠，也產生愧對國人的羞愧感，這也呈現球員在冠軍期待下所背負的壓力。這三名卑南族少年，面對中華隊徵召的參與／拒絕，分別體驗到不同的暑假回憶，交錯出不同的棒球經驗。導演從蔡志偉充實而愉快的暑假，對比俊宇、俊瑋犧牲暑假的時間所換來的成就，進而反思台灣的冠軍棒球文化，在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下，對球員帶來的壓力與犧牲。

《冠軍之後》的拍攝，曾文珍導演以陸氏兄弟與蔡志偉，分別為兩個敘事層次，探討對青少棒階段的少年球員而言，「運動」應該帶給他們的意義與功能為何。棒球運動由於國家介入的發展，雖然涵蓋在教育的範疇內，但是從球員接受訓練的過程中，由陸氏兄弟身上，看見球員動機的轉變，從原先運動的樂趣，轉變為冠軍的競逐。然而，會有這樣的轉變，主要與台灣棒球的培訓制度有關，長時間訓練造成的時間排他性，導致學生無法在學生／球員身分取得平衡，失敗的學習經驗，也讓球員趨向於透過運動表現的成就，建立自我的認同。

從蔡志偉身上，其實要探討的是教育與訓練間平衡發展的可能。相對於陸氏兄弟對在學習低成就情況下的自我否定；蔡志偉仍然表現出對學習的努力與堅持。不幸的是，球員常因為比賽的需要，受到代表隊的徵召時得在學期間，臨時到別的學



校插班就讀。這種暫時的集訓方式，是基於管理階層對短期賽事的需求，但是這種模式對球員而言，無疑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球員透過比賽的篩選，最後的目的卻是建立在國家的需求下，要球員為國爭光，球員也沒有資格拒絕徵召，否則就會遭到棒球協會的無情封殺，失去棒球升學或進入職業的機會

導演藉由這兩條敘事路線，從球員們對棒球運動的啟蒙開始，依序的帶出教練對球員所抱持的期待、家長對於學業與運動之間能否取得平衡的焦慮，以及教師的立場對學生的擔憂。從這些觀點，進一步指出球員在培訓體制內，最後都會被被培訓成為奪冠工具。並從拒絕徵召的後果，指出國家體制對球員的壓迫、控制與束縛。

值得思考的是，台灣棒球要如何落實運動的教育意義與精神價值。青少年階段的棒球運動，應該還是要以培養運動的興趣為主，讓球員在運動過程中，透過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帶來的喜悅與不甘，培養與砥礪球員，養成適切的價值觀，達到學生／球員的平衡發展。如何讓球員在運動的過程中，能夠抽離國家榮譽與冠軍期待的壓力，以及脫離冠軍至上的功利思維，或許是《冠軍之後》這部紀錄片對台灣棒球發展的現象上，可提供的思考方向。



### 第三章 從台東到新北：《揮棒》的部落少年與平地少年

在台灣，一個男孩如果立志成為職棒選手，普遍從九歲開始訓練。他必須在球場上磨練至少 15000 小時，才有可能進入甲組成棒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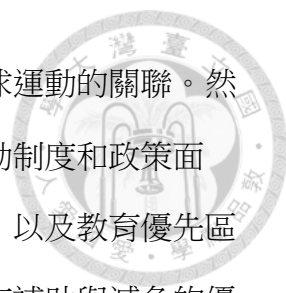
——《揮棒》

《揮棒》是從一位棒球少年，他將投手的球，擊過圍牆的全壘打開始，也預告這是一部關於棒球的紀錄片。接著畫面切換到李秀美導演駕車沿著南迴公路，開往台東的卑南族南王部落的東海岸風景。李秀美導演以旁白述說著拍攝的動機，她選擇南王部落的原因，原先是希望記錄卑南族的成年禮，但是在取材的過程，受到一位 13 歲兒童的吸引，在與他接觸之後，對他想要成為一位職棒明星的夢想產生好奇，因此拍攝了這部棒球紀錄片。

原住民男孩總是夢想成為歌手，或職棒明星。這個樂觀的少棒選手，只是一個平常的典型。我很好奇，在棒球的競技場上，他是不是也能贏得勝利。臨時決定追蹤陳彥儒，很意外的，我今天開拍了棒球紀錄片。(2:14—2:36)

《揮棒》是一部有關青少年球員追逐職棒夢想的紀錄片，李秀美導演拍攝的主要對象是一位卑南族少年陳彥儒，他是部落的摔角冠軍，也是南王國小少棒隊的主力選手。導演長達七年的拍攝時間，見證彥儒從少棒到成棒階段，追逐夢想的過程。同時，導演在彥儒進入青棒後，還對彥儒的隊友陳冠宇進行拍攝，看見兩人同樣以職業棒球為夢想，在這條道路上相互競爭與支持。他們兩人逐夢的過程，也成為紀錄片兩條對照的敘事線，分別為部落少年和平地少年的棒球路。

《揮棒》的敘事結構之所以能夠分為部落少年和平地少年的對照，是因為導演在拍攝陳彥儒時，特別強調了他卑南族的身分，更將他對職棒選手的嚮往，視



為原住民男孩夢想的典型。導演的說法，刻意指出原住民與棒球運動的關聯。然而台灣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的背後原因，其實與政府在體育運動制度和政策面上，積極鼓勵的成果有關。在上一章提到的棒球重點學校設置，以及教育優先區的制度，結合運動升學管道的保護機制，讓學生在求學階段享有補助與減免的優惠，這也等同鼓勵社經弱勢的原住民參與其中。<sup>96</sup>但是在選擇棒球以後，也僅有少數人能夠順利的成為職棒選手，大多數的球員則因為投入棒球訓練時，犧牲了其他領域的發展可能，原住民運動與職棒場域的傑出成就，反而容易被用來轉移原住民族群的社會處境，成為掩蓋社會經濟弱勢與教育成就差異的煙霧彈。

因此，曾文珍導演將棒球作為原住民男孩夢想的普遍典型的詮釋，其實也有加深原住民身分標籤化與刻板印象的疑慮。不僅如此，導演為強調原住民棒球參與的現象，在旁白的運用上也以較為武斷的方式詮釋，將彥儒祖父過世時，卑南族的喪葬禮俗挪用為彥儒對夢想堅持的比喻，強調他無時無刻對棒球的熱愛。因此，這也涉及紀錄片的倫理問題。紀錄片的倫理不僅此於影像攝製時對拍攝者的承諾和影像權、閱聽者知的權利和被拍攝者隱私權的衝突、紀錄片工作者對於被拍攝者和影片觀眾的責任，而是涵蓋拍攝者與被攝他者互動時所涉及的責任，如何善待被拍攝者，並實踐紀錄片關懷他者的努力。<sup>97</sup>因此，導演如何在強調原住民與棒球運動的連結時，應當留意旁白對被拍攝者行為的詮釋，注意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權力關係，避免加深原住民球員的刻板印象與負面標籤。


其次，彥儒為了尋求更好的棒球出路，離鄉背井到外地求學，選擇去競爭性更強，以培養成棒、職棒球員為主的學校。導演在高中青棒階段的拍攝，加入另一位球員陳冠宇作為拍攝的對象，象徵學生球員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對晉升青棒層級的他們而言，學校的課業也不再重要，只要在球場上有優異表現，就能去想去的大學。對彥儒來說，離鄉背井的棒球留學，需要適應的不只是高度競爭的環境，更

---

<sup>96</sup> 林伯修、洪煌佳，〈台灣棒球中的種族堆疊〉，《體育學報》第46卷第1期（2013.03），頁87。

<sup>97</sup> 邱貴芬，〈第四章：台灣紀錄片的倫理課題〉，《「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163。





需要適應不同球隊的文化，彥儒在原住民／球員的雙重身分上，到北部求學後，最需要調適的就是語言，因為教練與隊友多為平地人，<sup>98</sup>也多使用台語進行指導和溝通，這也讓彥儒非常想學好台語。另外，從彥儒父親要他回部落參與大獵祭的事件，運用拼貼的方式再現父子的對話，呈現彥儒在雙重身分下親子的衝突。

最後，是球員在競技性，與專業化訓練下對身體的耗損。即便彥儒順利的晉升成棒，去到嚮往的大學。但是身體所累積的傷痛，也打擊著彥儒的意志，甚至有放棄夢想的念頭。這也指出，台灣棒球運動在升學制度的保障下，讓球員投入其中視棒球為升學手段。但是在培訓的過程，也將他們訓練成只會打棒球的人，早已放棄課業的球員，等同限縮自己未來的選擇，若是在過程中又犧牲了身體健康，更將他們推向無路可退的處境。這群棒球少年，追求夢想的過程，伴隨而至的是高風險與未來的不確定性，或許成功進入職棒的球員才是特例。

《揮棒》藉由陳彥儒追求夢想的過程，邀請觀者參與和見證這段棒球路上，球員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球員為了增加進入職棒的機會，會專注各個賽事裡團體與個人的表現。只要能順利在球場上表現，便能提高球探的關注和入選國手的機會。這些經歷，也都會成為球員實力的保證，確保未來能進入職棒選秀的門檻。《揮棒》看見的，並不是《冠軍之後》裡，國家對球員的壓迫與束縛，反而是球員樂於投入體制中的主動競爭與迎合。這部紀錄片，透過這段追逐夢想的過程，也指出國家政策和職業棒球的共構關係，揭示台灣在棒球職業化後，國手的身分有助於進入職棒的機會，進而合理化球員為國爭光的目的，確保「冠軍」能對球員有實際的價值，合理化國家對球員的徵召以及為國爭光的犧牲。

## 第一節 在部落祭典與棒球培訓之間

---

<sup>98</sup> 此處的「平地人」為陳彥儒於紀錄片中使用的稱呼，於此保留紀錄片中的影像語言進行詮釋。



## 一、原住民夢想的典型

導演以旁白述說紀錄片的拍攝動機，是因為好奇這名原住民少年的夢想。「我叫陳彥儒，今年 13 歲，我是南王國小投手，我的守備位置有三壘、游擊，我打第四棒，未來目標希望能打上職棒。」(1:59—2:12) 陳彥儒從小立志成為職棒球員，曾文珍導演認為原住民孩子的夢想，大多是成為歌手或球星。然而這樣的判斷，顯然是對原住民族群有既定的刻板印象。但是從導演刻意強調原住民與棒球的連結上，也促使我們回到原住民少年夢想的起點，從他如何接觸棒球運動談起，理解他選擇棒球運動的原因。

我剛開始打棒球，差不多三年級，我跟哥哥去，他很喜歡找我玩棒球啊。爸爸想說，可能我們兩個喜歡玩棒球，就帶我們去南王國小，因為他沒有時間照顧我們，就把我們交給那個教練這樣。(3:43—4:15)

彥儒選擇棒球的契機，與《冠軍之後》的三名少年相近，都是受到家人和同儕的影響。除了自己本身對棒球的興趣，家長讓孩子打棒球的原因，多是希望透過球隊教練，集中訓練與管理的方式，避免孩子誤入歧途。彥儒的父親陳進賢認為，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一定要有一個督導的角色。因為「只要走錯了，那是一輩子都救不回來的事情。特別是單親的那個孩子，所以我不得不注意，小孩子的一舉一動。」(33:07—33:30) 由於單親家庭的原因，陳進賢在外工作，沒有充裕的時間照顧孩子，所以讓他加入棒球隊。希望藉由教練的管教，能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受到較為完善的照顧，彌補家庭功能的不全。

對於彥儒選擇的棒球路，導演分別訪談彥儒的家人，尋對他們對於對彥儒夢想的看法，彥儒的母親王碧蓮，提到彥儒選擇棒球的理由：「人家都在玩耍的時候，他在練球。他說我將來，賺很多的錢的時候，我就會買什麼、買什麼給你，覺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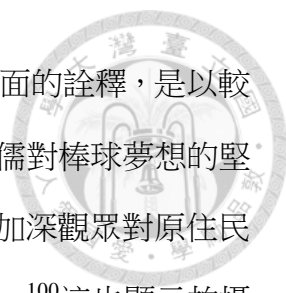
原來他要做什么，也不會忘記媽媽。」(5:45—6:01)彥儒想要成為職棒球員的原因，是想透過這個方式改善家裡的經濟環境。李秀美導演將彥儒母親的聲音，結合彥儒在夜晚的巷弄裡練習的畫面，象徵他對職棒夢想的日以繼夜的堅持與努力。父親方面，導演向他問到，為什麼支持彥儒打職棒時，父親回應：「他不打職棒他走哪條路？他從小就一直在打球了。」(30:39—30:45)父親直率的表達，對孩子選擇棒球的想法。導演對彥儒及其家人的訪談，讓觀眾明白球員家庭的結構與打球的動機，也指出了球員的家庭環境與經濟條件。從父親因為彥儒從小開始打棒球而支持彥儒繼續棒球路的說法，換句話說，若是不讓彥儒繼續打棒球，或許也沒有更好的出路能夠選擇。這也意味著球員在投入棒球運動的訓練後，便沒有餘力去思考其他的選擇，因為長時間的訓練，限縮了他們接觸其他領域和發展其他興趣的機會。



圖 3-1-1 彥儒在溪邊練習揮棒<sup>99</sup>

導演為了強調彥儒對職棒夢想的堅持與努力，將卑南族的傳統文化融入在影像敘事的策略裡。因為彥儒的祖父過世，家中正在舉行卑南族的告別式，依照卑南族的習俗，在告別式後男子必須到溪邊抓螃蟹，作為淨身的儀式。但是導演在鏡頭的處理上，呈現的是彥儒在溪邊和哥哥用木棒揮打著石頭的練習畫面（見圖片 3-1-1）。此時導演以旁白的述說著彥儒的行為，「彥儒一直站在溪邊，練習揮棒，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都隨時隨地的在練球。我發現，對南王部落的男孩們來說，棒

<sup>99</sup> 本章分析《揮棒》紀錄片使用的影像截圖，已於 2020 年 8 月 5 日和公共電視新媒體部媒體資料組的陳淑媛小姐，以 email 連繫後，經公共電視同意授權後使用。



球才像是他們的習俗。」(6:36—6:59) 導演對彥儒在溪邊揮棒畫面的詮釋，是以較為武斷的方式說明被拍攝者的行為。導演的說明，是為了藉由彥儒對棒球夢想的堅持，帶出棒球運動與原住民的緊密性。但是導演武斷的詮釋，也加深觀眾對原住民運動參與的刻板印象，也進而忽略了卑南族喪葬儀式的深層意涵。<sup>100</sup> 這也顯示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情形，結合先前導演將歌手、職棒球星視作原住民男孩夢想典型的詮釋，其實也指出社會上普遍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讓人忽略原住民運動參與的背後成因。因此藉由導演的詮釋，其實也促使我們思考原住民與運動之間的關聯性。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便指出原住民或少數民族運動參與的曖昧現象，他對原住民因為運動領域的成就，增進自我認同而感到高興，但同時也讓他認知到，運動是他們為數不多的選擇。<sup>101</sup> 有關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現象，林文蘭就現有的社會觀點分為四點：一是基因體質、二是治理與召喚國族意識的觀點、三是經濟誘因、四是社會流動。基因體質說，是根據運動生理學研究，主張原住民的體質先天上具有優異的運動條件，但林文蘭認為這過度強調本質化的論點，反而加深族群意識形態的偏見。治理與召喚國族意識的說法，則是因為政府過去將棒球作為治理原住民的手段，認為棒球運動無法反映原住民的主觀詮釋。<sup>102</sup> 然而，根據彥儒對職棒的嚮往，比較貼切的說法是經濟誘因，與社會流動方面的觀點，透過棒球的升學路徑，減輕經濟的負擔，若能順利的進入職棒，更能享有優渥的薪資待遇，進入職棒便一條可以嘗試的翻身捷徑。


但是選擇棒球運動的同時，也侷限了他升學路徑的選擇。因為長時間的訓練所佔據的時間，造成學生與球員身分的失衡，導致學業的落後與放棄，也限制他們接

---

<sup>100</sup> 卑南族喪葬禮俗的傳統，在河邊淨身與抓螃蟹的目的，是為了讓生人與死者分界隔離。族人透過儀式來告訴死者，彼此的關係到此為止，劃清生人與死者的界線。徵引自陳美齡，〈界線與秩序：當代卑南族南王（Puyuma）部落喪葬禮俗的多元樣貌〉（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5），頁 38—42。

<sup>101</sup>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原住民族覺醒與復振》（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09），頁 212。

<sup>102</sup> 林文蘭，〈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90 期（2013.03），頁，47—52。



觸其他休閒活動的機會，讓選擇棒球運動的原住民，必須以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運動的參與。<sup>103</sup>彥儒對棒球的態度就是如此，棒球對他而言不是休閒娛樂，更是一份工作。如《冠軍之後》陸永茂教練的說法，他要球員選擇棒球的原因，與球員社會經濟弱勢的家庭背景有關，處在學齡期的球員，能夠解決經濟負擔的方式，就是透過棒球升學來取得高學歷，或是成為職棒選手。因此對球員而言，拚勝負、拿獎金、升大學、進職棒，就是他們少數能夠選擇的翻身捷徑。

然而，原住民選擇棒球運動，並不全然是為了翻身脫貧，熱衷棒球運動的原因，也與棒球講求團隊合作、無私奉獻的價值有關。運動的精神與原住民的族群文化接壤。孫大川便以阿美族球員為例，提到棒球對體能條件的要求，近似阿美族傳統裡對男性戰技訓練的體能要求。棒球運動的團隊精神，和專業分工各司其職的態度，也如同阿美族傳統對男性在不同年齡階層時成長過程的要求。<sup>104</sup>這樣的觀點，從《揮棒》裡，也可以看見運動與族群文化的相關性，南王部落舉辦猴祭時，彥儒的父親正和他說待會不要跑太快，不然後面的人會跟不上。根據彥儒的說法，猴祭的內容主要是在跑步，這對受過棒球訓練的他來說非常輕鬆。因為他在球隊裡接受的訓練強度，早已超出部落活動的體能要求。因此，運動與部落文化的相關性，也是部落社區願意推動的原因，彥儒與《冠軍之後》的三位主角，同樣來自南王國小。如第二章所述，南王國小棒球隊的成立，便是藉由部落社區的推動而成。

從導演拍攝部落的活動時，也指出棒球運動的盛行，與部落社區的推動與支持有關，塑造了原住民投入棒球運動的基礎。但是過於強調原住民文化對身體條件的要求，等於間接說明了原住民具有的優越體能適應性，反而合理化原住民從事運動的理由。這也連帶影響到低社經背景的原住民，期待透過棒球運動翻身，進而忽略

---

<sup>103</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71。

<sup>104</sup> 孫大川，〈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卑南、阿美族為對象〉行政院委員會委託研究案（未出版），2003年10月，<https://www.sa.gov.tw/Resource/Other/fl451372983617.pdf>。2020年7月5日檢索。



原住民在其他社會領域上面臨的不平等情形，轉移教育權益不平等的事實。<sup>105</sup>原住民球員在職業賽事的表現，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也強化了原住民與棒球之間的連結，成為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拉力之一。

陳彥儒對職棒有明確的目標和嚮往，也與他對職棒球員的認知有關。他認為職棒球員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業，除了專業技術外，還講究個人的品性與道德方面的要求。當時活躍於職棒的原住民球星陳致遠，就是他理想的楷模，但不幸地，職棒假球案爆發時，彥儒憧憬的偶像也身陷其中，負面的新聞重創了職業棒球的形象，揭開職棒黑幕的同時，也讓彥儒的夢想染上黑影。導演在影像的敘事上，剪輯竊賭事件的新聞報導資料，藉由彥儒心中偶像的幻滅，也象徵著職業棒球並非外界所想像的光鮮亮麗，其中也充滿危機。

原住民棒球參與的現象在職棒的場域裡，原住民球員確實佔有一定的比例。職棒元年開打時，原住民球員的人數約為全聯盟的四分之一。在 2007 年，職棒具六隊規模時，原住民球員的人數更超過四成。根據 2019 年 9 月 28 日運動視界〈學術觀點—為什麼原住民一窩蜂打棒球？〉一文，對歷年原住民球員的統計也多維持在四成以上。<sup>106</sup>這也證實原住民打棒球的社會效應，與職棒的發展及媒體的推動效果有關，確實吸引了原住民的投入。

但是棒球運動並非只有原住民的參與，《揮棒》的拍攝彥儒進入青棒階段後，導演將他的隊友陳冠宇也列入拍攝對象。一方面是作為彥儒成長過程的參照，另一方面也是反映青棒內球員競合的過程。然而，陳冠宇平地人的身分，<sup>107</sup>也表示對職棒有憧憬的，不是只有原住民。因此，導演將棒球視為原住民夢想典型的說法，其背後的結構性成因，其實是國家教育政策，基於族群差異與社經地位差異，所建制

<sup>105</sup> 林文蘭，〈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收錄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2007 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頁 3-8、3-21。

<sup>106</sup> 城牆，〈學術觀點—為什麼原住民一窩蜂打棒球？〉，《運動視界》，2019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67676>。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sup>107</sup> 此處的「平地人」為陳彥儒於紀錄片中使用的稱呼，於此保留紀錄片中的影像語言進行詮釋。

化的結果，這些制度的背後，張力可認為其實隱含著政府對原住民的內部殖民，以棒球運動作為治理原住民的工具，進而忽略原住民在社會弱勢與教育資源不足的社會處境。<sup>108</sup>



## 二、棒球留學的文化適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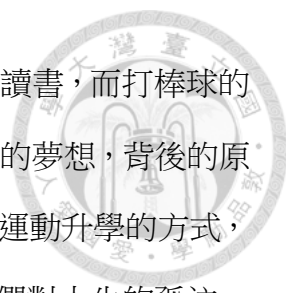
陳彥儒為追求職業棒球的夢想選擇離開家鄉，去更具有發展性和競爭力的棒球名校，選擇就讀新北市的穀保家商。彥儒的選擇，也指出城鄉差距下，偏遠地區棒球人才流失問題，葉明嘉在〈台東縣青少棒球員外流因素之研究〉便指出人才流失的原因是：球隊運作的經費彈性不足、人力及環境資源的不足與缺乏球員外流資格的限定。<sup>109</sup>

由於台灣基層棒球對少棒階段的球員有明確的資格限定，若球員中途轉學至外縣市就讀的話，就沒辦法參加全國規模的少棒比賽。因此在少棒層級，較不會有人才外流的現象。但隨著層級的提升，進入青少棒與青棒後，由於沒有外流資格的限定，偏遠地區球隊在經費、設備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成為選手外流到其他縣市的推力，而為了進到條件更好的棒球學校，也有棒球留學的說法。

儘管偏遠地區學校的棒球隊，能從第二章提到的「教育優先區」方案獲得經費補助。但球隊若是要長期經營，這些補助的費用也只是杯水車薪，最終仍要面臨解散的命運。如同彥儒少棒時期的南王國小棒球隊，便曾因為球隊經費不足而解散過。花東地區作為栽培原住民運動員的搖籃，但培育球員的現實環境條件，往往又比其他縣市的棒球隊更為嚴苛。雖然原住民球員能藉由棒球升學的方式，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但這仍然無法改變偏遠地區，教育資源不足的事實。況且棒球的訓練

<sup>108</sup>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89。

<sup>109</sup> 葉明嘉，〈台東縣青少棒球員外流因素之研究〉（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 78-79。



時間過長，造成球員學習低成就情形，反而再製原住民因為不會讀書，而打棒球的刻板印象，讓教育制度逐漸變形。<sup>110</sup>因此，原住民少年追求職棒的夢想，背後的原因與變形的教育制度，以及原住民在職業棒球的社會效應有關。運動升學的方式，反而削弱了原住民的求學動機，讓球員專注運動競賽的表現，他們對人生的孤注一擲，反而成為脫貧的捷徑。原住民球員選擇離鄉背井到外地求學，也證實偏遠地區在基層棒球發展面臨的艱困處境。

彥儒到外地求學後，感受到不同於東部原住民球隊的文化氛圍，這讓他除了要承受高度競爭的壓力外，還有球隊文化差異的適應問題。彥儒在國中畢業後，到外地求學之前，因為入選青少棒的國手，到台南參加集訓過。對他而言，能因為棒球成為國手，並代表國家出賽是非常光榮的事情。只要能為國家拿下冠軍，對他們而言就是最快樂的事。如同第二章《冠軍之後》，指出球員在棒球培訓體制下，逐漸以「贏球」作為自我肯定的依據，看見少年球員對於國際賽事勝負的執著。《揮棒》同樣呈現了「贏球」為重的價值觀。循此，依照這兩部紀錄片拍攝的先後時間，正好成為台灣棒球培訓體制的見證，揭示球員在體制內，隨著層級的晉升，逐漸內化「冠軍」執著的過程。

對球員而言，取得國手的身分，代表國家出賽，等同其能力受到國家的肯定與認證。這對以職棒為目標的彥儒來說，更是不可多得的機會。既能增加自己棒球履歷，若在國際賽上大放異彩，也能吸引球探的關注，接近職棒的夢想。因此，從現實層面考量，國手資格確實對於球員進入職棒有正面的幫助，因此也讓球員更樂於背負為國爭光的壓力，甚至主動爭取國手的資格。

根據中華職棒的選秀制度，參加選秀的資格有三種：（一）必須是現役或曾經是業餘甲組成棒球員；（二）經由球團推薦的選手；（三）不具有甲組成棒球員身分者，需附教練推薦函以及業餘成績表。但就算球員符合選秀的資格，也不見得能參

---

<sup>110</sup> 林文蘭，〈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收錄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2007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頁3-17。





加選秀會。因為在選秀會前，會先舉辦測試會，篩選掉素質較差的選手，通過測試會的選手，才能進入選秀會。

我以 2019 年的選秀會為例，符合選秀資格的球員，須曾入選 WBC 經典賽、世界 12 強、世大運、WBSC 世界盃、亞錦賽、亞青賽及亞運等國手；或是爆米花棒球聯盟、年度全國成棒甲組春季聯賽個人獎項前三名。沒有以上資歷的選手，必須由職棒球隊推薦，才能參與選秀，高中生則可透過聯盟、聯盟所屬球隊、高中教練推薦等方式參與。<sup>111</sup>

由此可見，選秀的最基本條件為年滿十八歲，並具有青棒木棒組或甲組成棒選手經歷才可參加。因此，為了增加進入職棒窄門的機會，球員會在各個層級的賽事裡，積極爭取團體與個人的表現機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拿下一次又一次的冠軍，吸引球探的關注，取得教練或球隊的推薦。若能在過程中，取得國手的身分，更能從服役中體會到國手的價值。2003 年 12 月，在行政院體委會的主導下，從國軍棒球隊改制並實施「代訓制度」，<sup>112</sup>以職棒培訓為由代替服兵役。其目的是為了健全國內職棒運動的發展，讓球員能在維持專業訓練的狀態下服役，透過這個制度，也協助了職棒建立二軍制度，讓一軍與二軍球員，能夠良性競爭，也能避免職棒球員負傷上陣，可以在二軍賽事裡復健、訓練與養成，提升國內職棒水準，增加職棒選手的就業機會。

擁有代訓資格的球員，能夠通過代訓球員選秀會，比照職棒新人選秀會模式，由各球隊選擇屬意的球員入隊後實施代訓。不同於一般選秀的是，參與代訓選秀會的職棒球隊，不得放棄選秀權，因此球員在退伍後便可直接進入職棒。日後在代訓制度重回國家訓練中心後，則由替代役組成參與中華棒協舉辦的甲組成棒比賽，等待選秀的機會。這個制度讓球員在服役期間享有一定的保障，確保球員維持專業的

---

<sup>111</sup> 中華職棒網發佈，〈中職 2019 選秀會即日起開放報名 7 月 1 日隆重登場〉2019 年 5 月 6 號。  
<http://www.cpbl.com.tw/news/view/19137.html>。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sup>112</sup> 此制度在 2011 年後，由體委會收回，回歸國家訓練中心。果子，〈職棒代訓與 SBL 一回想 2003 體委會林德福的「兩支箭」〉，《運動視界》，2016 年 9 月 1 日。  
<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33534>。檢索日期 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棒球訓練，未來投入選秀也較具優勢。

但是代訓球員的甄選資格上，也有相當嚴格的限制，球員若拒絕國際賽的國手徵召，便會失去甄選的資格。如同《冠軍之後》的蔡志偉，在他拒絕國手集訓後引起的「阿偉事件」。球員拒絕國家的徵召，等同限縮未來的發展，而順應國家徵召的球員，則能藉由國手經歷在代訓徵選的術科評比項目上取得優勢。由此可見，台灣棒球在職業化後，與國家體制所形成的共構關係。棒球的職業化，雖然完善台灣成棒層級的發展，提供成棒選手就業的空間。但是在選秀制度的門檻上，卻也鞏固了三級棒球發展一直以來強調的贏球文化。政府利用國手資格與代訓制度的優勢，也讓球員難以拒絕國際賽事的徵召。因為失去代訓的甄選資格，也就失去職棒選秀的優勢。所以，球員也勢必無法拒絕國家的徵召，這個制度對學生球員的限制與束縛，卻也成為穩固台灣棒球世界排名的主因。


如 2018 年年底，世界棒壘球總會公布了該年度的最終排名，台灣的排名上升至世界排名第四，取得第二多的積分僅次日本。<sup>113</sup>台灣知名體育新聞媒體 TSNA，在〈WBSC 公布最新棒球排名台灣重返第 4〉的報導中，<sup>114</sup>指出排名上升的關鍵是 2018 年 10 月底結束的 U23 世界盃，拿下第 5 名。再加上亞運、U15 世界盃兩項賽事皆奪得第 3 名佳績，才能重返世界排名第 4。從 2020 年初，公布最新的世界排名裡，台灣仍維持世界第四，維持的原因主要是 U12、U18 世界盃與亞錦賽雙雙奪冠，賺進大量的積分；U15 亞洲青少棒賽，也獲得亞軍佳績；世界 12 強棒球賽，中華隊獲得第 5 名，才讓台灣得以維持世界排名第 4。<sup>115</sup>

由此可見，台灣棒球能夠名列前茅的原因，主要的積分是來自三級棒球的貢獻。即便成棒層級的賽事積分較高，但是台灣在少棒、青少棒及青棒，長年來穩定與亮

<sup>113</sup> 世界棒壘球總會官方網站，〈2018 年終世界棒壘球總會棒球世界排名創下 76 國上榜紀錄〉，2018 年 12 月 17 日。<https://reurl.cc/Kg29j>。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sup>114</sup> TSNA 發布，〈WBSC 公布最新棒球排名台灣重返第 4〉，2018 年 12 月 18 日。<http://www.tsna.com.tw/tw/news/show.php?publish=3&num=24156>。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sup>115</sup> 運動視界編輯，〈台灣棒球積分大豐收世界排名維持第 4〉，《運動視界》，2020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70901>。2020 年 5 月 20 日檢索。



眼的表現才是維持排名的關鍵，所以在球員無法拒絕徵召的立場上，為了爭取更好的機會與未來，反而還會盡力爭取國手的機會，因為國手身份對進入職棒還是有相當大的助力。球員要如何受到國家的青睞、吸引球探的關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各個賽事裡拿出最好的個人表現，幫助球隊贏球晉級。因為棒球是團隊的運動，只要球隊能夠贏球，就會增加球探對球隊整體的關注。這也助長台灣棒球的培訓，傾向菁英化發展的現象，充斥「贏球至上」的運動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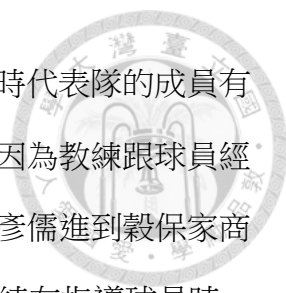
球員基於自身未來的考量，傾向前往棒球名校跟隨「冠軍教頭」。如《冠軍之後》的球員，對教練好壞的判斷，是依據球隊冠軍的數量。但是教練對球員升學的選擇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如同《冠軍之後》的教練陸永茂對陸氏兄弟的升學有所限制，這樣的現象一樣出現在《揮棒》中，當球員們在準備國際青少棒賽的集訓期間，正好是他們剛晉升青棒的階段。導演拍攝球員之間的對話內容，透過被拍攝者的聲音指出教練對球員升學選擇的限制與阻撓。如其中一位球員所說：「教練叫我們全部讀那裡，我跑到別的地方就不能打球啦。假如我要去中農，我教練就一通電話，叫他們教練不要收我。」(8:10—8:18)導演也巧妙的將鏡頭鎖定在彥儒與冠宇的身上，對其他發言的球員較無正面的鏡頭，這也是為了避免被拍攝者在說出某些真相時，會成為球員對培訓體制的批判與指控，進而危害球員的權益。

雖然不是所有教練都會這麼做，卻也能看見教練對球員出路的限制與阻撓。教練會透過個人的人際網絡，將球員包粽式的升學，將球員送到他所信賴的學校。<sup>116</sup>彥儒選擇穀保家商的原因，就是根據教練的建議，穀保家商也有他過去熟識的學長。但是，球員過度集中棒球名校的情形，也再次應證台灣棒球菁英化發展的事實，以及城鄉差距下棒球人才均衡發展的限制。

對彥儒來說，進到競爭力強的棒球學校，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但是彥儒原住民的身分，在他離開家鄉北上求學後，也看見原住民球員在外地時，文化適應的挑戰。

---

<sup>116</sup> 陳子軒，《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台北：聯經出版社，2019），頁246。



關於文化適應的問題，在彥儒去台南集訓時便有所感觸。因為當時代表隊的成員有一半是平地人，<sup>117</sup>說話的腔調帶有台語的口音，與原住民不同。因為教練跟球員經常會使用台語溝通，也讓彥儒想要主動學習台語親近隊友。這在彥儒進到穀保家商後，也遇到相同的問題，穀保家商的成員組成也是如此，甚至教練在指導球員時，也會以台語直接向球員進行說明，語言差異帶來的隔閡感，也成為彥儒在外求學時的一大挑戰。

相較於台灣棒球運動，強調透過大量訓練與比賽來磨練球技，導演藉由與外籍球探的訪談，呈現出不同的訓練觀點以及棒球文化。外籍球探認為，國外的訓練模式並不向台灣如此強調大量的訓練與比賽，反而看重的是球員的適應能力以及對文化差異的接受與包容度。除了個人的潛能，適應能力的重要性，在於能夠觀察出球員是否能夠接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因此在紀錄片中，彥儒被強調的原住民身分，以及離鄉背景求學的過程，導演的用意，似乎也是為了指出原住民球員優異表現的印象背後，其實與棒球留學帶給他們的適應壓力有關，這也表示原住民球員相較於其他球員而言，還要多承受其他面向的壓力。

為了適應不同地域的球隊文化，長時間在外地訓練，也造成彥儒和原鄉文化的脫節。因為訓練的關係，彥儒沒有時間回到部落，參與部落的節慶。導演透過彥儒的父親要他回家參與部落祭典的事件上，指出原住民球員在傳統文化與追求夢想之間的折衝與拉扯。這段拉扯的過程，迫使彥儒必須在親情與棒球間作出抉擇，象徵著原住民球員在球員與原住民身分的衝突。導演運用蒙太奇的方式，並陳兩人對參與部落祭典的看法，形成父子之間的對話。

---

<sup>117</sup> 此處的「平地人」為陳彥儒於紀錄片中使用的稱呼，於此保留紀錄片中的影像語言進行詮釋。



圖 3-1-2 彥儒在部落與棒球的取捨



圖 3-1-3 彥儒父親的想法

因為北上就讀穀保家商的關係，彥儒在國中畢業後，就沒有再參加過部落的任何活動。因為距離的關係，若是要請假回去參加，球隊還是會繼續練球，回家造成的訓練空窗期，會讓他覺得在訓練上有落後其他人的感受。但彥儒的父親認為，他至少要回來參加部落每年一次的祭典才行，因為棒球和部落的祭典是兩回事。

陳進賢：棒球跟部落的祭典是兩回事。

陳彥儒：我現在是要跟著大人，還有長老去山上。參加那個大狩獵祭。

陳進賢：他是 Puyuma（南王）的兒女。

陳彥儒：哪一個比較重要？其實都滿重要的，可是就把棒球當作是我的工作吧。

陳進賢：他非參加這個祭典不可。

陳彥儒：沒有參加的話，爸爸媽媽要給部落 3 千塊。<sup>118</sup>


<sup>118</sup> 改寫自《揮棒》影片中，31:43—32:39 處。



這長達一分多鐘的父子對話，是李秀美導演運用交叉剪接組成的對話，將電影中不同場景的鏡頭，穿插剪接在一起，暗示觀眾這兩件事情的時間統一性，達到父子對話的效果。父子間對於參加部落祭典的重要性，各自抱持著不同的想法。彥儒擔心的是因為祭典而犧牲的練習時間，會造成和隊友實力的差距，降低自身的競爭力。但是父親卻站在部落的立場，強調對部落文化的強烈認同，他認為彥儒身為部落的一份子，理當以部落活動的參與為優先。但有趣的是，彥儒認為沒有參加祭典的嚴重性，並不是在於對部落文化的認同與否，而是因為不參加的話會害家人被罰錢，他更在乎的是經濟面的現實問題。導演透過交叉剪輯的技巧，將彥儒與父親不同時空的訪談內容，統合成對話的形式，揭示原住民球員在傳統文化與棒球間抉擇與拉扯的過程（見圖片 3-1-2、3-1-3）。然而彥儒最後提到的罰金問題，似乎也指出了部落活動的「強制性」，進而鬆動了部落祭典的文化意義，比起文化的參與和認同，彥儒更在意的是拒絕後，罰金對家裡的影響。彥儒經濟層面的現實考量，也反映在他看待棒球運動的態度上，因為對彥儒而言，棒球不只是興趣，更是他的工作。當他進行比賽的獎金計算與發放時，導演也以旁白的方式說明：

上了青棒以後，彥儒不只一次告訴我，棒球就是他的工作。我不懂他的意思，我知道他的父親，無法負擔他在台北的生活費。但看到穀保把比賽獎金，平分給先發選手時，我才明白，他是以拚贏球來賺零用錢。（42:31—42:55）

這段旁白，也是導演對自身拍攝過程的自我解惑，彥儒曾多次和導演提到，棒球是他的工作。當彥儒在鏡頭前表示棒球對他的意義時，紀錄片的畫面同時切換到，他糾結於父親要他返鄉參與部落活動的要求上。鏡頭前的彥儒，臉上充滿糾結的表情，反映著內心複雜的情緒。彥儒將棒球視為工作，如此的努力就是為了爭取一個身分流動的機會。這對其他同樣選擇棒球的球員來說也是如此，他們同樣期望能透



過棒球，找到一條能向上翻轉階級的路。若能夠在過程中，將棒球運動轉變成養家活口的事業，對他們而言就是從事運動最好的結果。<sup>119</sup>導演的自我質疑，也讓觀眾在解讀紀錄片意涵的過程中，能再次思考拍攝者、被拍攝者與之間的關係。避免觀眾陷入作品的敘事邏輯中，以致過於忘情。這類似反身紀錄片常藉助的疏離技巧，提醒觀眾電影的虛構本質，以此喚回觀眾對所述事件的自我省思能力。<sup>120</sup>並且，導演在聲音的表現上，較具情感的訴說音調，也呈現內省的散文形式，<sup>121</sup>透過個人主觀的經驗與情感的表達方式，「通過作者對影片事物的觀點呈現，來激發觀眾的參與」。<sup>122</sup>

彥儒進入青棒階段後，除文化適應外，更要面對球隊內的競爭壓力，和隊友在球場上團隊合作，球場下則是各自競爭。導演透過另一位球員陳冠宇的拍攝，呈現球員之間競爭、合作的關係。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是透過每一次的比賽與訓練展現自己的身手。球員在追求個人表現的同時，也以球隊奪冠為目標，因為只要團隊的實力夠強，就能在賽事中一路過關斬將，增加上場表現的機會。因此，球員在訓練或比賽中，也會更為積極的去表現。無論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後果，在高度競技化的運動環境下，球員勢必得承擔更多傷害的風險。

這樣的結果，也導致許多球員在三級棒球階段，就因為運動傷害而斷送運動生涯。雖然他們仍然能夠憑藉運動專長繼續升學，但是在過去長訓練時間下所犧牲的學業知識，也讓他們難以培養出其他專長，甚至是無法符合學業的要求遭到退學。從此觀之，球員們在培訓體制內，除了要承擔訓練與競賽造成的傷害風險，還要面對因訓練所犧牲的學科能力。因此，在他們選擇透過運動升學的同時，也等同放棄

---

<sup>119</sup> 魏环，〈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 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7。

<sup>120</sup> 盧非易，〈紀錄片的再現技術與觀念之轉變〉，《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2000），頁 299。

<sup>121</sup> 比爾·尼可斯、井迎兆譯，〈第六章：我們如何分辨紀錄片的類型和模式？什麼是詩意模式、解說模式和反思模式？〉，《紀錄片概論》（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20年2月），頁 151。

<sup>122</sup>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 2003 年 1 月，頁 23。

了學業知識的學習，也因此限縮了他們在運動以外的發展可能。下一節要分析的，是《揮棒》如何透過棒球少年追逐夢想的過程，指出棒球體制對球員造成的，身體的傷害和學識的剝奪。



## 第二節 身體的鍛鍊與傷害

在上一節的分析，提到彥儒沒有辦法配合部落的慶典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離鄉背井的返家不便；另一方面，則是他擔心請假會造成訓練落後的心理。從彥儒看待訓練時，慎重與謹慎的態度，其實也是競爭壓力的體現。球員打到青棒階段，下一步就是朝成棒或職棒發展，因此球員為了讓自己脫穎而出，也會為了把握出賽的機會而隱忍身體的傷勢。因此，從兩個方面分析球員受傷的身體，一是球員如何面對運動傷害的發生，二是球員看待學校課業的態度，以此揭露運動升學體制，對球員可能造成的身體傷害與學識能力的剝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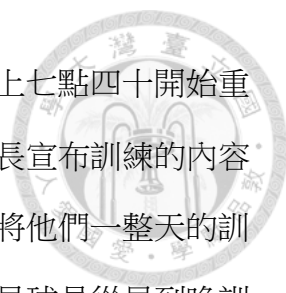
### 一、受傷的身體：運動傷害的發生

《揮棒》的導演以觀察模式，記錄彥儒青棒時期的訓練和比賽過程，特別是對高中青棒聯賽的拍攝上，記錄了比賽內容與休息區的討論，如同職棒轉播一般，帶給觀者真實的時間感。<sup>123</sup>從球員為備戰高中聯賽的訓練菜單中，也能看見青棒層級訓練量的龐大，記錄球員訓練的過程，也讓觀者看見球員們辛苦訓練的冰山一角。

他們備戰高中聯賽的訓練菜單，從早上七點半用完早餐後開始。八點半開始暖身操、慢跑五圈。九點半開始傳接球、短打、內野守備練習到十一點四十休息。下午兩點開始暖身、慢跑三圈、動態訓練和短跑衝刺。兩點半開始傳接球，內外野守

<sup>123</sup> Bill Nichols 著，井迎兆譯，〈第 7 章：我們如何描述觀察模式、參與模式和展演模式的紀錄片？〉，《紀錄片導論》（台北市：五南出版社，2020.02），頁 185。





備。三點開始進行隊內賽，五點半跑壘練習、腹背肌群訓練。晚上七點四十開始重量訓練，晚上十點熄燈。在這一段猶如流水帳的訓練菜單，在隊長宣布訓練的內容後，鏡頭也切換到球員訓練的畫面。導演運用縮時攝影的方式，將他們一整天的訓練過程濃縮至三十秒的長度。我們只能從紀錄片的縮時記錄，看見球員從早到晚訓練的身影，龐大的訓練量，卻是球員的例行公事。

另外，導演在拍攝比賽的畫面時，運用字幕的說明幫助觀者理解比賽的內容的同時，更透過球場上與休息區互動的畫面拼貼交錯，看見球隊一路勢如破竹的晉級過程，配合強烈節奏感的鼓聲，增添競賽過程中劍拔弩張的氣氛，以及比賽的熱烈激情。直到球隊晉級冠軍賽後，雙方的攻勢你來我往，可惜在最後仍遭到對手逆轉落敗。導演特別在穀保家商最後一個出局數時，用慢動作（Slow Motion）的方式，放慢球隊輸球的瞬間，在選手被飛球接殺的瞬間，音樂也戛然而止，隨即球場響徹著對手喜悅的歡呼聲。球員在輸球後不甘心的落下眼淚，教練對他們集體訓話，問他們為什麼不再把平常的訓練再加重一些，藉以砥礪球員的心志，藉由這次的失敗激勵球員接受更為嚴苛的訓練，直到下次贏球為止。

彥儒晉升青棒以後，訓練的內容比過去青少棒時期更為專業。因為比賽的表現，攸關球員未來是否能順利進入成棒或職棒。因此，競爭的壓力也比過去更為沉重，如此競爭的環境下，「冠軍至上」就是教練灌輸給他們的價值觀和信念。導演透過鏡頭拍攝教練團隊對球員喊話與訓話的鏡頭，如邱士騰教練在賽前對球員訓話時，他說：「希望大家在球場上全力以赴，我相信有很多球探都在後面看。你們沒有成績，沒有人會去理你們，我不擇手段我要去贏球。」（20:21—20:29）；蔡明堂教練在青棒冠軍賽前，也對球員說：「你們打球是來幹嘛的，就是靠以後吃飯的。如果要打興趣不要進穀保，贏了才有明天，沒有贏就沒有明天。」（21:26—21:33）從教練激勵球員的訓話內容，都向球員傳達著，唯有贏球才是一切的價值觀，再現出青棒階段，球員競爭求存的壓力。

因為球員在青棒階段後，下一步就是要晉級成棒，或是為職棒作準備。因此，青棒階段表現的好壞，更是影響未來是否能進入職棒的關鍵。另外，奪冠的重要性，也是棒球名校所須背負的壓力。因為球隊若是沒有好的表現，失去競爭力的話，外界對球隊的贊助就會減少。總教練蔡明堂也提到，一般競爭力較強的球隊，為了維持球隊的競爭力，每年需要至少要花費四、五百萬的經費。他二十年的執教生涯，球隊的營運上至少也投入了上億元，只要能讓球隊變強，拿到全國冠軍就是他對球員最大的期望。



圖 3-2-1 冠軍的重要性

在教練團隊的帶領下，球員的目標就是要在競賽中為球隊拿下冠軍，展現棒球名校在青棒舞台的宰制力。這對從少棒開始投入棒球運動的他們來說，「冠軍至上」的觀念一點也不陌生。導演透過和彥儒、冠宇的訪談，藉由球員自身的角度說明「冠軍」的意義，冠宇認為打球就是要拿冠軍，並要抱持著就算手壞掉，還是要努力去拚贏的態度去打球，特別是在穀保家商，每一場比賽大家都想拿冠軍。從冠宇的說法中，追求冠軍的目的，其實也是球隊在這競爭的環境裡，整體潛移默化下的集體意識，更帶給他們犧牲自己成就球隊的觀念。

彥儒則從冠軍與亞軍的差別，說明冠軍對他的意義，他認為亞軍跟最後一名，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因為別人只會記得比賽的冠軍是誰，對其他名次不會有印象（見圖片 3-2-1）。因為到他們這個階段，棒球已經是將來謀生的專業和工具，為了讓球探記住自己，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拿下每一場比賽的勝利，拿下最後的冠軍。



圖 3-2-2 教練理念的呈現

彥儒在晉級冠軍賽前，就在先前的賽事中受了傷。「右手臂、右膝蓋的骨頭會痛，左腳沒辦法支撐我的重量。我的兩隻膝蓋都有舊傷，但還是會上場吧。受不了的時候會再跟教練講，我們還是不能鬆懈。」(23:36—23:57) 為了球隊的勝利，球員即便受了傷，也會努力為球隊作出貢獻。球員會有這樣的觀念，與教練平時的指導有關。導演記錄了楊敏鴻教練向球員集合喊話時，從自己過來人的經驗激勵球員的畫面：「你們要有觀念，球隊贏球，我楊敏鴻腳斷掉沒有關係。球隊贏球，後面那個再擔起來就好。這才是為球隊，教練才會替你們找出路，因為你有挺球隊。」(37:18—37:31，見圖片 3-2-2) 楊敏鴻教練所倡導的觀念，是為了凝聚球員的團隊意識，讓球員認同為球隊犧牲自我的價值觀。球員願意為球隊犧牲，甚至不惜負傷上陣，一方面是為了回應教練的期待；另一方面是為了自己將來的出路。但是這種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求勝的觀念，也為球員帶來更高的受傷風險。

有關球員運動傷害的問題，導演訪談球隊合作的物理治療師陳星宇。根據他過往治療的經驗，他接觸過最小的球員是國小五年級，有少棒肘的問題。少棒肘的成因，是因為手臂過度的訓練與使用，由於棒球的投擲動作對手肘傷害的累積，造成生長板與韌帶的變形。特別在少棒、青少棒階段的訓練過程，由於身體的發育仍未

完全，也容易因為錯誤的姿勢，或過度使用造成肘部的傷害。這些傷害也容易影響球員日後的生長發育，有後遺症的發生，對往後的運動生涯，會有負面的影響。<sup>124</sup>

但是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球員在受傷後也不太願意休養，仍然渴望參與訓練和比賽。像是冠宇在練習時，因為跑壘扭傷了腳踝，為期兩個月的復健，讓陳冠宇沒辦法正常練球。導演為了呈現冠宇內心的焦躁不安，將他跑壘受傷的畫面，與他部落格的日誌內容疊合，日誌的內容充滿冠宇對傷勢的擔心與不安，擔心會跟不上球隊訓練的進度，失去表現機會。如果訓練是鍛鍊球員身體外在茁壯的過程，部落格日誌的書寫就是球員內在精神的體現，導演藉由兩者的結合，再現球員內心真正的感受，形塑更立體的球員形象。從球員在訓練與競賽的過程中，無法避免對身體的傷害與耗損，也道出台灣棒球生態內的殘酷現實。

運動傷害的問題，同樣發生在彥儒身上，彥儒升上大學後，因為肩膀的傷勢去醫院進行檢查，候診的過程與導演有一段對話。

導演：你在擔心什麼事？

陳彥儒：沒有擔心啊，其實自從上一次受傷之後，看的比較開一點，我也知道差不多了，可以不用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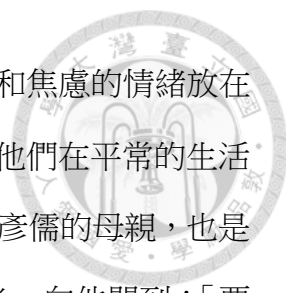
導演：你擔心自己不能再打球？

陳彥儒：還好啦，平常心。(46:32-46:55)

雖然彥儒在面對導演的提問時，鏡頭前表現著坦率和樂觀的態度，但是仍能從畫面上感受到彥儒候診的不安。導演為了表現彥儒外在行為與內在感受的差異，特別將診斷的畫面與彥儒部落格的網誌內容，疊像在一起，彥儒網誌的內容，是他對自己受傷的失望與自棄，導演運用再現冠宇受傷的相同作法，挖掘球員更深層的心

---

<sup>124</sup> 林信甫、王百川，〈少棒肘之發生與預防處理〉《中華體育季刊》第13期第2卷（1999.09），頁94-95、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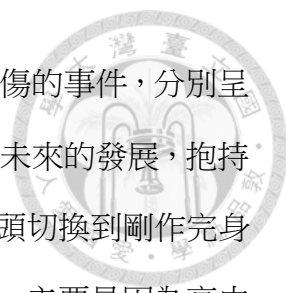


理狀態，反映人物內外的情緒表現的差異。因為球員傾向把擔憂和焦慮的情緒放在心裡，透過個人的社群平台抒發情緒，也是青春期階段的特色。他們在平常的生活中，不太會向家人傾訴內心壓力與失落，努力表現獨立的特質。彥儒的母親，也是透過網誌的內容，才明白他內心的想法。導演在彥儒完成診斷後，向他問到：「要如何避免受傷呢？」鏡頭前的彥儒，面對導演的提問，臉上充滿困惑的表情，他沒有回應也無法回應這個問題，背景的音效也強化了球員內心無可奈何的沮喪情緒。

彥儒沮喪的原因，是因為根據運動傷害的嚴重性，可能會直接威脅球員的棒球生涯，特別是對晉升成棒階段的彥儒，距離職棒僅一步之遙，所以面對任何的傷勢都會格外的謹慎。但是傷害的發生難以預測，在競爭力強的球隊裡，更容易在犧牲小我的精神與同儕競爭的關係下，讓球員冒著受傷的風險上場競爭。球員如此賣力的原因，林文蘭認為與棒球運動中，存在的「競逐流動」、「薦舉流動」兩種流動模式有關。這兩種模式，主要都透過訓練體制維繫，灌輸球員體制的規範和價值，確保控制球隊的效果。競逐流動，是指球員被教導要如何盡力拼搏，追求未來的成功，透過比賽的競爭，強化球員對體制的認同和忠誠；舉薦流動，則指出球員在訓練體制內的選拔過程中，逐漸被區分為值得培養的獲選者，與不值得的落選者。獲選者能夠取得棒球專業的憑證，繼續棒球之路，而落選者只能接受自己技不如人的淘汰命運，用來維繫訓練體制的運作。<sup>125</sup>換句話說，棒球的競爭體系裡，教練塑造球員團隊的認同，以及同儕競爭的意識，確保球員在體制內有公平競爭的認同。因此訓練體制在這樣的信念運作下，從比賽輸贏，到選秀落選，都是為了讓落選者接受被體制淘汰的命運。連同球員在訓練或比賽時受到的傷害，若影響到未來的生涯，球員也只能自行承擔後果。若球員無法負荷訓練體制內的高壓環境，也只能接受自己是體制內的不適者接受失敗的事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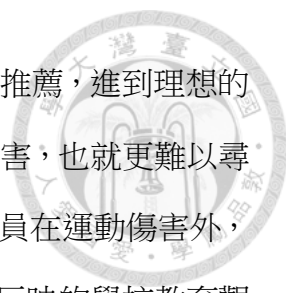
<sup>125</sup> 林文蘭，〈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0期（2013.03），頁55。



球員要如何面對傷害的自處與調適，導演藉由彥儒、冠宇受傷的事件，分別呈現兩種看待傷勢的不同態度。冠宇在腳踝的傷勢痊癒後，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抱持相當樂觀的看法，畫面停留在他充滿自信的表情。這時導演將鏡頭切換到剛作完身體檢查的彥儒，在導演的提問下，彥儒在鏡頭前說明受傷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高中時期，教練要他嘗試不同的守備位置，讓他在肩膀肌力仍未適應的狀態下訓練過度，傷害的累積造成他肩關節唇的破裂。《揮棒》的導演，透過兩人受傷的際遇，將兩人不同的心境做了對比，相較於冠宇的樂觀與積極，彥儒顯得沮喪與失落，甚至興起放棄棒球的念頭，從彥儒受傷的原因，其實也指出青棒階段的高度競爭環境。

彥儒在高中棒球聯賽過後，對自己的表現都不甚滿意，加上傷勢的影響，也讓他萌生放棄棒球的念頭，儘管高中時期的隊友仍鼓勵他堅持下去，但他對自己卻沒有什麼信心。當彥儒決定繼續堅持夢想時，導演卻插入了關於職棒簽賭的新聞報導畫面，事件的主角是彥儒崇拜的偶像陳致遠。導演運用主播報導的聲音，以及各大報紙頭條的畫面層層堆疊，堆疊出簽賭事件的沉重與複雜。彥儒曾經的偶像陷入醜聞中，也象徵著彥儒棒球夢想瀕臨放棄的邊緣。但是在這簽賭事件後，導演再次詢問彥儒是否有其他欣賞的球員時，他也有了新的崇拜對象，新舊偶像的交替，也象徵他克服了消沉的意志，繼續堅持夢想的決心。

《揮棒》記錄彥儒和冠宇，從青棒到成棒的成長過程，透過彼此競合的關係，也象徵著球員追逐夢想的縮影。運動傷害是球員們追逐夢想的阻礙，但是他們也只能選擇承擔受傷的風險，繼續在球場上奮鬥。因為只有在球場上留下好的表現，才能進到理想的大學，以利未來和職棒接軌。由於運動升學制度的保障，晉升到青棒階段的他們，也早已放棄了學校課業，讓棒球成為他們唯一的專業。如陳冠宇所言：「棒球就是我唯一的專長，唯一的樂趣。要是沒有棒球，我也不知道從那裡開始。」（45:41—45:51）這也指出運動升學的問題，如同在《冠軍之後》分析學生球員的學習低成就表現，是因為長時間的訓練，壓縮到球員學習的時間。然而，球員從青少棒晉身到青棒階段後，球員學習程度的落差也逐漸拉大。因此到了青棒階段後，



球員早已放棄了學科的學習。因為只要球技好，還是能藉由教練推薦，進到理想的大學。但是單一專業的培訓體制，若是球員遇到毀滅性的運動傷害，也就更難以尋求運動以外的替代出路。單一專業導向的培訓體制，儼然成為球員在運動傷害外，所面臨的另一種「傷害」，也就是學習能力的剝奪。從《揮棒》反映的學校教育觀點，探討台灣棒球培訓制度，對球員的學識剝奪，以及未來發展的限制。

## 二、受傷的身體：生涯進路的限縮

球員在球場上賣力表現吸引教練的目光，就是為了得到教練的推薦，去到理想的大學。彥儒認為教練對他最大的幫助，就是推薦他到好的大學。高中棒球的教練，在球員升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要替球員挑選適合的學校，還要顧慮學校的制度是否有利於球員爭取旅外、公費的機會，以利球員的生涯規劃。

棒球運動，確實提供了升學管道的保障，球員也能循此取得高學歷，促進階級的流動。但是原住民球員在這個升學管道的保護下，卻也掩蓋了原住民在教育與文化方面弱勢的社會事實，這也讓棒球運動成為治理原住民文化與收編弱勢的工具，從強調援助民生理條件對運動的適應性，再藉由部落文化與運動的親近性，以及運動升學管道的補助與減免，吸引原住民投入棒球運動中，進而忽略原住民在文化與社會經濟、教育面向上的弱勢處境。

青棒階段的球員因為運動升學體制的保護，只要有優異的棒球技術，就能透過教練的推薦與獨招的方式繼續升學。因此學校的課程，對他們來說，也沒有學習的必要性。從運動績優學生的成績及格門檻上，也可以發現及格門檻在高一和高二階段為 40 分，高三則是 50 分。這是教育制度對運動績優生採取的積極差別待遇，差別待遇的後果，也造成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意願更為低落，並抱持學業無用的價值觀。

<sup>126</sup>球員的家長也認為，這是台灣棒球培訓體制，長久以來的現象與通病。如導演對

---

<sup>126</sup> 林文蘭，〈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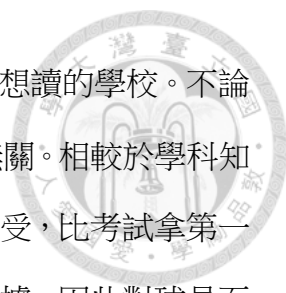
冠宇雙親的訪談，問他們是否支持孩子整天練球，不用上課只為了比賽時，冠宇的母親王碧蓮回應是：「這好像是我們台灣棒球的一個通病，好像以他們這種，打到青棒了，有絕多數人，他們的課業幾乎放棄了大部份了。」(33:37—34:00) 打到青棒層級，家長們也認為學校的知識，對透過棒球升學的學生來說，確實是意義不大。冠宇的父親陳以輝，對學校課程的看法是：「你說那個數學，說真的已經用不到了吧」。(34:02—34:06) 當陳以輝說完對數學的看法時，下一個鏡頭便切換到導演對學校數學老師的訪談。數學老師楊俊雄也認為，球員只要能夠掌握基本的應對能力，能夠通過考試就夠了。如果他們未來會繼續打到職業的話，真的也沒有什麼用到數學的機會。老師也認為學生能滿足基本的學習知識就足夠了，一般學科的知識對嚮往職棒的球員而言，實用性確實不高。基於這個原因，學生對課堂上的內容，也更沒有學習的動機與興趣，反而會在課堂上要老師讓他們看比賽的轉播，或是睡覺補眠。教育政策對體育績優生的積極差別待遇，和升學制度的保護，反而削弱了球員學習的動機，讓他們即便放棄學習，也能夠順利的升上大學。



圖 3-2-3 球員對學習的想法

另外，導演也從球員的角度，詢問他們對於學校課程的看法。導演問冠宇是否認為學校教的地球科學、自然科學有沒有幫助時，冠宇認為一點幫助也沒有，也不知道學那個要幹嘛（見圖片 3-2-3）。他也完全不會在意學業成績的表現，因為就算






考第一名，也沒有什麼獎勵，最後一名也無所謂，最後還是能去想讀的學校。不論學業成績結果的好壞，都與他們未來的升學或進入職棒的目標無關。相較於學科知識的學習，奪得冠軍時還能得到比賽獎金，讓球員更有實際的感受，比考試拿第一名更有成就感。訓練和競賽的個人表現，才是他們未來升學的依據，因此對球員而言，「奪冠」的意義也遠比讀書來的重要。另外在競賽中取得實績時，也能提高入選國手或是進入職棒的機會。因為對勝利和未來的升學切身相關，球員基於現實面的考量，也更樂於投入長時間的訓練，琢磨專業的球技。

導演對球員、家長、師長的訪問，讓不同的受訪者對相同的命題，就各自的立場闡述不同的觀點與想法。導演的目的，不是要給出一個追求夢想的標準答案，而是運用不同的觀點交錯，結合彥儒與冠宇從培訓體制參與者的角度，以及他們的家人、教練與學校老師的看法，聚焦球員為夢想努力的過程，再現球員在教育與棒球之間的選擇。導演藉由球員與培訓體制的再現，指出了台灣棒球培養球員的通病，揭示台灣棒球沿襲七〇年代以來，對冠軍的功利性追求所造就的運動文化，以及透過國家教育制度與棒球職業化的共構關係。這讓身處社會與經濟弱勢的原住民球員，在制度的鼓勵與保護下，傾向投入棒球運動，追求高風險、高報酬的職棒生涯，並視為階級流動的捷徑。

《揮棒》是一部關於卑南族少年，追求職棒夢想的成長故事。他在實踐夢想的道路上，每一位受訪者都陪伴、見證他的成長。李秀美導演運用大量的訪談，呈現青少年追求職棒夢想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導演從球員自身，及其家庭成員的觀點，分析球員投入棒球運動的動機，以及家人的支持和影響。其次是從球隊教練與訓練上，由於長時間的集中管理與訓練，教練的執教風格與理念，也影響球員人格和價值觀的養成。訓練的過程中，也指出教練與球員的權力關係，教練與球員的關係，也會影響球員未來棒球路的發展。最後回到球員的身體，長時間的訓練，讓他們無法兼顧課業的學習。因此，當他們選擇棒球升學的同時，也限縮了未來的選擇。

球員在訓練或比賽所受的傷，或許能透過適當的休息與復健就能痊癒。但是，



長時間訓練對學習時間的壓縮，造成球員學習低成就表現，進而放棄學校教育的過程，反而是對球員更嚴重的傷害。因為強調單一運動專業的培訓環境，球員若是遇到永久性的運動傷害，無法繼續打球的話，也難有其他的替代出路。因此棒球培訓體制對球員學識的剝奪，反而是球員更難以痊癒的傷害。

這一節，我以球員受傷的身體為比喻，分為球員身體外部的運動傷害，與身體內部的學識剝奪，用來闡釋棒球培訓體制對球員的限制。球員因投入棒球而受限的發展選擇，只能一味的在球場上追求團隊的榮譽，以及個人表現，努力將自身打造成具有價值的身體，換取未來進入職棒或旅外的機會。在升學制度的保護下，球員只要球技優異，就能順利升學取得高學歷，或是進入職棒。但是，卻鮮少有人討論棒球培訓篩選機制裡落選者的後路。這些落選者，若無法從事與棒球相關的事業時，便只能透過棒球訓練帶給他們的體能先備能力和服從權威心態，選擇相近的職業軍人、低技術體力工、服務業的工作，投入門檻較低的體力勞動。<sup>127</sup>

《揮棒》的最後，李秀美導演用字卡說明彥儒晉升成棒後的處境，他肩關節的傷勢已經痊癒，但是卻很少有機會能夠上場，他未來還得在成棒階段，繼續接受更多的挑戰。球員在「晉級成棒之後，必需再付出 10000 小時的青春，追求職業選手的夢想。台灣約有 6200 名少棒選手，國內和旅外職棒球員約 230 名，男孩最終圓夢機率不到 4%。」(53:47—53:57) 直到紀錄片的結束，我們仍無法看見彥儒是否順利完成職棒夢想，由片尾原住民歌謠的背景音效中，呼應紀錄片的開頭時的音效，呈現紀錄片前後一致的拍攝主題。無論彥儒的夢想最終是否成功，他都將是原住民球員追逐夢想過程的縮影。導演從彥儒追逐夢想的過程，再現原住民球員運動參與時所面對的挑戰，從家庭結構、教育選擇以及培訓體制內的競爭環境，體現台灣棒球的運動文化。

---

<sup>127</sup> 林文蘭，〈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體育學報》第 48 卷第 3 期（2015.09），頁 296。

#### 第四章 從電視到院線：《野球孩子》的花蓮富源棒球童年



童年流水，潺潺若止，湍急如夢。  
帶走浮萍落葉，不帶走水底沉甸甸的小石。

——《野球孩子》

2008年，《野球孩子》在台北電影節首映。2009年，更登上全台院線放映。《野球孩子》是繼2005年《翻滾吧！男孩》，與2006年《奇蹟的夏天》後，院線放映的運動紀錄片。運動的主題，向來是紀錄片與劇情片熱愛的題材之一，結合運動競賽帶來的熱情、緊張等戲劇性因素，更能牢牢吸引住觀眾目光。上述提及的運動紀錄片，不只是拍攝運動競技的過程，導演對拍攝對象的選擇，也以兒童與青少年為主，這樣的拍攝形式，儼然也成為台灣紀錄片重要的次類型。<sup>128</sup>導演拍攝兒童與青少年運動競賽的過程，同時也記錄他們的成長與變化，導演如何再現兒童及青少年的形象，也提供了從運動與成長的關聯性，切入兒童及青少年運動參與的可能。

台灣以棒球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並不少見，但是《野球孩子》是台灣第一部以少棒球員生活為主題，登上院線的紀錄片。在拍攝的形式上，也與過往的棒球紀錄片有所不同。《野球孩子》沒有旁白敘事的介入，電影中也缺乏人物的訪談，以及拍攝對象的背景說明。反而將拍攝的重點，聚焦在一群少棒球員的生活，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組織出戲劇性的情節，再現棒球少年們的兒童時光的純粹。

這樣的拍攝方式，與沈可尚導演的理念有關，沈可尚導演自認對政治正確的台灣紀錄片傳統，總是描述弱勢、邊緣人的努力求生、或被社會主流打壓的故事，不是很感興趣。沈可尚導演的理念，也涉及是否每部紀錄片都需要有一定批判性的討論，而導演在早期紀錄片《噤聲三角》時，便採取沒有旁白，沒有訪談，也沒有對

<sup>128</sup> 魏玟，〈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136。

話的拍攝形式，排除一般紀錄片常見的元素。邱貴芬認為沈可尚導演在《噤聲三角》中美學形式的嘗試上，運用奇特的攝影角度讓畫面上，讓島嶼展現非寫實的怪異色彩，暗示觀者與島嶼的疏離關係。導演挑戰紀錄片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其實也是認知到鏡頭詮釋的危險性，思考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權力關係。<sup>129</sup>因此導演將《野球孩子》定調為兒童電影，採用真實電影的概念，延續他個人對紀錄片形式的突破與嘗試，以及拍攝的個人風格，他在紀錄片中減少訪談、撇除旁白等元素的使用，純粹由被拍攝者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完成整部電影的素材。<sup>13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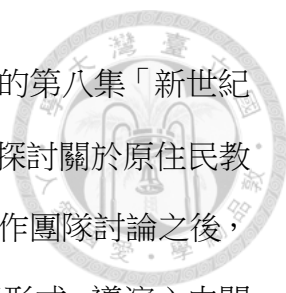
沈可尚導演也在訪談中透露，電影原先的製作方向並非如此。《野球孩子》是由公視出資製作，最初就是以院線片的模式規劃，但是公視原先的拍攝構想，是要從原住民棒球教育的角度切入，聚焦在原住民教練的愛心、熱情與教育，深入原住民的運動、教育議題。<sup>131</sup>公視選定的原住民教練，就是《野球孩子》裡的張茂三，會選擇他來拍攝原住民棒球教育的議題，是因為公視過去曾與他有過合作的經驗。公視在籌備《野球孩子》之前，就已經拍攝過棒球紀錄片。2006年，公視自製的電視節目《台灣棒球百年風雲》，分為八集探討台灣棒球的發展歷史。<sup>132</sup>節目的內容，是由日治時期棒球運動如何引進台灣開始。從台灣第一支棒球隊的成立，一路談到新世紀台灣棒球的發展現狀，完整呈現台灣棒球百年來的發展歷史，也反映現

<sup>129</sup> 邱貴芬，〈第三章：台灣環境紀錄片的空間與論述〉，《「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01），頁129、130、131。

<sup>130</sup> 楊皓鈞，〈台北電影節看見國片新勢力《野球孩子》沈可尚、《夏午》何蔚庭導演專訪〉，《放映週報》第164期，2008年7月3日。[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2020年6月6日檢索。

<sup>131</sup> 楊皓鈞，〈台北電影節看見國片新勢力《野球孩子》沈可尚、《夏午》何蔚庭導演專訪〉，《放映週報》第164期，2008年7月3日。[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2020年6月6日檢索。

<sup>132</sup> 《台灣棒球百年風雲》共分為八集。第一集「遙遠的球賽」：說明棒球引入台灣的歷史，以及台灣第一支棒球隊的成立與成就。第二集「台灣好手」：戰後初期，台灣民間的棒球發展。第三集「出國比賽」：冷戰期間，台灣成棒隊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的交流盛況。第四集「小小英雄揚威記」：介紹台灣從紅葉少棒，到三冠王成就的三級棒球發展。第五集「為國爭光」：1980年代台灣成棒在國際賽的表現，以及國內未有成棒的情況下，棒球人才外流的情形。第六集：「站在火山口」：從職棒的成立到分裂為兩個聯盟的競爭，以及簽賭案的爆發，細數國內職棒發展的風風雨雨。第七集「台灣之光」：王建民所帶來的國際棒球熱潮，開展出球員旅外的風氣。第八集「新世紀新棒球」：說明新世紀以來的棒球技術訓練，對台灣棒球實力的提升，以及原住民棒球員，作為台灣棒球界最主要的族群，在基層中的努力過程和教育的相關議題。公共電視台，<http://web.pts.org.tw/~web02/BIT/page3.html>。2020年6月16日檢索。



今國內棒球發展的面貌。張茂三教練，便曾在《棒球百年風雲》的第八集「新世紀新棒球」裡，接受過公視的採訪<sup>133</sup>，當時向他訪談的內容，就是探討關於原住民教育，以及棒球運動參與的議題。但是在沈可尚導演與公共電視製作團隊討論之後，決定按照導演對電影的構想，如他先前在訪談中提及的兒童電影形式，導演心中關於兒童電影的原型，是法國紀錄電影《山村猶有讀書聲》。因此在《野球孩子》的敘事策略上，導演有意在記錄童年時光之餘，也讓觀眾看見教練與球員間情同父子的相處關係。

沈可尚導演拍攝《野球孩子》，有明確的目標觀眾，為吸引對棒球或兒童主題有興趣的族群，將電影的主題圍繞在「童年」的再現。不過院線片的製作模式，也會令人質疑是否會為迎合主流觀眾的喜好，而削弱紀錄片具有的批判性，特別是以棒球為主題的紀錄片，如前兩章分析的棒球紀錄片，皆有指出球員選擇打球的背後家庭結構、國家體制或教育制度等議題。然而《野球孩子》這部圍繞花蓮富源少棒隊成員的童年故事，以「童年」為母題，作為召喚觀眾記憶的方式，是否也會沖淡被拍攝者困境的情形。

但是強調紀錄片的批判性，是否也是落入紀錄片形式的窠臼，因此，我選擇《野球孩子》為分析對象，一方面是在拍攝的形式上與過往的棒球紀錄片形式有所不同，不同於《冠軍之後》與《揮棒》具有明顯的批判意識及社會關懷，反而為再現兒童視角，選擇擱置大人世界的觀點，以觀察模式聚焦球員們在學校、球場、家庭的日常生活與少量的訪談。從《野球孩子》的拍攝形式，是否可視為棒球紀錄片拍攝形式的突破，亦或是為了讓紀錄片「好看」，而選擇呈現童年記憶的美好，選擇再現殘缺的事實，這便是本章分析的要點。

---

<sup>133</sup> 首播日期為 2006 年 12 月 06 日。

## 第一節 從性教育開始的小學生活



### 一、教室內的兒童時光

沈可尚導演為了和以往紀錄片對社會弱勢的關懷做出區別，他選擇擱置「棒球議題」，聚焦少棒球員的日常生活，並圍繞在幾位即將畢業的球員身上，發展成一個關於兒童生活和告別童年的故事，有別於過往描述原住民生活或教育的紀錄片。導演擱置「棒球議題」的原因，是因為他認為，紀錄片拍攝時，拍攝者在鏡頭後對被拍攝者的提問都是一種誘導，觀眾看到影像也是作者刻意操控的結果。所以沈可尚導演在《野球孩子》的觀點處理上，採取觀察模式的拍攝方式，以不介入的方式避開鏡頭後方的拍攝者對被拍攝者的提問與誘導，選擇從這群少棒球員的生活細節進行劇情的組織。這也讓《野球孩子》與前述的《冠軍之後》和《揮棒》，在拍攝模式上有明顯的不同，鮮少有導演或旁白對被拍攝者進行提問，而是由兒童的生活片段組織電影的情節。

沈可尚導演選定的拍攝對象，是以富源少棒隊的六年級成員為主。這群棒球隊的孩子有一個心願，就是一起去打全國少棒大賽。這對六年級的成員來說，也是少棒生涯的最後一場大賽。但導演在拍攝這幾位六年級球員時，並沒有專注在他們準備比賽的訓練過程，還涵蓋球員們在訓練以外的日常生活，包含學校的課堂、與家人的相處、結伴出遊等等。導演的拍攝策略，記錄了球員更為完整的生活面貌，體現棒球少年的童年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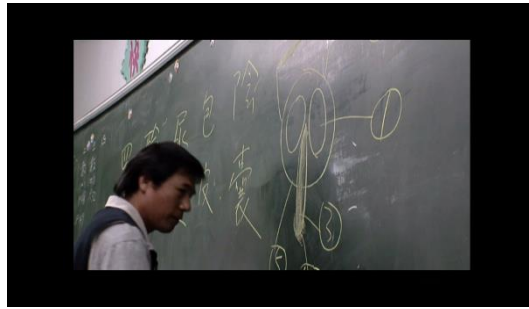


圖 4-1-1 健康教育的課堂<sup>13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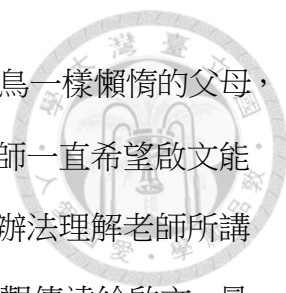
《野球孩子》的開始，是由一堂性教育的課程為開端（見圖片 4-1-1），學生們正在學習有關「青春期」的知識。青春期是指人體生殖及生理機能成熟時，心理和生理由兒童轉為成人的時期，同時也是生長發育較快速的階段。從課堂上師生之間的對話，提到有關青春期的定義，從年齡分界上，是指 12 到 17 歲之間。<sup>135</sup>對這群六年級的學生而言，他們正處於兒童與青春期的交界。隨著生理與心理的逐漸成熟，這段畢業前的時光，也表示他們處在兒童與成人間過渡的曖昧階段裡。他們在老師的帶領下，認識青春期的知識，由課堂上性教育的啟蒙，伴隨他們的羞澀與好奇，鋪陳為兒童告別童年前的最後一段旅程。

導演拍攝兒童性知識的啟蒙，除了指出拍攝對象在兒童與成人之間曖昧的交界外，也反映了學校的教育功能，幫助學生有較為正確的理解。另外，導演也從李啟文單獨和老師課輔的片段中，指出教育對學生價值觀的形塑過程。因為啟文有閱讀障礙，因此在學校每週兩節的國語課，都要向特教老師報到接受一對一的語文輔導。<sup>136</sup>鏡頭拍攝了啟文課輔的過程，老師正在向啟文講述國語課裡關於杜鵑鳥的文

<sup>134</sup> 本章分析《野球孩子》的影像截圖，於 2020 年 7 月 30 日學位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謝欣苓與王萬睿老師，皆提醒影像授權取得的問題；經過老師們的建議後，我在 2020 年 8 月 3 日與公共電視新媒體部媒體資材組的陳淑媛小姐以 Email 取得聯繫，請益影像授權許可的可能性。由於公共電視沒有《野球孩子》的重製權，因此無法獲得影像截圖的授權。在陳淑媛小姐的協助與建議下，引用著作權法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作為本章影像截圖的合法使用申明。徵引自全國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70017>。2020 年 8 月 3 日檢索。

<sup>135</sup> 一般正常男女生的青春期發育，女生八歲後就有胸部發育，接著陰毛及最後的月經出血；男生則在九歲後，睪丸發育開始，接著陰莖長長、變聲、長陰毛等。女生青春期大約至 14 歲結束；男生則為 17 歲左右。引述自性福 e 學園，<https://young.hpa.gov.tw/index/>。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sup>136</sup> 野球孩子製作團隊，〈關於野球孩子們〉主角資料大公開，野球孩子官方網站，2009 年 7 月



章。老師的目的是藉由杜鵑鳥的習性，傳達學生不要成為像杜鵑鳥一樣懶惰的父母，學習勤勞與負責的精神的倫理價值觀。在啟文課輔的過程中，老師一直希望啟文能針對這篇文章的理解表達自己的想法。但鏡頭中的啟文，似乎沒辦法理解老師所講述的內容，經由老師持續不斷地的引導，將勤勞和負責的價值觀傳達給啟文。最後，啟文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下，順利地複誦了老師要傳達的知識。雖然導演在《野球孩子》裡，是以兒童電影為基調，以不介入、不互動的方式，記錄球員們的童年時光。但是在這段輔導的過程中，卻也體現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在大人的指導下，內化價值觀的形塑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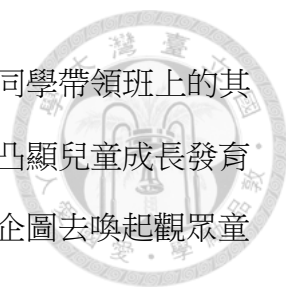
儘管老師所教導的是正向的觀念，但是在教學過程，老師一再用反問的方式問啟文「你以後會想當這樣的父母嗎？」，從老師教學的提問設計上，其實也忽略啟文的家庭結構背景。啟文的父母親在他小時候便離他而去，是由祖父母撫養長大。老師對啟文的提問，有明顯不當的舉例，這也是對兒童內心的一種傷害。即使《野球孩子》無意深入原住民教育與家庭結構的議題，但在這段輔導的過程中，仍點出原住民教育、家庭的議題。但若沒有事先對電影中的人物背景有所了解，單從電影的呈現看來，其實很難有辦法理解啟文接受輔導的原因，也沒辦法知道啟文家庭結構的實際情形，反而啟文在鏡頭前，純真的學習模樣，結合下一段陳凱文向班上女同學學習數學的片段時，這兩段的內容，組合成孩子們學習時的單純時光，沖淡了教育議題的沉重。

接在李啟文課輔之後的，是凱文向同學請教數學的片段。凱文算數學時，班上的女同學在一旁細心指導，數學不太靈光的凱文，讓身旁教學的女同學又急又氣，而凱文又時常分心，讓一旁的女同學更顯無奈。簡單的數學習題，結合彼此微妙又無厘頭的互動，導演試圖再現的是童年時期，與異性之間所產生的朦朧情愫。延續電影開頭時，性教育的啟蒙，導演藉由凱文與女同學的互動，作為一種召喚童年記憶的符號，召喚童年時和心儀對象相處的感情萌芽，以及屬於彼此的朦朧情愫。這

---

9 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6260582>。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在電影的後段，他們在準備畢業典禮的表演節目時，同樣是由女同學帶領班上的其他人，進行舞蹈的教學。導演透過數學的教導與舞蹈的排練，也凸顯兒童成長發育上，女性較於男性早熟的特徵，藉由同儕間照顧與曖昧的情愫，企圖去喚起觀眾童年時期，純真美好的回憶。

另外，在一次留校夜自習的拍攝中，老師用一篇題目為「志願」的作文，請球員們分享他們未來的「志願」。這群少棒球員的願望，有別於《冠軍之後》與《揮棒》裡對棒球的堅持與執著。這群《野球孩子》們的夢想顯得更為多元，馬志恩的志願是當教練，但他的動機不是因為對棒球運動的執著，而是認為教練能夠帶給球員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張元華因為喜歡唱歌，希望未來能夠當上歌星，在全國觀眾面前唱歌給所有人聽；李啟文因為數學老師對他的照顧，將來也想要當老師；楊聖偉認為自己在棒球上投入了很多心力，也很享受在球場上的帥氣，希望能堅持棒球運動，繼續走下去。從這幾位球員對未來的「志願」看來，並非每一位都與棒球運動相關，這也有別於過往棒球紀錄片，強調球員目標就是成為職棒選手的現象，對於這群少棒球員而言，他們會跟隨自己的興趣、崇拜的師長，去建構自己未來的想像。這也讓棒球運動，不同於《冠軍之後》與《揮棒》裡，球員將棒球視為未來出路與翻轉階級的選擇，而是將棒球作為陪伴兒童成長的運動，看見棒球少年更多元的生活面向。

## 二、回到家裡當小孩

這群少棒球員在全國大賽前的一個月，每一位球隊成員都得離開家人，住進學校和隊友們過著集訓生活。在全國大賽開打前，球隊放了一天假，讓這些球員們能夠短暫的回家和家人團聚。相較於住校的集訓期間，球員在團體生活中強調的「獨立」，回到家的他們又恢復為孩子的模樣，享受和家人相聚的短暫時光。鏡頭帶過了他們在假期時和朋友玩水的嬉鬧，以及和家人相處的互動情形。放假對他們而言，

只是回到集訓前的生活，享受和朋友玩樂、家人團聚的日常時光。

儘管導演在《野球孩子》的觀點處理上，有意擱置大人世界的觀點。然而在這段「回家當小孩」的溫馨時光，卻是《野球孩子》裡，使用最多訪談的片段。電影中，一段和馬志恩母親的訪談裡，提到關於馬志恩打棒球的願望，這個願望與他在學校時的「志願」有所不同。馬志恩期許自己，如果未來能靠打球賺錢的時候，希望能夠把家裡安頓好、裝潢好。對於馬志恩的心意，媽媽則寬慰的表示：「哇！怎麼會想到這樣，這個家還不夠好嗎？」(30:04—30:20，)。



圖 4-1-2 馬志恩的母親

這一段與馬志恩母親的訪談，從圖片可看見（見圖片 4-1-2），背景斑駁的牆面上充滿壁癌、簡陋的陳設與四處飛舞的蒼蠅，可以想像馬志恩的家庭環境，與經濟條件並不充裕。在訪問馬志恩母親時，馬志恩在鏡頭前選擇用毯子遮住自己的臉，不願面對鏡頭拍攝的羞澀表現，從他選擇閃避鏡頭的理由，或許也是因為他對家中簡陋環境自卑的體現。<sup>137</sup>從馬志恩打棒球的願望看來，也指出原住民運動參與的動機，多與改善家中經濟的目的有關。由於台灣體育活動的政經結構和文化因素，許多從事競賽運動的少年，也多出身弱勢階級。<sup>138</sup>少年球員傾向將身體作為未來謀生的工具，藉由嚴苛訓練打造的身體，是為了將來能夠透過運動獲取實質的報酬。他

<sup>137</sup> 野球孩子製作團隊，〈關於野球孩子們〉主角資料大公開〉，野球孩子官方網站，2009年7月9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6260582>。2020年6月27日檢索。

<sup>138</sup> 魏环，〈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136。



們從事運動的最大目的，就是為尋求一條向上流動的捷徑。若未來能順利將棒球運動變成養家活口的事業，那就是從事運動最好的結果。<sup>139</sup>這一條翻身捷徑，使身處社會與經濟劣勢的原住民族群，受到棒球運動的誘因吸引，讓他們試圖去追求高報酬的職業運動生涯，也將棒球運動視為階級流動的機會。<sup>140</sup>

這段與馬志恩母親的訪談，導演並未延伸至原住民運動參與的議題，也沒有導入原住民家庭生活的困境和運動參與的意義。有別於《冠軍之後》與《揮棒》裡，所指出原住民選擇從事棒球的動機，多與改善家庭的社經條件，或是作為升學的保障有關。但《野球孩子》選擇停留在母子情感的表現，將馬志恩打球的動機，視作兒子體諒母親的孝順、懂事行為，呼應這個時期的他們，逐漸脫離兒童，朝向大人的成長過程，試圖為家人分攤經濟的重擔的成熟想法。

這種呈現方式，在陳育軒與林孟旋的父親的訪談裡，也出現同樣的情形。只是轉換成父親視角，述說球員練球的「甘苦談」。兩位父親向鏡頭述說著孩子加入球隊的經過時，提到他們會為了把握上場的機會，選擇隱瞞身體的疼痛，不讓教練知道避免下場休息。於此也體現這群少棒球員，在接受嚴苛的訓練後，一步步從男孩朝向男人的轉變過程，指出棒球運動對兒童身心社會化的影響，在他們接受嚴苛的訓練過程中，伴隨著教練對球員身體的規訓，養成球員忍耐與服從的態度，助長他們男性氣質的養成。<sup>141</sup>

從這兩段訪談的內容，指出了棒球運動的教育功能。球員在訓練的過程中，對身體的鍛鍊，如同成長的儀式，象徵兒童逐漸蛻變成為大人的過程。球員們在球場上，遵守教練的要求並做出回應，打造強壯與服從的身體成為大人；回到家裡又恢復以往的小孩模樣，享受和朋友玩樂、親人撒嬌的生活。導演藉由「當一天的小孩」，

<sup>139</sup> 魏环，〈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137。

<sup>140</sup> 林文蘭，〈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0期（2013.03），頁50。

<sup>141</sup> 謝世宗，〈男性氣質：逆讀《翻滾吧！男孩》〉，《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電影經典》（台北：五南出版社，2015.02），頁220。


指出球員的成長過程中，「兒童」與「大人」之間轉換的曖昧過渡時期。這些球員是球場上的大人；家裡面的小孩。

在兩段訪談中，沈可尚導演穿插了一段少棒隊長楊聖偉獨自在家用餐的畫面，楊聖偉在《野球孩子》裡，也常以單獨特寫的鏡頭出現。相較於其他球隊的成員的日常生活的畫面，常與兄弟姊妹一起嬉鬧或家人的相處。聖偉在畫面上，多為獨自一人在客廳寫作業與用餐，球場上也是特寫居多。直到他參加全國大賽前，接到一通來自媽媽的電話後，才讓人明白特寫的用意。聖偉的特寫鏡頭，一方面是為強調他的獨立性，因為他是球隊的隊長，比起其他同齡的隊友而言，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另一方面，則和聖偉的家庭結構有關，他是隔代教養的單親家庭，就他們的家庭結構而言，也是偏鄉地區的普遍典型。如我在先前第二章所提過，有關教育優先區的計畫，作為偏鄉地區棒球隊運作的經費補助來源，計畫的條件，便鎖定有「隔代教養、單親家庭」的重點地區。由於偏鄉地區的就業結構人口外移嚴重，單親家庭的小孩，常因為父母在外工作，被託付給祖父母照顧，形成單親與隔代教養的雙重處境下的高風險家庭。<sup>142</sup>由於家庭結構的因素，家長也會希望孩子能參與球隊，如同《揮棒》裡，彥儒父親希望他打球的動機，是想將小孩託付給教練，希冀教練成為孩子的督導，避免孩子誤入歧途。導演並沒有選擇深究球員的家庭結構，讓聖偉的特寫畫面，成為他性格塑造的體現，展現他擔任隊長具有的獨立與成熟的特質，以及身為隊長的責任。

沈可尚導演在《野球孩子》的拍攝上，不同於前面提到的棒球紀錄片對球員打球動機、家庭背景及教育面向的問題繼續深入。但是在《野球孩子》裡，仍然能從球員在學校生活以及家庭成員的訪談中，看見導演淺顯帶到球員關於學習、家庭、經濟面向的議題。導演未深入議題的原因，是基於導演對鏡頭詮釋的謹慎，避免對被拍攝者的誘導，選擇觀察模式，以不介入的方式看待他們的童年。導演不繼續深

---

<sup>142</sup> 高風險家庭是指因經濟、教養婚姻、醫療等問題，導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虞慮之家庭。參考自家扶基金會，[https://www.ccf.org.tw/?action=ourservices\\_domestic&class\\_id=7](https://www.ccf.org.tw/?action=ourservices_domestic&class_id=7)。2020年6月27檢索。



入棒球議題的批判，也讓《野球孩子》自外於過往棒球紀錄片提及的民族敘事，脫離以往「國球」的沉重。<sup>143</sup>這也棒球回歸到兒童、青少年運動的生活與教育面向思考，棒球運動最重要的目的，或許不是對「冠軍的追求」，而是帶給他們的樂趣以及成長的意義，讓他們在運動過程中，體會成功的經驗、獲勝的喜悅，以及挫敗的不甘，陶冶他們的性格與培養適切的價值觀，而不是國球寓意下非贏不可的「冠軍」思維。如同教育部在 2003 年，曾提出「改善學生棒球運動方案」，就是為了改善過去高度競技性的棒球發展，讓棒球運動回歸教育的本質，避免過早投入競技性的培養，在國小少棒階段能夠以推廣的形式，讓參與者能夠好好「玩」棒球，體驗運動的樂趣。<sup>144</sup>

### 三、畢業典禮

在全國大賽集訓前，六年級的球員們正準備拍攝畢業沙龍照，這也預示著他們的童年即將結束。在全國少棒大賽結束以後，鏡頭從球場回到學校，看見六年級的球員們，拿著畢業紀念冊四處給同學、師長簽名。畢業典禮的來臨，象徵著他們童年的完結。在畢業典禮進行的過程中，留有一段讓在校生向畢業生祝福與告別的時間，看見許多學弟妹上前擁抱畢業的學長姐。平常嘻皮笑臉的他們，也在畢業典禮的氛圍下，難掩啾泣流淚的表情，充斥離別前依依不捨的情緒。

《野球孩子》的規劃上是以「院線片」的模式思考。因此在電影的時間長度上，不同於《冠軍之後》和《揮棒》，有更充裕的時間能夠琢磨呈現的內容。導演除了拍攝球員訓練與比賽的過程，還拍攝了球員們在學校的生活片段。不論是課堂上和同學的互動，夜自習作文的分享，以及全國大賽前接受全校師生及社區長老們的祝

---

<sup>143</sup> 楊富閔，〈《野球孩子》（紀錄片）導讀〉，台灣文化工具箱。2015 年 7 月 28 日。  
[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sup>144</sup>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2007.04），頁 140。



福，還記錄了球員在學校以外的日常生活，像是在溪邊的玩水，或與家人、手足之間的相處情形也涵蓋其中。

由於棒球運動在台灣高度競技化的發展，儘管是少棒階段的球員，仍可能會提早面對專業化的訓練。因此前述的棒球紀錄片，在拍攝上多會聚焦球員訓練、比賽的過程，以及對球員、家長、師長的訪談，藉此探討棒球運動的議題。如《冠軍之後》中，指出球員在準備比賽的集訓過程，可能一天就得接受十小時左右的訓練，表示台灣基層棒球的單日訓練時數，和訓練天數都非常長。再加上長期集中住宿的模式，也壓縮了球員接觸其他教育生活面向的機會。因為時間的排他性，造成球員的生活只剩下棒球，限縮其他領域發展的可能。<sup>145</sup>然而《野球孩子》由於導演的堅持，在表現「童年」為主題的拍攝上，選擇以不介入的方式呈現孩子的世界。即便拍攝的對象是少棒球員，導演主要的關注也不是棒球運動本身競技層面的熱血，而是在乎他們日常生活的內容。這也讓《野球孩子》記錄了許多球員們打棒球以外的生活細節，呈現少年棒球員的另外一面。從紀錄片對球員多元生活的記錄，也可作為對台灣基層棒球發展的反思。《冠軍之後》與《揮棒》強調的是投身棒球運動的少年們，在體制內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指出運動參與的嚴肅與複雜面。《野球孩子》則基於童年的命題，強調棒球少年的生活故事，對觀眾進行童年記憶的召喚，鎖定兒童生活的純粹，減少鏡頭對兒童世界的干預與詮釋。

從這群球員的畢業典禮，我們看見的是球員，充足而豐實的童年時光，球員的生活不盡然都是在球場上的奮鬥，他們在學校、家庭以及訓練以外的日常生活，都涵蓋在童年成長的回憶裡。因此，從《野球孩子》對童年時光的建構與想像，正好能作為改善基層棒球發展的思考方向，如何讓運動回歸教育的本質，抽離以往國球寓意下背負的沉重枷鎖。這或許是台灣基層棒球最需要釐清與面對的課題，由於過去政府的介入，讓棒球在國族的光環下強調競賽的榮辱，忽略了運動的價值。為了

---

<sup>145</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 85。

追求冠軍的榮譽，球員投入過多時間訓練，也犧牲了其他面向的發展。然而《野球孩子》對少年球員童年生活的再現，或許才是台灣基層棒球應該留意的發展方向，避免棒球運動剝奪球員的童年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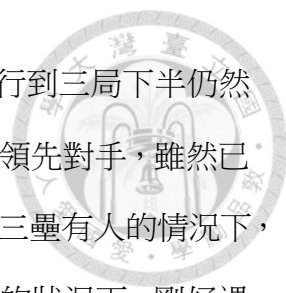
## 第二節 在教室之外的集訓與競賽

### 一、紅土上的棒球故事

《野球孩子》拍攝的是關於棒球少年的童年故事，而這群棒球少年的心願，就是一起去參加全國少棒大賽。這對六年級的球員而言，是他們少棒生涯的最後一次大賽。雖然導演在電影的拍攝上，採取的是觀察模式的旁觀者姿態，純粹記錄球員的童年時光。但是當富源少棒隊前往嘉義，準備參加全國少棒賽時，導演在拍攝比賽的過程時，卻一改原先觀察模式的拍攝立場，使用大量字卡為比賽進行內容的說明，幫助觀眾理解比賽的過程，更藉由教練現場的直接收音，不同於一般觀看棒球比賽時播報員的客觀立場，更能塑造比賽過程的緊張氛圍。

由於全國少棒大賽的賽制安排，只要輸球就只能打包回家，這對六年級的球員來說，輸球的同時也代表少棒生涯的結束，為了延長少棒的生涯，球員就必須搶下每一場勝利。參賽是他們的心願，但他們更期待能為球隊拿下冠軍。

賽前下榻飯店休息時，看到球員們看著秩序冊的賽程表，細數著要贏下哪些球隊，才能夠順利晉級，拿下冠軍；進行沙盤推演，練習比賽暗號時，從球員身上也都感受不到一絲緊張，反而還能互開玩笑。並且從教練的集合喊話裡，也並沒有強調輸贏的重要性，反而要球員們盡量的表現練習的成果，把握機會全力以赴面對比賽，戰到最後一刻。教練並非以贏球為目的，反而強調的是球員展現的態度。因此，導演並未刻意去深化球員在賽前的緊張氣氛，以及非贏不可的沉重壓力。反而還藉由球員的童言童語，表現球員的天真和單純，稀釋關於勝負的執著與沉重。



花蓮富源少棒隊的第一場對手，是彰化聯興少棒隊。比賽進行到三局下半仍然維持平手，比賽陷入膠著。直到最後半局時，富源國小僅以一分領先對手，雖然已經兩人出局，是對防守方富源國小有利的局面。但是在彰化聯興三壘有人的情況下，只要出現安打便能追平比數，甚至還有被逆轉的可能。在這危急的狀況下，剛好遇上對方最難纏的打者，雙方休息區的氣氛都相當緊張。


臨危授命上場投球的聖偉，面對守成勝利的關鍵時刻，畫面上插入了字卡：「面對難纏的打者，阿偉一定要守住。」（52:20—52:22）。字卡的内容傾向富源國小少棒隊的立場。最後，比賽也非常戲劇性的由楊聖偉投出再見三振，為這場比賽劃下句點，成功的晉級複賽。字卡的内容，充分表現出沈可尚導演個人對球隊的情感與支持。然而，導演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呈現，一方面與他個人對球隊的情感有關，另一方面，是根據紀錄片發行形式與目標觀眾的設定所作的調整。根據林木材對沈可尚導演的訪談，他表示《野球孩子》第一版剪出來時，並沒有使用任何的訪談和字卡，單純從旁觀者的視角，呈現兒童生命的純粹，是一部個人風格強烈的紀錄片。但是這強烈的風格，也讓紀錄片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變得難以互動。因此現在看到的版本，是沈可尚站在「藝術形式」及「觀眾理解」兩者間衡量的結果，他選擇以觀眾理解為主，哪怕摻入過多的情緒，他只想誠實的讓觀眾們能夠喜歡上電影裡的棒球少年們。<sup>146</sup>

棒球紀錄片在拍攝上，多會採納競賽的片段為素材，作為紀錄片敘述進行的方式，因為棒球運動是節奏較為漫長的運動項目，在觀賽時也需要具備一定的背景知識才能理解比賽進行的情形。若是有對棒球運動不夠熟悉的觀眾，確實會有看不懂的情況發生，因此導演在比賽的拍攝上，加入字幕與字卡進行比賽解說的方式，也確實有助於觀眾理解比賽的功能，也更能融入比賽的情緒。運動競賽的進行，伴隨著難以預測勝負的緊張氣氛，觀眾也會隨著比賽的過程，融入自身的情緒。在第三

---

<sup>146</sup> 林木材，〈關於棒球的兒童電影，專訪沈可尚導演談《野球孩子》〉，《紀工報》第11期，2009年9月22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7806205>。2020年6月6日檢索。





章分析的文本《揮棒》裡，曾文珍導演也同樣運用類似的方式，使用字幕的說明，幫助觀眾理解棒球比賽的內容，更搭配音效與鏡頭的特效，配合比賽落敗的結果，用較為戲劇化的方式呈現球對衛冕失敗的失落感。然而《野球孩子》與《揮棒》不同的是，沈可尚導演的字卡內容，充分表露了他個人的情緒，跳脫先前觀察模式的拍攝立場，介入比賽的詮釋，這在富源少棒隊晉級後的第二場比賽裡更為明顯。

第二場比賽的對手是台南崇學少棒隊，這是一間培育出多名職棒選手的名校，面對實力堅強的對手，字卡更以「不管對手是誰，非贏不可。」（59:40—59:42）彰顯富源國小少棒隊非贏不可的決心，並且在此次賽事的解讀上，字卡的內容更完全傾向他們的立場進行解釋。但很不幸的，富源國小因為比數落後的壓力，以及搶攻心切所造成的一連串失誤，讓比賽最後以一分之差敗給對手，無緣晉級。無緣晉級的結果，最後字卡以「六年級孩子的少棒生涯畫上句點」（1:09:57）作結。導演原本在比賽過程中所流露的情感，在最後字卡上，卻又回歸先前旁觀者的視角，沒有繼續將觀眾推入球員失落或沮喪的情緒裡。

從球員收拾行李的過程與賦歸時的表情，能夠感受到球員與教練們失落的情緒。但是，導演沒有繼續拍攝競賽過程時的濫情作法，也沒有繼續放大球員或教練對比賽結果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反而將球員們日常生活的遊玩畫面接在大賽結束之後，看見球員們騎著腳踏車、在溪邊玩水、丟九宮格、一同唱歌歡笑的畫面。<sup>147</sup> 這個方式跳脫了原先球員在全國少棒大賽中落敗的失落情緒，也緩和了導演拍攝比賽時所流露的激情。因為這種激情的呈現，也會有讓棒球少年的童年主題失焦的疑慮，過度執著於比賽的勝負裡。

然而，導演抽離使用字卡時的情感，回歸原先觀察模式的不介入立場，也讓故事的進行重新回到球員童年的再現。對這些即將畢業的球員們而言，無論球場上的勝敗與否，都是他們共同的回憶，相較於執著冠軍的有無，能夠正視比賽失敗的結

---

<sup>147</sup> 林木材，〈關於棒球的兒童電影，專訪沈可尚導演談《野球孩子》〉，《紀工報》第 11 期，2009 年 9 月 22 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7806205>。2020 年 6 月 6 日檢索。



果，對運動員而言或許才是更為可貴的價值。對這些年輕的少年運動員而言，並不需要透過追求冠軍去建立自身的意義與價值，導演對競賽勝負間情緒的留白，或許更貼近兒童天性上對勝敗的豁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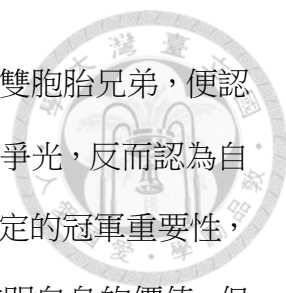
另外從《野球孩子》的製作模式，分析導演情感介入的動機，或許也是為追求戲劇性的效果所做的考量。由於《野球孩子》在拍攝時，便是以「院線片」的方向規劃。因此這部電影的目標觀眾，是會進戲院觀影的一般社會大眾，無論是大人或小孩都適合看的電影，並且是對「兒童」的世界以及「棒球」有興趣的觀眾為主。沈可尚便在訪談中表示，因為喜歡棒球的人搞不好從來不看電影，所以不能讓他們看一個個人化風格強烈的棒球電影。他希望不論觀眾對電影主題的涉獵是深是淺，都能因為這部電影回想到自己童年時光的美好。<sup>148</sup>

因此導演在全國少棒大賽的拍攝過程，利用字卡表露的個人情感，有效的結合運動競賽的戲劇性，牽引觀眾的情緒。由於競賽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過程所帶來的戲劇張力，將比賽的片段納入紀錄片的敘事策略，不僅能藉由競賽提供戲劇性的效果，也能作為紀錄片敘事的手段。魏玠認為運動競賽的結果，對被攝者的人生而言，有多重要／不重要，我們無從得知。但能夠肯定的是，運動紀錄片若不圍繞在競賽輸贏的主軸上，就會降低競賽所引發的戲劇性。<sup>149</sup>因此，從導演在拍攝《野球孩子》時，戲劇性的操作上，也令人質疑導演是否為了靠攏商業主流，才對棒球議題選擇避而不談，迴避原住民運動參與及教育議題。電影在全國少棒大賽的字卡內容，從導演所表露出來的情感，帶動觀眾情緒的同時，或許也是為貼近觀眾所作的考量。

然而《野球孩子》為避開棒球議題與鏡頭對兒童世界的詮釋，也讓這部紀錄片開展出有別於其他棒球紀錄片的拍攝風格。由於台灣棒球特別強調競賽的「輸贏」，若是競賽提升至國際賽的層次，攸關國家的榮譽的情況時，更是「只能贏，不能輸。」

<sup>148</sup> 楊皓鈞，〈台北電影節看見國片新勢力《野球孩子》沈可尚、《夏午》何蔚庭導演專訪〉，《放映週報》第164期，2008年7月3日。[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2020年6月6日檢索。

<sup>149</sup> 魏玠，〈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141-142。



長此以往也助長了運動價值觀的偏差。像是《冠軍之後》的陸家雙胞胎兄弟，便認為輸球是一件丟臉的事，若是自己代表國家出賽，不能順利為國爭光，反而認為自己浪費、辜負了國家的金錢和期待；《揮棒》裡，彥儒與冠宇所肯定的冠軍重要性，是因為沒有人會記得第二名是誰，認為只有奪冠才能在球場上證明自身的價值。但是《野球孩子》並沒有強調冠軍的重要性與意義，導演在大賽輸球後，選擇用球員玩樂的畫面，呈現兒童自外於勝負的豁達。這樣的敘事策略，也抽離過往棒球紀錄片裡，強調球員對勝負的執著與追求冠軍的沉重議題，讓棒球脫離「國球」象徵下的民族敘事。<sup>150</sup>跳脫勝敗的執著，也等同肯認「失敗」的意義，從正面的意義詮釋，競賽的失敗，這對運動員的價值觀養成也具有正面的影響，超脫勝敗的功利性，讓運動回歸本身的樂趣以及精神意涵。

## 二、訓練過程轉大人


《野球孩子》在準備全國少棒賽的集訓時，從導演拍攝這群棒球少年們的訓練過程裡，可以看見教練對少年身體的訓練和控制。這也反映台灣基層訓練中，普遍存在的教練高度權威化，以及軍事化的訓練風格。因為這種從球員身體的壓制內化到心理的服從，反過頭來讓球員自我要求的過程，往往能夠幫助教練在比賽和日常訓練時嚴密的掌控整個球隊，進而獲致團體的成功。<sup>151</sup>教練為團隊制定目標，球員在團隊裡角色分工，結合集體連坐責任，以及球隊的輩分制度，確保球隊運作的秩序以及目標的達成，這是台灣基層棒球員們的共同經歷，在棒球訓練的社會化下，經歷過訓練的球員，球場上的他們已不再是「小孩」，而是「大人」。

為了準備全國少棒賽，富源少棒隊在學期中進行為期兩週的住校集訓。在第一

---

<sup>150</sup> 楊富閔，〈《野球孩子》（紀錄片）作品導讀〉，台灣文化工具箱，2015年7月28日，[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2020年6月6日檢索。

<sup>151</sup>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頁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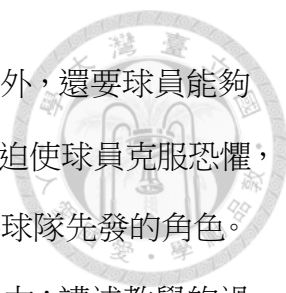
天訓練結束時，教練便叮嚀球員晚上睡覺時要注意，「不准有咳嗽、有流鼻水、有什麼感冒都不行」。這項要求，教練強調的是「為了球隊，不是個人」的精神，集訓期間維持身體健康的最大目的，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球隊整體，超乎個人的意義。<sup>152</sup>棒球訓練強調的是對教練的高度服從、以及犧牲自我和去個人化的特質。高度服從的態度反映在訓練過程中，也合理化教練對球員嚴格訓練的正當性，以及訓練過程所蘊含的暴力。

像是徐弘霖在訓練時，由於守備動作的不確實，便被教練叫到一旁指導。教練先要徐弘霖做出守備過程的分解動作，他也確實做到了教練的要求。但是在守備訓練上卻沒辦法流暢的表現出來，教練便對他說：「你很會做動作啦」，還順勢敲了他的頭，並要求徐弘霖額外進行守備特訓，要給他一點教訓。徐弘霖緊盯著打過來的球，一邊甩著手，因為他的手指數次被球給打傷，集合時他緊握著手指，帶著痛苦的表情。但球員若是想要上場比賽，就只能選擇接受磨練的過程。嚴格的訓練，除了提高球員的身體素質，以及技術的進步，連帶的也會對球員進行陽剛氣質的打造。運動競賽的輸贏勝敗，原本就較為接近陽剛氣質的優劣標準，運動競賽中，越是激烈的肢體對抗，陽剛氣質的強調也更為明顯。<sup>153</sup>

陳育軒在練習內野滾地球守備時，沒辦法順利將球按照教練的要求接在左腳內側。因為他會怕球，但是在教練發現他怕球後，卻要他站得更近一點，繼續打滾地球給他接，要他練到不怕為止。可是不幸的意外發生，滾地球打傷了育軒的右眼眉骨與顴骨的位置造成腫脹瘀血。育軒的外公看到他的傷勢後，也只能無奈地說著：「傷腦筋，怎麼會受傷，不接好球。」只能對育軒的傷勢表示無奈，所幸沒有傷到眼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教練對育軒受傷的看法，認為要告訴他受傷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遵守教練的指導，所以才會發生這次的意外，而這次的意外也等同給予

<sup>152</sup> 魏环，〈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9。

<sup>153</sup> 魏环，〈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7。



球員的教訓。但是從訓練的過程看來，教練除了要求技術的確實外，還要球員能夠勇敢的面對打過來的球，並藉由反覆的鍛鍊與更為嚴苛的要求，迫使球員克服恐懼，傳達出擁有強硬、勇敢特質的人，才有辦法達到教練的要求，站穩球隊先發的角色。

教練對球員的嚴格要求，除了訓練時對球員身體所展現的暴力；講述教學的過程中，也有著言語上的威脅。在啟文練習打擊時，教練一邊餵球一邊對他說：「你眼睛都不盯球，打到球也沒有看那一點，等一下我丟你。」雖然教練的本意是為了幫助球員調整姿勢，但教學的方法又不是這麼適當。

由於棒球運動裡，教練的高度權威化，以及軍事化訓練風格，讓運動也有脫離教育目的的疑慮。教練為了追求球員技術的專精，在教學的過程往往也訴諸不恰當的方式進行教學，這也導致基層運動的推廣，逐漸與教育理念背離，也進而產生許多體罰或不適任教練的爭議，成為棒球運動值得重視的問題。<sup>154</sup>台灣的基層棒球，過度強調其競技性，和追求冠軍的功利性。這也讓投入運動訓練和比賽的少年們，接受訓練時的目的，也只是為確保身體能被工具化的控制與鍛鍊，進而追求具有實用價值的比賽勝利。在教練與球員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情形下，教練借助自身的權威與軍事化的管理，往往也會在訓練過程中，對球員造成傷害。特別是台灣基層棒球的參與者，在生理或心理方面，皆為未發育完全的兒童與青少年。若對尚未成長發育完全的選手，施以長時間、超負荷的訓練，也是對球員的揠苗助長。<sup>155</sup>

然而，根據台灣基層球隊教練的聘任方式，教練的風格也會有所不同。國內基層球隊的教練聘任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由學校教師兼任；第二種是學校專門聘請專業教練指導。一般來說，專職教練較會表現出高度權威，以及軍事化的帶隊風格。但這也是因為專職教練的工作績效，多以球隊競賽的成績為考核標準，因此教練為確保自身工作的穩定，也會傾向將球員朝競技目的去培養。另外，這些專職教練也

---

<sup>154</sup>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 2007 年 4 月，頁 139。

<sup>155</sup>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 2007 年 4 月，頁 139。

多由科班出身，在以往球員時代時，所經歷的訓練模式就是如此，因此也將這種風格，沿襲至往後成為教練時帶隊的參考依據。

儘管《野球孩子》是以童年時光為主題，但是對球隊訓練的拍攝，指出了與《冠軍之後》和《揮棒》相同的台灣基層棒球培訓問題。三部紀錄片的教練同樣屬於高度權威與軍事化的風格，這也確實造成了球員生理與心理的耗損。如《冠軍之後》裡的陸氏兄弟和蔡志偉，因為訓練而無法兼顧學業；《揮棒》的陳彥儒，在升上大學以後，也曾反思過往的棒球生涯，一直都沒有立場與勇氣和教練溝通，皆以教練的指示為主。因此在競爭先發位置的過程，流連於數個守備位置，沒有辦法適性的成長，也種下後續運動傷害的禍根。但是，這種訓練風格，卻普遍存在台灣基層棒球的培訓中。球員為了打棒球，勢必得歷經三級棒球習以為常的權威化和軍事化訓練。然而，這也成為球員們從「小孩」轉「大人」的必經過程，深耕成為台灣棒球運動的特殊文化。

### 三、棒球理念的傳承

雖然沈可尚導演在《野球孩子》的拍攝上，試圖擱置「棒球議題」。但是就電影裡，球員們接受訓練的過程，仍然指出台灣基層棒球培訓上，以教練為主的軍事化風格。雖然張茂三教練在訓練上，與《冠軍之後》的陸永茂教練，還有《揮棒》的穀保家商教練團一樣，都以嚴格的態度要求球員的技術。但是在《野球孩子》裡，我們卻看到教練更多元的面向。因為張茂三教練，除了磨練球員的技術，更要求他們做好身為學生的本份。

教練之間會有這樣的差異，我認為與他們的執教理念有關。電影最後，有一段與張茂三教練的正面訪談，讓我認為教練理念的差異，才是讓棒球脫離以往的冠軍的思維，回歸教育目的的關鍵。或許也是在張茂三教練的理念下，才讓這群球員們能夠享受到棒球運動所帶來的樂趣，而不至於淪為奪冠的工具。這也讓《野球孩子》

回到了「棒球的教育議題」，從教練的執教理念對球員的影響，從教練的理念去思考台灣棒球發展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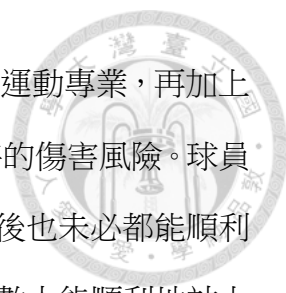
圖 4-2-1 教練理念的呈現

《野球孩子》的教練張茂三，在球場上對球員的訓練非常嚴格，對球員在學校的學業表現也有一定的要求。電影中也多次出現教練在訓練外，管教球員的學業與品格的畫面。在徐弘霖的聯絡簿事件上，張茂三在開導沒有寫作業和簽聯絡簿的徐弘霖時說：「沒有讀書就不能打球，有讀書才有球打。」（見圖片 4-2-1）可見他並不是一位只看重比賽成績的教練，認為學業和運動是同樣的重要。

基本上教練的工作，並不包含要求學生的學業表現。如第二章提到的「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與「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量組織及審議規則」<sup>156</sup>，教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能讓球隊在各個競賽中取得實績，這才是保障教練工作的方式。張茂三和其他教練一樣，也有帶領球隊打進世界少棒冠軍的目標與夢想，但是他自認沒辦法成為一個只重視比賽成績的教練。因此，除了訓練球員，他還額外要求他們維持基本的學業能力，培養他們負責任的態度。張茂三會對球員有這些要求，與他自身的求學經歷有關，他也是透過運動升學的原住民運動員，因為運動升學的管道，讓他有機會從事教師與教練的工作，改善家庭的困境。但是在求學過程中，也不是這麼的順利，最大的困難還是家裡的經濟問題。

因此，運動升學的管道，也確實提供了學生額外的機會，促進階級的流動。但

<sup>156</sup> 參考自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edu.law.moe.gov.tw>。2020年6月20日檢索。



是，在台灣棒球培訓的環境裡，由於棒球員的訓練過於強調單一運動專業，再加上國內的職業運動產業的機會有限，棒球員還需承擔訓練或競賽時的傷害風險。球員走在充滿未知風險的棒球之路，也猶如對人生的賭注，球員們最後也未必都能順利的以棒球為業。球員在教育制度與商業機制的篩選下，也只有少數人能順利地站上職業舞台。被篩選掉的球員，由於單一運動專業，並且在訓練的過程中，也往往放棄了學業的努力，這導致球員在離開棒球培訓體制後，沒有其他專長而顯得無所適從。因此，張茂三教練對球員有學業上的要求，也是期望球員在運動升學管道裡，能夠替自己爭取到更多的機會。不論是順利的成為職業球員，或是對其他領域產生興趣時，也能保有一定的學習能力，以便將來升學時能順利地轉換到其他專業的領域，避免因為單一專業而限縮未來的發展和選擇。


隨著畢業典禮的結束，六年級的球員們正式畢業離開，球隊也準備迎接新成員的到來。張茂三教練，一如往常的開著車子四處接送孩子們到球隊接受訓練。新成員裡總還是有調皮又粗心的孩子，會忘記寫作業。導演再次拍攝教練管教兩個沒有寫作業的新成員，黃恩祥和林益正兩個人，面對教練的質問，顯露緊張又害怕的表情。張茂三教練，仍秉持他的理念，繼續引領球員們兼顧運動的訓練與課業的學習，在學生和球員之間的身分取得平衡。《野球孩子》的片尾，也告訴觀眾們，仍在富源國小打球的孩子們，在隔年新一季的全國少棒賽中，奪得亞軍。這也指出，這些球員在訓練與學習的並重下，仍然可以在比賽裡取得優異的表現。這足以作為台灣棒球基層培訓模式的典範，讓球員在訓練的過程中，同樣明白學習的重要，讓運動升學的管道，不必然是學業成績不佳的替代性出路，能夠真正確保球員們在棒球專業之外，也能開展出其他多元的面向，而不會讓球員在培訓裡有著過多的犧牲。

在 2014 年，原住民電視台以「野球園丁」為題的新聞特輯，<sup>157</sup>有一段張茂三教練的專訪。他仍執教於富源國小棒球隊，看見他在訓練前，同樣四處開著車接送

---

<sup>157</sup> 〈野球園丁 4〉亦父亦師張茂三，原住民族電視台，2014 年 4 月 2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NHnVz\\_ZL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NHnVz_ZLE)。2020 年 7 月 2 日檢索。





球員，問著球員們有沒有完成作業，可見教練仍然秉持相同的理念，繼續在台灣基層棒球裡深耕。張茂三教練的理念，也會傳承給他帶過的球員，如富源國小少棒隊裡的另一位教練高群峰，過去也是張茂三的學生。教練的理念，會隨著球員的離去，而開支散葉，培育更多的人才的同時，也會為台灣棒球帶來更多的改變。

《野球孩子》的教練張茂三，展現了不同於其他教練的執教理念。儘管《野球孩子》的導演，在製作上試圖迴避「棒球議題」。但電影中，仍指出台灣基層棒球的培訓制度裡，普遍高壓的訓練方式。若再與其他棒球紀錄片的教練風格比較，更可看出教練的教育理念的差異對少年球員帶來的影響，透過這部電影關於「童年」的主題，也令人反思棒球運動，在教育的目的下應該帶給學齡階段的兒童、青少年們的正面意義為何。《野球孩子》的最後，對教練的正面訪談，似乎也不同于導演原先拍攝的理念，也有破壞整部電影形式統一的疑慮。但是導演認為，雖然教練的篇幅不多，但他是理性的主角，是小朋友的核心。<sup>158</sup>若沒有這段訪談，我們在電影裡只能看見嚴格的教練，卻沒辦法確切認知教練目的背後的核心價值。因此這段訪談，具有指針的效果，讓電影還是關切到原住民棒球教育的議題。於此，也回應了本章對《野球孩子》提出的問題，由於院線片的製作模式，為了讓紀錄片「好看」，也會有去政治、迎合觀眾口味的收編疑慮。導演在呈現童年記憶的美好時，確實對「棒球議題」的處理上，有選擇性的「殘缺」。特別在球員的家庭背景和球員運動的動機上，導演只有淺顯的帶過，抽離社會現實的沉重，建構快樂的童年想像。但是在結合教練的訪談後，也開展出原住民棒球教育的問題，也消解院線紀錄片被收編的疑慮。反思棒球培訓過程中，逐漸將球員工具化的犧牲。電影裡，球員的快樂，或許也能視為對現實棒球基層環境的諷刺，因為台灣棒球的培訓制度，反而是剝奪這些棒球少年，體驗運動樂趣的原因。

---

<sup>158</sup> 林木材，〈關於棒球的兒童電影，專訪沈可尚導演談《野球孩子》〉，《紀工報》第 11 期，2009 年 9 月 22 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7806205>。2020 年 7 月 4 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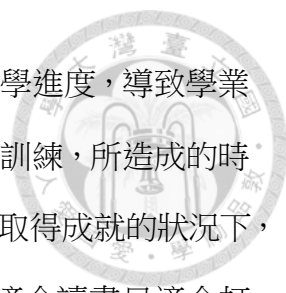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結論：升學、族群、成長



本文以「新紀錄片」作為方法，看台灣棒球紀錄片，如何論述台灣棒球，並鎖定紀錄片裡「兒童、青少年」球員，看見他們在台灣基層棒球的培訓體制內所面對的問題。根據本文的三部棒球紀錄片，《冠軍之後》、《揮棒》、《野球孩子》，分別看見球員在培訓體制內，有關升學學制的選擇、訓練對身體造成的傷害，以及棒球少年的童年成長與生活。

《冠軍之後》是關於三位卑南少年，陸俊瑋、陸俊宇、蔡志偉，他們在少棒階段，奪得美國小馬聯盟冠軍之後，升上國中的成長故事。他們最初接觸棒球的原因，是因為棒球帶給他們的樂趣，但是在正式訓練後，運動的樂趣也逐漸消失。他們打球的目的，不再是興趣的培養，而是為改善家裡經濟的負擔，以及作為未來的升學與工作的考量。紀錄片的敘事，從他們升學選擇的分歧開展出兩條路線：陸氏兄弟選擇聽從少棒教練陸永茂（叔叔）的要求，就近於卑南國中就讀；志偉選擇成立不久的台東體中（現為國立台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呈現他們交錯的棒球經驗。陸氏兄弟選擇卑南國中的原因，是因為陸永茂的命令，一方面是認為體中的教練沒有執教實績；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己沒有應聘體中教練的資格，所以選擇將陸氏兄弟留在身邊培養。然而，當他們首次青少棒賽上交鋒時，球員彼此並沒有感受到實力的落差，還讓陸氏兄弟認為台東體中的球員條件更好。因此教練帶隊的實績與否，其實並沒有直接影響到球員的養成，反而是兩間學校在培訓的硬體設施與環境有明顯的落差。曾文珍導演從台東體中的硬體設備新穎，對比陸俊宇就讀的卑南國中較為老舊與髒亂的環境。

另外，導演從台東體中教師的立場，也感受到較為積極的教學態度。台東體中的鄭清芬老師，關心球員是否能夠在運動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目標，而不是滿足他人的期望，也會擔心球員因為訓練過度，造成體力、精力或棒球生命的耗損。特別是學期中，志偉受到組訓徵召，臨時離開母校，到集訓學校插班上課配合集訓。




由於臨時的組訓，插班上課的方式，學校無法配合他們原先的教學進度，導致學業成績因為訓練的關係更為落後。這也指出，由於棒球隊的長時間訓練，所造成的時間排他性，造成球員學習時間的壓縮，個人長時間無法在學科上取得成就的狀況下，球員便就更加依賴棒球透過團體取得的成就，進而加深球員不適合讀書只適合打球的刻板印象，讓運動成為學業成績不佳的替代出路，導致學生／球員的身分失衡。

更從蔡志偉拒絕中華隊集訓的事件上，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控制與壓迫。由於學期集訓對志偉學業造成的影響，這一次的國際賽集訓，志偉祖母和鄭清芬老師，選擇尊重志偉的意願，和中華隊管理員協商過後拒絕參加集訓。但在拒絕之後，志偉卻遭到棒球協會的封殺，連帶取消未來國手徵召的資格，等同阻斷志偉未來的棒球路。因此，《冠軍之後》揭示的是國家對球員的掌控，球員從原先的興趣，到最後也會在體制內被培養成奪冠的工具。另外，長時間的訓練對球員學習時間的壓迫，也造成球員學習的困難，進而限縮未來生涯的選擇。球員選擇透過棒球升學，如同走在一條單行道，球員在球場上沒有選擇，被教練掌控的同時，也被國家榮譽與社會的期待所綁架，成為無法反抗的生命個體。

《揮棒》是關於卑南少年陳彥儒追逐職棒夢想，長達七年的成長故事。李秀美導演在彥儒升上青棒階段後，更加入陳冠宇的拍攝，呈現兩人在逐夢過程中的競合關係，反映台灣棒球嚴苛的培訓體制和競爭環境。導演將彥儒的職棒夢想，視為原住民夢想的典型，然而原住民選擇從事棒球的原因，其實是有教育部、原委會、體委會等，運動制度的制訂和補助的政策，以及社區文化和社會網絡支持，提供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的環境。另外，由於棒球的職業化，也讓處於社會經濟背景弱勢的原住民，將棒球視為生涯發展的方向。彥儒參與棒球的動機，就是期望成為職棒選手以後，能夠藉此改善家裡的經濟環境，為了接近職棒的夢想，選擇離開家鄉，北上求學進到穀保家商。

然而環境的不同，彥儒要面對的，不只是嚴格的訓練，還有文化適應的問題。從教練到隊友，許多成員都是平地人，首先要適應的就是語言的隔閡。因為教練在



訓話或是指導的過程中，會使用台語進行解說；隊友彼此也會以台語對話，不會台語的彥儒為了融入球隊，也期許自己能趕快學會台語。但是，在他積極融入球隊文化的同時，也逐漸與原鄉的部落文化有所脫節。因為球隊的訓練，彥儒在高中階段沒有回家參與過任何的祭典。雖然彥儒在父親強烈的要求下，回家參與了祭典，但他更在意的是沒有參與的話，會讓家人被罰錢。比起部落文化的意義，彥儒更在乎現實面的問題。因為回家的關係，他擔心請假會耽誤練習，造成和隊友實力的差距，這也反映出青棒階段球員之間的競爭生態。

到了青棒階段，球員為了去到理想的大學，各場賽事的表現機會，便成為球員爭奪亮點的舞台。球員對外要爭奪冠軍，對內則得和其他人競爭先發位置，因此競爭壓力也相較過去少棒、青少棒時更為沉重，並且在教練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的理念倡導下，球員也會拚勁全力為球隊帶來勝利。因為球隊的晉級，也會為球員帶來更多的機會，優秀的表現能讓教練推薦到理想的大學，也能增加國家徵召為國手的機會。因為職棒的選秀資格，國手資歷，讓球員有代訓與選秀的優勢。因此，球員也更樂於接受國手的徵召，若有更好的表現，受到國外球探的青睞，也能爭取旅外的機會。

球員為了把握出賽的機會，也會選擇隱忍身體的傷痛，不願放棄上場的機會。他們受到的訓練，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犧牲個人，成全球隊。但是，當球員的傷勢，可能危及運動生涯時，卻也難有替代的出路能夠選擇。因為在青棒階段，球員多半已經放棄了學業的學習，若是沒辦法將棒球生命延續至成棒階段，很容易就在教育與商業機制的篩選下，逐漸遠離棒球圈。台灣棒球培訓過於強調專業化的訓練，也讓球員在離開棒球培訓體制後顯得無所適從。

《揮棒》揭示棒球運動職業化以後，國家體制與職業化制度的共構關係。球員為了進入職棒，面對國家的徵召時也只能選擇接受，甚至為了提高進入職棒的機會，還會主動爭取國手的資格。這層共構關係，如同少年球員身上所肩負的雙重束縛，合理化球員為國爭光的目的。但長時間的專業訓練與密集的賽事，也增加球員更多




受傷的風險。原住民球員因為訓練而犧牲學業，也進而限制他們透過教育途徑尋求其他社會流動的可能，使原住民球員只能以嚴肅的態度，面對運動的參與。球員最終仍須面對運動場域的優勝劣敗，成功者永遠只是少數。

《野球孩子》是第一部以少棒為題材的院線紀錄片。由於院線片的製作考量，也會有為了讓紀錄片「好看」，而去政治、迎合觀眾口味的疑慮。《野球孩子》不同於其他報導式紀錄片，沒有旁白敘事，也沒有人物深度的訪談，及背景的說明，導演選擇擱置原住民棒球參與的議題，聚焦棒球少年、童年的快樂與純粹，藉由棒球少年的生活日常與天真模樣，召喚觀眾的童年回憶。《野球孩子》由性教育的課堂開始，象徵球員們正處在兒童與青少年的過渡階段。這群少年球員的願望，就是一起去參加全國少棒大賽，這對六年級的球員而言，也是最後一次的大賽。因此，大賽的結束，不只是少棒階段的結束，也是對童年的告別。

導演在球員備戰全國少棒賽時，對集訓生活的拍攝，可以從球場的內外，劃分為兩個空間，分別呈現球員的兒童／大人形象。球員在球場內，接受嚴格的訓練，遵守教練的命令，與團體規範。球員接受訓練的過程，如同從小孩轉變為大人的儀式。教練要球員在訓練過程中，克服恐懼，並強調勇敢和堅強的特質，忍受身體的疲憊與傷痛，學習犧牲小我的精神。但是當球員離開球場休息與洗澡時，球員又恢復為純真的小孩模樣。特別是球員放假回家時，導演更以「回家當小孩」為題，看見球員們休閒時的生活時光，溪邊玩水、烤肉，以及陪伴家人的撒嬌模樣。回家當小孩的時光，同時也是《野球孩子》使用最多訪談的片段，但是導演並沒有深入球員運動參與的動機，以及家庭社經背景，只有淺顯帶過，停留在溫情、感性的層次，將球員打球的願望，視為小孩體諒大人的懂事行為，呼應他們逐漸脫離「兒童」，朝向「大人」成長的過程。導演為再現棒球少年童年成長經驗的美好，選擇抽離社會現實的沉重，保留快樂的童年想像。


電影最後和教練的訪談，從教練的執教理念，也開展出原住民棒球教育的議題。不同於《冠軍之後》、《揮棒》裡球員培訓體制所強調的冠軍至上，張茂三教練更在



乎的是球員是否能兼顧學業與訓練的要求。教練的目的，是讓球員能在選擇棒球升學的同時，不會只有棒球這一項專業，也能開展出其他面向的多元發展可能，有效的幫助球員透過教育的管道，改變自己的命運。導演對教練的訪談，也消除院線紀錄片的收編疑慮，反思台灣棒球為求冠軍，不擇手段的理念，反而才是剝奪棒球少年體驗運動樂趣的原因。

綜上所述，《冠軍之後》、《揮棒》與《野球孩子》三部紀錄片，分別指出台灣棒球的幾個發展面向。《冠軍之後》藉由學制的選擇，探討棒球培訓體制對學生／球員身分的影響，犧牲學業的學習，朝向單一運動專業的發展，限制了未來升學的選擇。同時，揭示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束縛與暴力，只要球員不接受國手的徵召與培訓，就會遭到協會的封殺和除名，影響未來運動員的生涯。球員在培訓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參與棒球的樂趣，被塑造成為國爭光的工具。《揮棒》從一位原住民少年追求職棒夢想的過程，探討原住民運動參與的原因，以及在城鄉差距考量下，棒球留學的文化適應。原住民運動參與的原因，與教育政策的鼓勵與推動相關，雖然在補助下，促成東部棒球的發展，但與其他地區的資源相比，仍無力阻擋人才的外流。球員選擇棒球名校就讀的同時，也因為文化的不同，造成適應的困難，也進而造成原鄉文化的脫節。同時，延續《冠軍之後》在學生／球員的身分的探討，青棒階段的球員，早已放棄學業的學習，因此，若無力繼續以棒球謀生，也難有替代的出路。在培訓制度與選秀制度的共構關係下，球員為增加進入職棒的可能，也會主動爭取國手的資格，賦予國手資格的實質價值，也進而合理化國家徵召球員為國爭光的目的。《野球孩子》因為擱置了棒球議題的深入探討，關於少年參與運動與階級處境，只有點到為止。然而，從教練執教理念的差異比較，卻也足以作為對台灣棒球培訓體制的反思，反思功利性的發展現狀，對球員樂趣的剝奪與童年生命的壓迫。

我們可以發現，兒童、青少年選擇投入棒球的原因，多與其家庭所處的社會階層有密切關聯，球員在經過教練身體工具化的控制和鍛鍊後，也逐漸被打造成追求



實用價值的工具，成為奪冠機器。訓練選手的目的，不像是為了栽培出職棒球員，反而更像是在國家體制保護下，藉由培訓制度與選秀制度的共構關係，合理化國家徵召球員的目的，提供為國爭光的工具。但是高度競爭的發展，對球員造成的耗損，卻也沒有適當的退場機制，因為球員選擇棒球的同時，學業的犧牲早已限制球員其他領域的發展可能。

棒球運動的重要性，若只在於「為國爭光」的目的上，那也有違棒球是國球的說法，反而「贏球」才是國球。冠軍至上的思維，對運動的發展而言，絕非理想的模式。本文分析三部棒球紀錄片的重要性在於，它所記錄的不只是運動競賽的激情，或贏球的榮耀，反而記錄的是球員投身棒球時所遭遇的困境，並揭示棒球培訓體制與職棒選秀共構關係下，對球員造成的束縛與壓迫。球員視棒球為社會流動和改善經濟條件的脫貧捷徑，但過度專業化的訓練也侷限球員其他能力的培養，在教育與商業機制的篩選後，球員也未必能順利以棒球為業，離開培訓體制後更顯得無所適從。最後，透過張茂三教練的執教理念，也讓我們思考兒童和青少年的參與主體，是否能在體制內受到更多的保障，不再只是被剝奪的對象，並能夠享有運動的樂趣和豐實的童年。

透過棒球紀錄片的分析，從紀錄片再現兒童、青少年運動參與的過程，看見教練、國家體制對球員身體的控制與束縛。棒球紀錄片不只具有運動競技的戲劇性，從導演的拍攝對象與影像敘事策略，也揭示台灣棒球基層培訓的文化現象。《冠軍之後》、《揮棒》與《野球孩子》分別從升學、族群與成長的面向，作為論述台灣棒球的切入視角，紀錄片穿透兒童與青少年運動參與背後的社會議題，成為台灣運動文化的反思途徑。

## 參考文獻



### 一、片單

李秀美，《揮棒》（台北：公共電視，2010）。

沈可尚、廖敬堯，《野球孩子》（新北市，前景娛樂，2009）。

曾文珍，《冠軍之後》（台北：公共電視，2000）。

蕭菊貞，《紅葉傳奇》（台北，公共電視，1999）。

### 二、中文專書

Bill Nichols 著，井迎兆譯，《紀錄片導論》（台北：五南出版社，2020.02）。

Louis Giannetti 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最新修訂第十版）》（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10）。

Paula Rabinowitz 著，游惠貞譯，《誰在詮釋誰》（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11）。

Richard M. Barsam 著，王亞維譯，《紀錄與真實：世界非劇情片批評史》（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03）。

Tony Schirato 著，何哲欣譯，《運動的文化分析》（台北：韋伯出版社，2009.01）。

馬各主編，《小說潮：聯合報第2屆小說獎作品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03）

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原住民族覺醒與復振》（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09）。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12）。

王御風、蔡博任，《圖解台灣棒球史》（台中：好讀，2014.08）。

王慰慈主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台北：同喜文化，2006.12）。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修訂二版)》（台北：三民出版社，2015.07）。





李道明、張昌彥主編，《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下）》（台北：國家電影資料館，2000）。

李潼，《龍門峽的紅葉》（台北：圓神出版社，1999.12）。

孟峻瑋，《旋動歲月：台灣棒球百年史》（台北：中華民國棒球協會，2006.07）。

林木材，《景框之外：台灣紀錄片群像》（台北：遠流出版社，2012.10）。

邱貴芬，《「看見台灣」：台灣新紀錄片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01）。

姚立業編，《中華青、少棒世界揚名記》（台北：健行文化，1978.12）。

徐錦成，《運動文學論集》（台北：春暉，2012.01）。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台北：民生報出版社，1994.06）。

許義雄等著，《運動文化與運動教育》（台北：師大書苑，2004.01）。

郭力昕，《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台北：麥田出版社，2014.10）。

陳子軒，《左·外·野：賽後看門道，運動社會學家大聲講》（台北：聯經出版社，2019）。

陸銘澤，《棒球樂事》（台北：台灣書房，2011.09）。

曾文誠、孟峻瑋著，《台灣棒球王》，（台北：我識出版社，2004.06）。

焦桐，〈運動文學〉，《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一九七七～世紀末）》（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11）。

楊佳嫻，《台灣成長小說選增訂版》（台北：二魚文化，2013.03）

謝世宗，《電影與視覺文化：閱讀台灣經典電影》（台北：五南，2015.02）。

謝仕淵，《「國球」的誕生：日治時期台灣棒球史》（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12）。

謝仕淵，《新版台灣棒球一百年》（台北：玉山社 2017.11）。



### 三、單篇論文

- 王慰慈，〈台灣紀錄片的類型發展與分析—以 Bill Nichols 的六種模式為研究基礎〉，《廣播與電視》第 20 期（2003.01），頁 1-33。
- 林文蘭，〈打出差異：原住民棒球夢的現實與虛幻〉，《體育學報》第 48 卷第 3 期（2015.09），頁 291-308。
- ，〈打出機會：原住民成為棒球選手的社會流動和訓練體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90 期（2013.03），頁 43-114。
- ，〈金牌背後：原住民投身棒球運動的社會基礎與效應〉，收錄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2007 年台灣原住民族教育新思維專輯》（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頁 3-1-3-28。
- 林伯修、朱自敏〈花東學生與原住民〉，《運動文化研究》第 9 期（2009.06），頁 67-108。
- 林伯修、林國棟，〈媒體再現與台灣國球的系譜〉，《體育學報》，45 卷 3 期（2012.09），頁 227-245。
- 林伯修、洪煌佳，〈台灣棒球中的種族堆疊〉，《體育學報》第 46 卷第 1 期（2013.03），頁 73-92。
- 林信甫，王百川，〈少棒肘之發生與預防處理〉，《中華體育季刊》，13 卷第 2 期（1999.09），頁 94-100。
- 翁嘉銘，〈棒球的美麗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台灣棒球史〉，《中國論壇》第 23 期（1992.09），頁 27-31。
- 高三福、李伯倫、謝明輝，〈教練的領導威權、體罰、管教與責備：零體罰的思考〉，《中華體育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2016.09），頁 229-236。
- 張威克，〈台灣本土體育概念演進的系譜〉（《運動文化研究》第 10 期（2009.09），頁 81-127。
- 黃俊傑、鍾德文，〈我國青少年棒球運動推展現況之探討〉，《大專體育》第 89 期



(2007.04)，頁 137-141。

楊照，〈抽離了民族主義之後〉，《中國論壇》第 23 期（1992.09），頁 37-41。

蔡玫姿，〈銘刻國族神話的棒球小說〉，《幼獅文藝》706 期（2012.10）。

蔡詩萍，〈編輯室手記〉，《中國論壇》第 23 期（1992.09），頁 1-3。

魏玟，〈運動，少年，與階級：三部少年運動紀錄片的文化分析〉，收錄於陳樹升編，《2010 台灣紀錄片美學論壇》（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12），頁 136-157。

#### 四、學位論文

王思閔，〈台灣運動紀錄長片之研究—以《翻滾吧！男孩》及《態度》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宋育成，〈全球化潮流與異質化策略：論《海角七號》與台灣電影史的「台灣性」在地想像〉（台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李坤原，〈台灣棒球小說研究——以情感及成長主題為探討中心〉（屏東：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2016）。

邱韋誠，〈是鎖鏈還是羽翼——原住民棒球選手的運動之路〉（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張力可，〈台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0）。

張永祥，〈運動電影《KANO》之台灣社會文化意涵探析〉（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2016）。

張廷榮，〈台東縣各級學校棒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45~2005）〉（台東：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7）。

許貞雯，〈由運動紀錄片《奇蹟的夏天》反思男童運動社會化歷程與教育意涵〉



- (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許家綾，〈台灣紀錄片中的兒童形象：論《野球孩子》、《翻滾吧！男孩》、《拔一條河》〉(嘉義：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 陳中淋，〈紀錄原鄉：台灣運動紀錄片的再現模式分析〉(台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3)。
- 陳美齡，〈界線與秩序：當代卑南族南王(Puyuma)部落喪葬禮俗的多元樣貌〉(台東：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5)。
- 陳蘊秀，〈台灣棒球小說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班，2008)。
- 葉明嘉，〈台東縣青少棒球員外流因素之研究〉(國立台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14)。
- 劉偉君，〈敘事與台灣棒球文化的記憶建構(1945-2006)〉(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7)。

## 五、網絡資源

- TSNA 發布，〈WBSC 公布最新棒球排名台灣重返第 4〉，2018 年 12 月 18 日。  
<http://www.tsna.com.tw/tw/news/show.php?publish=3&num=24156>。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 中華職棒發佈，〈中職 2019 選秀會即日起開放報名 7 月 1 日隆重登場〉，2019 年 5 月 6 日。  
<http://www.cpbl.com.tw/news/view/19137.html>。2020 年 5 月 17 日檢索。
- 公共電視紀錄片平台，<https://viewpoint.pts.org.tw/>。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 王欣瑜，〈《天后之戰》(電影)導讀〉，台灣文化工具箱，2015 年 7 月 28 日。



- [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46.html?themeId=16](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46.html?themeId=16)。2020年8月5日檢索。
- 世界棒壘球總會官方網站，〈2018年終世界棒壘球總會棒球世界排名創下76國上  
榜紀錄〉，2018年12月17日。<https://reurl.cc/Kg29j>。2020年5月17日檢索。
- 台灣紀錄片資料庫，<https://docs.tfi.org.tw/zh-hant/filmmakers/1919>。2020年4月  
17日檢索。
-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Index.aspx>。2020年4月18日檢索。
- 囡仔影音公社，<http://www.cm-workshop.com/whatsnew.php>。2020年3月23日檢  
索。
- 性福e學園，<https://young.hpa.gov.tw/index/>。2020年6月27日檢索。
- 林木材，〈關於棒球的兒童電影，專訪沈可尚導演談《野球孩子》〉，《紀工報》第  
11期，2009年9月22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7806205>。  
2020年6月6日檢索。
- 果子，〈職棒代訓與SBL—回想2003體委會林德福的「兩支箭」〉，《運動視界》，  
2016年9月1日。<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33534>。檢索日期2020年5  
月17日檢索。
- 城牆，〈學術觀點—為什麼原住民一窩蜂打棒球？〉，《運動視界》，2019年9月28  
日。<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67676>。2020年5月17日檢索。
- 原住民族電視台，〈野球園丁4：亦父亦師張茂三〉，2014年4月2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NHnVz\\_ZL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NHnVz_ZLE)。2020年7月2日檢索。
- 孫大川，〈台灣原住民的傳統體育研究—以卑南、阿美族為對象〉，行政院委員會  
委託研究案（未出版），2003年10月。  
<https://www.sa.gov.tw/Resource/Other/fl451372983617.pdf>。2020年7月5日檢  
索。
- 家扶基金會，[https://www.ccf.org.tw/?action=ourservices\\_domestic&class\\_id=7](https://www.ccf.org.tw/?action=ourservices_domestic&class_id=7)。



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徐錦成，〈庶民的台灣棒球史：讀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台灣時報》，2018 年 2 月 28 日。師大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轉載，  
<http://pr.ntnu.edu.tw/newspaper/index.php?mode=data&id=37040>。

國家電影中心，<http://www.ctfa.org.tw/filmmaker/content.php?id=711>。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野球孩子製作團隊，〈「關於野球孩子們」主角資料大公開〉，野球孩子官方網站，2009 年 7 月 9 日，<https://baseballboys.pixnet.net/blog/post/26260582>。  
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曾芷筠，〈敬！奇幻青春：專訪「學生電影教父」林清介〉，《放映週報》第 549 期 2016 年 3 月。[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08](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608)。2020 年 3 月 23 日檢索。

楊富閔，〈《野球孩子》（紀錄片）導讀〉，台灣文化工具箱，2015 年 7 月 28 日。  
[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https://toolkit.culture.tw/extendinfo_151_108.html?themeId=22)。2020 年 6 月 27 日檢索。

楊皓鈞，〈台北電影節看見國片新勢力《野球孩子》沈可尚、《夏午》何蔚庭導演專訪〉，《放映週報》第 164 期，2008 年 7 月 3 日。  
[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201)。2020 年 6 月 6 日檢索。

運動視界編輯，〈台灣棒球積分大豐收世界排名維持第 4〉，《運動視界》，2020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sportsv.net/articles/70901>。2020 年 5 月 20 日檢索。